译者的话

英国现实主义作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1874年1月25日生于巴黎，中学毕业后，在德国海德尔堡大学学医。1897年以后他开始写小说，随后又从事剧本写作，1903—1933年，写了近三十部剧本。1908年，伦敦四家剧院同时演出他的四个剧本，盛况空前。

毛姆的主要成就在小说创作。从1897年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兰贝斯的丽莎》起，到1948年的长篇小说《卡塔林纳》出版，先后共发表了长篇十来部，短篇百余篇，《作家笔记》、《回顾》等散文集数部。

毛姆蜚声英国文坛，被誉为“莎士比亚后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很受读者欢迎，曾被译成多种外文。1952年，牛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1954年，英国女王授予他“荣誉侍从”称号，便因之成为皇家文学会的会员。1965年12月病逝于法国。

1916年，毛姆首次到南太平洋旅行，以后多次到过远东。1920年，他到中国，可能去过北平、

上海、汉口、四川和一些较边远的地方，游记《在中国屏风上》(1922)就是通过这次中国之行写成的。此外，他还写了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彩巾》(1925)。

本书所记叙的，是作者1920年在中国旅游时的所见所闻。作者以其深邃的观察力和优美而犀利的文笔，描写了在中国接触到的人物、风景和某些偶然事件。他接触的人多半是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领事和商人，也有几个中国官吏、学者和一般的平民百姓。对于西洋人，他总是无情地揭露其自大、空虚和浮夸；对中国的个别贪墨、骄矜的人，他也持批评态度；但对一般人，尤其是对劳苦大众，则寄予了同情和关切。人物一经接触，哪怕只见一面或只作一次交谈，作者便能进入其灵魂深处，挖出他们的向往、彷徨、创伤、痛苦或欢乐，以及他们人格的二重性等等。然后再以画龙点睛之笔，以一个动作，一个眼色，一两句话，从哲学、心理学的高度概括出他对这个人的看法。于是一个复杂的、有血有肉的人便活生生地站在你的前面。写景物也是一样，作者总是写出它们的特性、环境、气氛，甚至用抒情的笔法写出他对它们的遐想，于是景物似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用鼻子闻出气味的了。作者才气横溢，笔调俊逸，思想敏锐，于是在有的篇幅里自

然地表现出被现代派奉为典范的意识流，有时又和中国的性灵派不谋而合。所以有些意境不是浅尝即能领略其旨趣的。总之，虽然这些作品也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然而这全部五十八篇散文，却说明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高度景仰和欣赏能力，也流露出了他对中国人，特别是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关心。正如他在《山城》等作品里所透露的思想那样，他把中国人作为朋友而寄予同情和尊敬。

这个本子是根据抗战时期原版复制版本翻译的，另外还找了1943年开明书店在桂林出版的胡仲持先生注释翻印本作参考。胡本删去了其中的七篇，现在一并译出收入，以使读者得见全貌。

本书是在毛姆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译出的，聊表对前代大师纪念的一瓣心香。译者水平不高，又当酷暑赶工，误译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陈寿庚

1984.8.10.

目 录

幕 启

一排通向城门去的茅房，全用泥土筑成，倾斜坍圮，使人觉得只要一阵风吹来，它们准会变为一堆泥土，又回到原来的地面上去。一串驮载很重的骆驼，一步一顿地在你跟前走过。它们昂首向天，显出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气，就象投机取巧的暴发户，屈尊在远不及他们富有的那些人中间穿过时那样。一些披袒着破烂的蓝色衣服的人，聚集在城门口。这时一个骑着蒙古小马，戴着瓜皮小帽的公子哥儿，奔驰而来，他们立刻就四分五散了。一群孩子追逐着一只跛脚的狗，向它投掷泥团，借以取乐。两位矮胖的先生穿着团花青缎长袍和缎子马褂，站在那里闲聊。每人手里擎着的一根小棍上，栖着一只用绳子栓住脚的小雀子。他们是带着这玩艺儿出来放风的，各自以亲密的方式评比着自己的爱物。小鸟时而振翅飞到空中，由于绳子的羁绊，又迅即回到栖息的棍上。两位中国先生笑了，用温柔的眼光盯着它

们。一些鲁莽的孩子用尖厉、嘲弄的声音，冲着一个外国人叫嚷。城墙，这渐趋颓圮的城墙，古老而又雉堞参然，看去就象是一帧古画上的巴勒斯坦城垣。

你进得城来，走上一条商店鳞次栉比的狭窄街道：许多木雕铺面都有它们精美的格状结构，金碧辉煌。那些精刻细镂的雕花，呈现出一种特有的衰落的豪华。于是你会想到那些发暗的龛橱里，都是出售各式各样的神秘莫测的东方的稀奇物品。一大群人沿着坎坷狭隘或深街曲巷里磨肩接踵地拥挤着；还有苦力们背着沉重的货物，用短促粗犷的贼声喝道；小贩们用高亢的喉音，叫卖物品。

这时，一匹毛色光鲜的骡子，踏着沉重的步伐，拉来一辆北京轿车。车篷是湖蓝色的，它的巨大车轮上钉着鼓鼓的泡钉。坐在一边车辕上的车夫晃荡着双腿。时间已是黄昏了，在那黄色、陡峻、飞檐戗脊的大庙的屋顶后面，太阳把天空染得绯红。北京轿车向着茫茫的暮色中走去，静静地走去。于是你猜想，那翘着二郎腿坐在里面的是什么人。或者是一位博洽通儒，为了礼尚往来，不得不去回拜一位朋友。他和那位朋友将互致得体的心仪已久的应酬，共同伤感时乎不再的唐风宋采；或许是一个歌女，她穿着花团锦簇的

刺绣缎褂，青可鉴人的头发上簪着一块翠玉。她此时正被召唤去伺候宴会，所以她得唱一支小曲侑酒，还得和那些风流蕴藉的公子哥儿们交流一些优美雅致的应对。北京轿车终于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消逝了：那车上似乎满载着东方的神奇与奥秘。

陋室记

她说："我总相信能把它弄出点什么名堂来。"

她活泼地向周围扫视了一圈，创作想象的光芒，使她的两眼炯炯发光。

这是城里一座小小的古老庙宇，她弄来改装成了一间居室。庙宇是三百年前信士们为一位高僧建造的。那位高僧凭着一片诚心，在这里苦苦修行，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由于长时期对他高功卓行的记念，信仰变成了膜拜。但因物换星移，庙产却日渐衰败，最后，残留的两三个和尚也不得不离此他去。风吹雨打，年复一年，碧绿的琉璃瓦上长满了杂草。庙里褪了色的朱红油漆上描绘的褪了色的金龙的藻井依旧漂亮。但是她并不喜欢深色的屋顶，所以绷上了一块帆布，还在上面糊了墙纸。需要通风采光，在一边的墙上她开了两个大窗。凑巧她又有两幅尺寸相当的蓝色窗帘。蓝是她心爱的颜色，那是出自她眼睛的色彩。圆柱，房间里那又红又粗的固执的圆柱，使

她有点压抑感，于是，她在那上面糊上根本不象是中国出产的令人愉快的墙纸。值得庆幸的是，她也用这种纸糊裱了四壁。纸是从一家本地店子里买来的，但是地道得象汉德逊公司的货色；非常好看的桃红色条纹，使得这地方立刻变得赏心悦目起来。房子后壁是一座神龛，那里放着一张大漆香案，香案后面是一尊入定的古佛。历代的善男信女在这里烧香禀祷：有的祈求今生的福祉，有的想解除尘世的烦恼。而对我们这位女士来说，这儿不过是装置一个美国炉灶的绝妙场所。她不得不在中国买铺地毯，但是经过她精心挑拣，使你分不出和一铺英国爱克斯明斯特地毯有什么两样。自然，这是手工做的，不及英国货那么光滑吧，但已是一件够体面的代用品了。她从一个调离中国去罗马任职的公使馆人员那里买回一套异常精致的家俱，又从上海弄来细致、鲜艳的光洁花布做成套子。她收藏了不少令人艳羡的画，添箱礼品和自己买的一些东西，由于她的艺术才情，这些东西简直把房间布置成了个安乐窝。她需要一架帷屏，在这里英国货是没法弄到手的，于是她买了一架中国做的，正如她俏皮地说的那样：你一定会非常得意在英国拥有一架中国帷屏吧。她有为数不少的照片，嵌着银色框子。其中一张是施列斯威——郝斯坦公主的，一

张是瑞典女王的，两张都签了名，都被摆在那架大钢琴上，这就给这房子看上去有住上人的气氛了。于是，万事俱备了，她怀着得意的心情环顾她所创造的业绩。说：

“自然，看起来还够不上一间伦敦居室的水平，但比起英国某些引人入胜的地方，比如说彻尔德汉呀，或威尔斯的顿桥的房子来，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蒙古土司

天晓得他从什么鸟不生蛋的地方来的。循着盘旋的羊肠小道，他骑马驰下蒙古高原。那个四面八方被贫瘠荒芜、砂砾多岩、崎岖梗阻的崇山峻岭围成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他驰驱经过那守卫在路的开头的庙宇，直下通往中国大门的古老的河床。这河床被在朝霞照射投下峻切阴影的大山余脉禁锢着；千百年来不可胜计的车马辐辏，将这河床的石头地面上压成了一条粗糙的道路。晨风料峭，天净云轻。从晨光曦微直到日薄西山，终日流着没有尽头的河水。沙漠商队里的骆驼驮着茶砖走向七百里外的库伦[1]，这样直到西伯利亚。在这类旅行队伍里，还有由温顺恬静的阉牛拉着的一字长蛇阵似的四轮货车，和膘肥体壮的蒙古小马拉着的三三两两的二轮马车。当他们转回的时候，再又是驮着皮毛的骆驼商队，

①今呼和浩特。

长长行列的四轮牛（或马）车，通向北京市场。时而一群马匹奔驰而过，时而又来了巨大的羊群。但是他的眼睛并不停留在这些变换无常的景物上面。他似乎不曾留意这条路上更有什么别的行旅。他由六七个骑在疲于奔命的马上的亲随陪同着，确实，骑在忧郁的马上，虽然不免风尘仆仆，却又顽强骠悍。他们按辔轻驰，松松垮垮。他穿着一件青色缎褂，黑色绸裤，掖在翘尖的长统马靴筒里。头上戴着一顶本民族的高统貂皮帽子。他腰膀直挺，骄傲地走在随从们的前头。当他骑在马上，眼神坚定地昂首远视，你会怀疑他是不是在想：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祖先沿着这条道路奔驰而下，驰入中原大地的平原沃野，那里座落着无数富饶美丽的城市，供他们掠夺。

流浪汉

在我见到他之前就听见了他那不平凡的故事，于是我期望那是个引人注目的人。我觉得一个人具有卓绝的经历，那他在外表上也一定是卓越不凡的。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在外表上并无突出之处的人。他比一般中等身材还矮小，显得有点孱弱，晒得黑黑的，棕色的眼睛，虽说还不到三十岁，头发就开始花白了。他看起去就象普通人一样，你或许要见过五六回才能记住他是谁。假如你碰巧在一个百货商店的柜台后面，或者在一个经纪商行的板凳上遇见他，你会觉得那是十分眼熟的，对他会象对那柜台和板凳一样漠不关心。在他那里很少见到能变成迷惑力的引人注目之处。他脸上的了无意趣的空虚，使你想起那在秽浊街上的满洲贵族宫邸的一堵空空荡荡的宫墙。在那宫墙背后你知道有彩绘的庭院、精雕的盘龙、和天晓得的什么样的生活中微妙的纷纷攘攘。

他的全部浪迹生涯是值得一提的。他是一个兽医的儿子，起先在伦敦违警罪法庭作纪录员，接着在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艘商船上当伙食管理员。在那里他也许开了小差怎么的，不然就是别人代替了他到南美后的事务，他从智利的一个口岸设法到了南太平洋的法属马尔贵斯群岛，在土人中间住了六个月。那些人总是愿意接待一个白人的。于是，从这里坐帆船开始一次旅行到了大溪地岛①，作为一艘运送中国劳工到社会群岛的老式木船上的二副他到了厦门。

那是我碰到他时的九年以前，从那时起他一直住在中国。首先他在英美烟公司工作，过了两年他感到腻味了；由于粗略掌握了汉语，他为一家获得在全国专卖药品权的公司所雇用。有三年时间，他从这省漫游到那省，兜销丸药。最后他节余下了八百块大洋，他把自己重新投入漂流浪荡。

他开始了他最值得称颂的冒险事业：从北京首途出发，来一次横越全国的旅行。在旅途中他装扮成一名穷苦中国老百姓，肩着铺盖卷儿，撇着旱烟管，袋着牙刷，歇着中国伙铺，和跑长路的人拥挤在土炕上，沿途吃着中国饮食，这样下

①南太平洋法属岛屿之一。

去自然玩不出什么花招。他很少乘火车，绝大部份靠两条腿步行，坐牛车或搭民船。他从陕西到山西；攀登上狂风怒号的蒙古高原，冒着生命危险在土耳其斯坦野蛮部落中间；经年累月困守在沙漠的游牧民族中，和运着砖茶的沙漠商队拔涉过干旱不毛的戈壁。终于，四年过去了，他用光了最后一块大洋，再一次回到北京。

他安下心来想找一个工作。最容易的赚钱办法似乎是写作，于是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的编辑答应接受一组有关他旅途的文章。我估计他唯一的困难是从他丰富的经历中去抉选。他知道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或许只有他这个英国人才知道。他亲眼看见过各式各样事物，离奇古怪的，感人至深的，恐惧可怕的，开心逗乐的和出人意外的。他写了二十四篇作品。我不敢说那些都是不可读的，因为这些作品显示着一种细致的同情的观察，然而他却仿佛乱七八糟似的看待着这一切，于是这些作品也就只不过是艺术的原料罢了。这些作品好象是海陆军军需库的目录单，好象是给那些想象家开发的矿藏，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身，不如说是文学的基础。他是这么一个实地考察的自然科学工作者，潜搜苦集着无穷无尽的事实，却没有一点归纳概括的才能：因而所搜集的这些事实还得等待头脑比他更为复杂的人们来加工提炼。他

所搜集的不是植物或动物，却是人。他的收藏是无与匹敌的，但处理那种收藏的学识却浅薄贫乏。

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想辨别他那种丰富多采的经验究竟如何影响了他；虽然即令他是充满着奇闻轶事的一个快活友善的家伙，愿意和盘托出他的所闻所见，我却无法发现任何他的冒险事业曾从心灵深处触动过他。所有他做过的离奇古怪的事情，只不过是说明他生就了一种古里古怪的脾气而已。文明的生活困扰了他，他想摆脱这种捶打的累赘。生活的变幻莫测使他感到其乐无穷。他有一种永不知足的寻奇猎异心理。于是我想到他的经验仅仅是肉体的，从来没有翻译成为灵魂的经验。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到末了你觉得他微不足道。他风度上的平庸琐屑，正是他灵魂上平庸琐屑的真实索隐。在那空荡荡的宫墙后面，是一片白茫茫的空荡。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东西可写而他写得那么令人厌倦，致于写作重要的事情是，不怕没有丰富的材料，而是怕没有丰富的人性。

内阁部长

他在一间面对沙地花园的长方形房间里接待了我。玫瑰在妨碍它生长的灌木丛中凋萎，参天古树无精打采地零丁萧索。他安排我坐在方桌前的一张太师椅上，自己就在我的对面坐下。仆人敬上各人一杯花茶和一支雪茄。他是一个清癯的人，中等个儿，有着一双消瘦、文雅的手；通过金边眼镜，他用大而黑的忧郁的眼睛望着我。他看去象一个学者或演员，笑得很亲切。穿一件棕色缎长袍，上面罩着一件黑色缎马褂，头上戴着一顶宽边低顶的毡帽。

他笑吟吟地说道："因为三百年前满洲人是旗装的缘故，我们中国人也穿起这种袍子来了，你想多么奇怪？"

我回答说："这并不怎么奇怪，如果因为英国人在滑铁卢打了胜仗的缘故，尊驾戴起一顶碗状毡帽来，那才奇怪了。"

"你想我为什么要戴这个？

"我以为这点很容易说明。"

当我担心那高雅的谦让会妨碍他向我了解些什么，我赶快选句话好结束这种场面。

他摘下他的帽子，叹息了一声，无可奈何地望着那上面。我环顾了一下这房间。地下铺着绿色的布鲁塞尔地毯，上面织着大株的花朵。沿墙一溜精工雕刻的紫檀木椅。墙壁的挂画条上挂着卷轴，上面是书法名家的翰墨。与这些风格迥然不同的，是装在闪亮的金色框子里的油画。这些画百分之九十都是正该陈列在英国皇家艺术博物馆里的。部长办公桌是一张美国的桌面可以卷缩的写字台。

他用一种忧郁的中国方式和我谈话。一种文化，最古老的世界知名的文化被粗暴地扫荡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生们，正把这种自古以来一代接一代建立起来的东西无情地践踏掉，而他们却拿不出东西来替代。他们不爱他们的国家，既不对它信仰，也不尊敬。一座一座的庙宇，被信士们和僧侣们糟踏，让它们衰败以致坍塌，到现在它们的美除了在人们的记忆里什么也没有了。

到这时他用他消瘦的贵族的双手一摊，把这问题搁置一边。他问我是不是想看一看他所收藏的艺术品。我们沿着房子走动起来，他领我看了一些算得上是无价之宝的古瓷、青铜器和唐代塑

象。一只从河南古墓里发掘出来唐三彩的陶马，它雍容优美，有希腊雕塑精美造型的风范。在他写字台的旁边的一张大桌上面，放着不少卷轴。他选了一卷拿着顶端让我打开来。这是几个朝代以前的一幅云遮雾断的山水写意画。他用微笑的眼光注视着我观赏的喜悦。这幅搁到一边了，他向我显出又一幅，又是一幅。现在我声明不能让一个忙人为我花费过多的时间，但是他不让我走开，他拿来一幅又一幅的画。他是一位鉴赏家。他高兴地告诉我这些画的流派和时代，和它们作者的雅俊的轶事。

“我希望你能充分估价我的宝藏。”他说，指着装饰他四壁的卷轴。“在这里你能找到代表中国各大家的书法。”

我问：“你是不是更喜欢书法一些？”

“那是无可置疑的。书法更为素雅。它们毫无华媚藻饰之处。但是我完全知道一个欧洲人确实很难鉴赏如此严正、如此素雅的一种艺术的。我想，你品尝中国的事物，不免稍稍倾向于异端。”

他捧出一本图画册页，我翻着那些页子。多美好的东西呀！由于搜集者戏剧性的天性，他坚持现出他珍藏的最后一本。那虽然只不过是一系列的各类的鸟，各种花，几笔挥就的粗糙的石头，但却具有如此有力的对形象的提示，如此伟大的

对自然的感觉，它们是如此活泼跳荡，扣人心弦，简直使你不敢呼吸。这里几小枝盛开的梅花，它那雅洁的新鲜里保有着全部春天的媚力；这里有几只麻雀，在它们蓬松的羽毛里是生命的搏动和震颤。这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业迹。

他带着怜悯的笑问我："是不是美国的行家们也搞得出象这类的东西来？"

至于对我来说这件事最妙的方面是：所有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是一个恶棍。渎职腐化，敷衍塞责，不顾是非曲直，不让任何事情对他阻挠，他是一个压榨的能手。他用极端可憎的方法获得巨大的财货。他是个欺诈、残酷、心怀报复和贿赂收买的人。中国之所以衰败到他如此真正为之悲伤的危险地步，肯定有他的一分。但是当他抓起一只天青色的小小花瓶在他手上时，他的手指似乎用一种着魔的温情扣住它，他的忧郁的双眼爱抚地瞅着它，而他的双唇微微地张开，好象要抽出一声贪欲的叹息。

宴 会

一 使节方面

中国阿根廷银行的瑞士董事宣布到来了。他带来一位高大、漂亮的妻子，她大方地炫耀她的妩媚，使你的神经有一点点紧张不安。有人说她曾经是一个妓女。一位英国未婚小姐（穿一件橙红色缎子衣，挂着珍珠项链）来得早些，用一个微微的冷淡的笑欢迎她。危地马拉的公使和门的内哥罗[①]的代办一同进来了。代办处在一种极度不安的情况下；他不知道这是一次官方盛会，以为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集会聚餐，没有把勋章戴上，而危地马拉公使身上闪耀着许多星章的光芒！我的天哪，这怎么办？这种情绪发生大约有片刻之久，几乎有点象外交上的事变，由穿着绸长袍，戴着瓜皮帽端着鸡尾酒和扎可斯基酒的两个中国仆人出现方转移开来。这时一位俄国公主仪态万

①南斯拉夫地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一小王国，现为南斯拉夫的一个省。

方地走进来。她白头发，黑色的绸服穿得齐了颈项。她看去象那已经老得忘记了年轻时写通俗剧的激情，而现在正用钩针编织物品的维克多兰·萨杜[1]写的剧本里的女英雄。当你和她谈托尔斯泰或契诃夫时，她会极端烦厌，但是当她谈到杰克伦敦时，就变得生气勃勃起来。她向英国未婚小姐提出一个问题，虽说这位处女不复年轻，没有答复。

她问："为什么，难道你们英国人写这样愚蠢的有关俄国的书吗？"

但是这时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出现了。他赋予他的进来一种事件重大的意义。他很高，秃了顶，但举止优雅，同时他穿得很讲究：他有礼貌惊讶地望着危地马拉公使的使人眼花缭乱的勋章。门的内哥罗的代办就夸耀自己是外交使团里最会穿着的人，但是不能十分肯定英国公使馆的一秘是否也有同感，于是他飘然来到一秘的跟前询问关于他穿的饰边衬衫的坦率意见。这位英国人在他的眼睛上夹一片金边眼镜，严肃地把他的衬衫端详上一会。于是回敬那人以一种口是心非的赞美的话。

现在除了法国武官的妻子外，请的客人都到

[1]维克多兰·萨杜(1831—1908)：法国剧作家。

了。他们说她总是迟到。

瑞士银行家的漂亮的妻子说："她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但是在最后，在对每个人为她等了半点钟这一事实付之以高贵的漠不关心的情况下，她悠然来到房间里。由于穿着过高的高跟鞋显得高高的，瘦极了，她穿的那件服装给你的印象是她简直没有穿衣服。她短卷发，肤色白皙，浓装艳抹，看去象后期印象派艺术家的忍耐的格丽赛尔达的那种概念。当她走动的时候，空气中有着浓厚的外国味道的香气。她向危地马拉公使伸出珠光宝气的消瘦的手让他亲着；用几句开心话使得银行家的妻子觉得自己是过时的，外省的和肥胖的；向英国小姐抛出一句不适当的俏皮话，由于了解到法国武官的妻子原是名门闺秀，英国小姐的窘迫感减轻了，同时一口气喝了三杯鸡尾酒。

菜已经端上来了。谈话从洪亮的连珠炮般的法国话，到有几分吞吞吐吐的英国话而变化多样。他们谈到这位外交公使，他刚从布加勒斯特或利马写信来，而那位参赞的妻子发现在克列斯昌拉① 太单调或者在华盛顿太奢华。总而言之，他们发现自己不论在什么首府对他们都没有什么两

①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名。

样，因为他们在君士坦丁堡、波恩、斯德哥尔摩和北京都准确刻板的做着同样的事情，牢固地圈在他们的外交特权里面。同时由一种他们的社会举足轻重的活生生的观念支持着，他们居住在一个哥白尼系从来没有的世界里，因为对他们来说太阳和星星奉承地环绕我们的地球打圈圈，而他们则是地球的中心。没有谁知道为什么这位英国小姐会在这里，瑞士董事的妻子私下说她毫无疑问是一个德国间谍。但是她对这个国家是一个权威。她告诉你中国人有如此完美的态度，那你真得必须知道那位慈禧太后，她是一个完美的心爱的人；你知道得很清楚，在君士坦丁堡她要使你确信无疑土耳其人是这样完美的绅士，因为苏丹王妃法蒂玛是一个完美的心爱的人，又讲一口那么棒极了的法语。虽然她无家可归，无论在哪里，她的国家只要有个外交代表，她就在家里了。

英国公使馆的一等秘书认为这个宴会颇有点驳杂不纯。他说法语更象一个法国人，他比任何一个活过的法国人说得多。这是个讲究风雅的人，他有一种正当的自然倾向。他仅只认识正当的人，和仅只读正当的书；他什么音乐也不赞美除开正当的音乐，他什么图画也不关心除开正当的图画；他在正当的裁缝那里买他的衣服，和从仅仅可能的男子服饰用品商店那里买他的衬衫。你带着麻

木的状态听他讲话。目前你以全部心愿希望他或许会泄露对恰好有一点点庸俗的某种事物有一点爱好：如仅是出于大胆的癖性他声称《灵魂的觉醒》是一件艺术品，或《玫瑰经》是一篇杰作，你一定会感到更为安心。但是他的风雅是完美无缺的。他是完美的，而有一半你怕他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寄托在他的脸上有一种看去象背着不可容忍的负担的人脸一样的神情。而当你发现他写自由诗，你才放宽了心。

二　在一个通商口岸

关于这一次宴会的盛况在英国的餐桌上已经看不见了。桃花心木的餐桌上摆满了银质的餐具而叮当作响。在雪白的织花台布中间是一块黄色绸子的装饰品，这当你在青春时期是不愿抑制到东方市场去买的。在这上面是巨大的餐桌中央插花的装饰物。高银瓶里插着大把盛开的菊花，使你只能看见坐在对面的人的影子，高的银烛台高耸着它们骄傲的头一对一对从桌子这头摆到那头。每一道菜都配上与它相配的特定的酒：雪利酒配汤，霍克酒就和鱼一起上；两道菜之间有两道小菜，一道白色的，一道棕色的，关于这些，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精心的主妇都觉得对于一次正

当安排的宴会是必不可少的。

或者谈话比菜的道数少些变化，因为客人们和主人们在一个令人难堪的长久岁月里几乎每天见面，而每个题目一经提出大家就不顾一切地抓起就谈，自然一下就使它详尽到无话可说的地步了，于是接着来了一个可怕的沉默。他们谈到赛马、高尔夫球和打猎。他们可能想到接触抽象是不好的方式，同时也没有政治可供他们讨论。中国使他们烦厌透了，他们不要说那个；他们仅仅就知道他们的业务所必需的那么一点，同时他们用不信任的眼光去看任何研究中国语言的人。除非他是一个传教士或者公使馆的一个华文秘书，他为什么要去研究它呢？你能花二十五元大洋一个月雇用一名翻译，而这是众所周知的。所有跑到这里来学中国话的家伙，头脑变得古怪了。他们都是一群举足轻重的人。有怡和公司的第一号人物和他的妻子，香港上海银行的经理和他的妻子，亚洲石油公司的人员和他的妻子，等等。他们都穿着夜礼服，有一点点不舒服，好象他们穿了是从一种对他们的国家的义务观念出发，而不大象是对白天服装的舒服的更换。他们来参加宴会是因为他们在这世界上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但是当他们能够体面地告辞离开的时刻到来，他们可能叹一口如释重负的气回去。他们相互之间厌烦得要死。

天 坛

它对着天敞露着，三层圆的汉白玉台阶，一层高于一层，面向东西南北四方有四座上去的汉白玉阶梯。这就是代表着中国人的天体和它的中心之点。四周围绕着大花园，花园外又被高墙环绕着。在这里，年复一年，冬至的晚上，为了天时的周而复始，一代传一代，天子庄严肃穆地来礼拜他皇族原始的缔造者。由亲王、社稷大臣陪同着，簇拥着卤簿和侍卫队，皇帝斋戒沐浴，朝觐天坛。亲王们、阁部们、大臣们都按部就班在他们等级规定的地位恭候着他。乐工们、舞伎们演奏着神圣的舞乐。在无数巨型火炬的昏黄的光亮照耀下，官员们的礼服暗暗闪光。在祭桌上供着恭录的献词：昊天在上——皇帝谨以馨香、玉帛、时馐、粢盛不腆之仪，……他三跪九叩首，额头直至汉白玉石铺的地面。

而就在这个皇天后土的人间主宰叩头的地方，魏拉德·B·安特米尔用一手漂亮粗大醒目的

字迹写下了他的大名，他所来自的国家和城镇，哈斯丁斯、内布拉斯加。那种庄严的某种隐约的传闻已经影响了他，这样，他寻找把他浮生若梦的存在能和对那种庄严的记念连系在一起的东西。他想，这样，当他不复存在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记得他。他追求不朽之名用了这样一种不成熟的方式。但人类的希望常常是渺茫的。因为他刚一迈下那阶梯，就有一个倚着栏杆、装着闲望着蓝色的天空的在旁注意看着他的中国人，走上前来，在魏拉德•B•安特米尔写着名字的地方对个正着吐上一口唾沫，用他的脚践踏着唾沫在他名字上擦了几脚。一瞬之间，就没有留下“魏拉德•B•安特米尔到此一游”的痕迹了。

上帝的仆人

两位教士并排坐着，他们交谈着极其平常的琐事，谈话时彼此都想表示一种各不相同的敬意；而当被告知他们之中确实有件好而相同的令人钦佩的事情时，又不得不惊异起来，因为这两个人有一点也是相同的——谦逊；或许这位英国人比较审慎拘谨，于是比起这位法国人来，就显得更多扭捏做作而较少自然。另一方面他们俩之间的差别几乎是滑稽可笑的。这位法国人快八十了，高个儿，仍挺直着腰膀；他的粗大骨骼，提醒你他年轻时是一个体力非凡的人。现在他力量的唯一的标志，体现在那双异常之大的眼睛里，于是你不得不注意它们的陌生的表情，和闪耀着的光芒。这是一个常常用于眼睛的表性形容词，但我从未想到用它来形容那双眼睛有更适合的了。确实有一股激情在那里面，而且它们似乎要射出光来。它们火辣辣的，这就很难认为是有足够理智的了。它们是一双犹太先知的眼睛。他的鼻子

大而且直，下颔是方而坚定的。任何时候他不会是一个可以开玩笑的人，他青年时候必定是一个可怕的人。或许他眼睛的激情，说明在他心灵极度深处，长期有须以战斗方式才能解决的事情，他的灵魂在那战斗中间大声呼喊，征服着，流着血，必竟胜利了，于是伤口还没有闭合他就狂欢大舞，把创伤作志愿的牺牲献给全能的上帝。他觉得他的老骨头冷起来了，他裹着一件像兵士大衣一样的大毛外套，头上戴顶中国式的黑雪貂。他是一个优美健壮的形象。他在中国已经半个世纪了，当中国人攻击他的教会时，他曾三次死里逃生。他笑着说：

“我相信他们会再来攻击，但是现在要搞这些仓促鲁莽的旅行我太老了。”他耸了耸肩膀，“我要做殉道者。”

他点燃一支长雪茄，以极大的享受喷出一口烟雾。

另一个年轻得多，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到中国来也不会超过二十年。他是英国圣公会的成员，穿一套灰色软呢衣服，打着一条起点子花的领带。他企图使自己看去尽可能不象一个教士。他比一般中等身材略高一点，却那样胖，看去象一简粗短的树桩。他有一张圆圆的好脾气的脸，红红的双颊，一丛灰色胡须，乱七八糟象一把板

刷。他完全秃顶了，但是由于一种可谅解的、动人的自以为是，他让头发长得满长，从一边梳到另一边，盖过他的头皮。于是不管怎样，他得到了一种幻想：他的秃顶盖得好好的了。他是一个愉快的伙计，当他揶揄朋友或被他们揶揄的时候，他笑得由衷，笑声响亮、坦率、真诚。他有一种小学生式的幽默，你可以想象，当有谁踩到一块橘子皮一溜时，他会吓得全身震颤。于是笑声停止了，他会脸红着急，当那突然刺激他的那个人踩得一溜，他好象受伤的是他自己，于是会充满好意和同情心。和他一起呆十分钟而不能认识他心地的善良是不可能的，你觉得要求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不愿意是不可能的，或许在开始时他衷心觉得要使他适应你心灵上的需要有些困难，但你可以肯定，在所有交往过程中他的关心、同情和良好意念会打动你。他是一个钱袋常常对贫困者敞开的人；而他的时间是常常为需要它的那些人服务的。然而，由此而这样说，在他的拯救人的灵魂的事务中他的帮助并不见得十分有效，并不公平。尽管他没能象那位法国老先生那样，使用无可置疑的教堂的权威和苦行僧的热情向你布道。但他真挚的同情，却分担着你的痛苦和不幸。用了他自己的踌躇，不象一个上帝的牧师，而更象一个犹豫、怯懦和你一样有血有肉的

人来抚慰你。他企求和你共享希望，安慰你而使他自己的灵魂同你一道新生。有点什么能贡献出来，这或许是能和别人服务一样的他自己的一种方式。

他的历史略有一点不平常的地方，他当过兵，他还喜欢谈跟柯恩打猎和整个伦敦节跳舞的往事。对于过去的罪[1]他没有不健康的感觉。他说：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大跳舞家，对于现在这些新式舞蹈，我想我一定十分外行了。”

他对过去的好时光没有懊悔也没有一丝留恋，对现在的艰难困苦也毫无怨尤。当他在印度的时候，召命来了。他不明确知道应该怎样办和为什么，它来得那么突然，一个感觉蓦然在他心中腾起：他将要放弃目前的生活，去劝导那些异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但正是这种感觉他无法抗拒，虽然这将给他带来无穷的纷扰。他是一个乐天派，喜欢自己的工作。他说：

“这是一种进展缓慢的事务，但是我看见进步的讯号，我喜欢中国。我不愿意调换我在这里的工作到世界其他地方去。”

两个传教士互相道着别。

---

[1]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徒认为人生就带有“原罪”，战争、狩猎、跳舞等都属于罪愆。

英国人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啊，一两天以后。"

"我们恐怕以后再也见不着面了，我想三月份回家去。"

"家"对他们来说，一个意思是指小镇上的一条狭窄街道，他在那里住了五十年了，自从他还是一个青年人离开法国，他就永远离开了那里；另一个意思是指在柴郡的伊丽莎白大厦、它那光滑的草地和橡树林，在那里他的祖先们已经住了三个世纪了。

客　店

夜幕降临似乎很久了，一个苦力在轿子前面打着灯笼走了一点钟。这灯笼投下一圈微弱的光线，当你行进的时候，时隐时现的，就象来自那繁衍不绝的芸芸众生中的一种美妙的东西若有若无地闪现，是竹丛和稻田里的水的闪光，或者榕树的漆黑的影子。时而一个晚归的农人，他肩头的扁担上挑着两个沉重的筐篮，侧身而过。抬轿的走得更慢了，抬了长长的一天并没有失去他们的精神，他们风趣地喋喋不休。他们欢笑，其中一个还喊出几句南腔北调的歌来。但是大路起坡了，灯笼的光突然投到一堵刷白的墙上，这就告诉你已经达到第一栋可怜的屋了，这些屋子沿着城墙外面的大路两边延伸着。这时候，当簇拥你飞快上坡的轿夫们走了两三分钟后再连跑几步，你就进了城门。窄狭的街道熙来攘往，各店铺里面伙计仍在忙着。轿夫们嘎声嘎气地吆喝“让路”。拥挤的人们向两边分开，于是你通过两溜密

集的好奇的人的藩篱。他们脸上漠然，黑眼睛却神秘地凝视着。轿夫们的白天工作已经完成，大步流星走了几脚飞步突然停住，向右转弯，进了院子，你已到了客店。你的轿子放落在地上。

客店——由有一部分被遮盖了的长院子和两边对开着的房间构成。有三四盏油灯在亮着，环绕它们紧密地投下一圈昏暗的灯光，却使得周围的黑暗更深厚难透。院子的前部塞满了几张桌子，人们围着它们坐着，吃饭或者喝茶。有几个人在玩你不懂的游戏。在大火炉上，大锅里的水不停地沸腾着，大甑里用以供应旅客们的饭已经熟了。堂倌们飞快地用大碗盛了来，冲满了茶的壶也不时送到桌上。稍远的背后，两个赤膊的苦力，扎实茁壮，肌体柔软，坐在那里灌着开水。你走到院子的另一头，面对正门，用一张门帘挡住那些粗俗视线的，是主要的客房。

这是一间宽敞的，没有窗子的房间，捶土地面，整个旅店位置很高，没有天花板。墙壁都刷白了，屋梁显露着，这就使你想起萨西克斯的农家房舍。家具是一张方桌，两张有直背和扶手的靠椅，三四张简陋的木床，上面铺着席子，在这并不很脏的东西上面，你现在就得睡你的大觉。一盏油灯的灯芯发出一丁点光亮。堂倌把你的灯笼拿给你，于是你必须等待着直到你的晚饭被准

备好。轿夫们现在都兴高采烈，因为卸下了他们的负担。他们洗了脚，穿上干净的靸鞋，吸着旱烟管。

这样你觉得过度冗长的书是多么宝贵啊（你为了旅途轻便，你限制自己只带了三本），你是怎样舍不得读完每页的每一个字，因为这样你尽可能长的延宕必定要看完的那可怕的一刻到来！你不得不感谢写长书的作者，当你揭着它们的书页的时候，计算它能维持看多久，你希望它们还不过刚刚一半。你不怎么要求完全清晰，因为那样将会读得很快。一个要把它读两遍才能弄清它的含义的句子不是不受欢迎的；一个深奥的隐喻，引起你充分活泼的想象，一个意趣盎然的暗示，提供你高兴的认可，那都有价值不可估量的分量。好了，假如思想阐述详尽，没有什么奥秘之处了（因为你从天亮起上路，一天四十英里的途程有一多半是你自己用脚走的）这场合你有这么本书尽够了。

客店里忽然贼声大作。望望外面，你看见众多的旅客，一批中国人和几乘大轿来了。他们开了你两边的房间，通过两边薄薄的板壁，你听见他们大声说话直到深夜，用了懒散、悠闲的眼睛，躺在床上你有浑身痛快的知觉，疲劳带来肉体的舒适，你浏览着门槅上复杂精致的花格。院

子里的昏黄的灯光透过门槅上糊着破损了的纸，背着灯那份纷繁复杂的花样是黑的。最后一切寂静了，倘若没有一个人在隔壁房间里痛苦地咳嗽。那是一种特有的反复的痨瘵的咳，听了这种整晚的咳嗽，你真不知这个可怜虫还能活多久。你为自己的粗笨有力而感到欣喜。这时一只公鸡似乎就在你的枕档头大声啼叫；不多远一个吹号的在他的喇叭里吹出长长的暴烈声和一种悲伤的呜咽，客店又重新开始骚动；灯都点燃了，苦力们又为一个辛劳的白天准备他们的负载。

小阁楼

这是在杂货零售商人堆栈的一个角落间成的一间小阁楼，就在天花板下面，你踏着象船上的升降口那样的楼梯才能上去。那是用三夹板从这爿店里隔开的，约莫四英尺高，所以当你坐在桌子旁边的板凳上的时候，你能看到店里的情况和储藏室的货物。这里有一卷卷的绳索，一叠叠的油布，渔民穿的沉重的高统靴，防风灯，火腿，罐头物品，各种酒类，布匹，给你老婆孩子带回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一些我说不出名色的什么。这里有一艘外国船舶在一个东方港口能够需要的一切。你会注意到中国人，推销员和顾客们，他们有种愉快的不可理解的神情，好象都牵扯在这里的肮脏的交易之中。看见有人走进店来，那肯定是一个朋友嘱咐他到小阁楼来和你接头的。通过宽敞的店门口，你看见烈日晒在街上石头铺的路面上，苦力们扛着沉重的货物疾促走过。大约到了中午，伙伴们开始集合了，有两三

个舵手，汤普生船长和勃朗船长，在中国航行了三十年、而现在在岸上有着舒适的寄居处的老海员们，从上海来的不定期货船上的船长，一个或两个茶叶行的大班们。侍者沉静地站着等候呼唤他好拿酒或骰子盆。谈话起初毋宁说是平淡乏味的：一只船进入福州的前一天失事了，安昌号上的轮机员麦克里小伙子打牌赢了一大笔钱；领事的妻子已经从家里出来上了皇后号。但是这时骰子盆绕着桌子挨人转着，输家在小条上划了记号，玻璃杯都空了，而骰子盆又一次轮上来了。侍者又送上了第二轮酒。这些人的舌子迟钝打啰了，顽强的汉子都有点信口开河，他们谈起了过去。有一个舵手知道这个港的五十年前最初的艰难苦楚，啊，那都是些不可思议的日子啊。

他笑了笑说："那你早就看见过这小阁楼了啰。"

现在就是运茶快船来的日子，几十年前常有三十或四十艘这样的帆船停在这港口，等待它们的货物。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钱花，而这间小阁楼就是这个港的生活中心。假如你要找某一个人，怎么不到小阁楼去呢？如果他不在这里，那他一定是最近走了。经纪人和小船长们在这里进行交易，医生没有门诊时间，他中午到小阁楼来，假如有谁生病，他就当时当地治疗护理。这是人们

知道如何喝酒的日子，他们中午来，喝一整下午，假如他们饿了，侍者给他们端来一点吃的，于是又喝到晚上。好运道在小阁楼失掉也在这里得到，因为他们都是些赌徒，一个人可能在一场纸牌上倾注输掉他所有的收入。这些都是令人神往的老日子啊。现在生意没有了，运茶的快船不再走这个港口了，这口岸死了，而这时A.P.C.的，或怡和公司的年轻人，对小阁楼嗤之以鼻。当老舵手谈起那有着腌脏桌子的暗淡的小阁楼，似乎只是那些小船的老船长们生活过一阵，那种大胆轻率冒险的一天是永远也不会再来了。

恐 惧

在旅途中我和他住过一晚。教会恰好就矗立在这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城门外面的小山上。我注意他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不同情趣。传教士的屋子陈设过分的庄重已成规律。客厅有一种没有用过的样子，糊着华丽俗气的墙纸，墙上挂着圣经经文，雕板印刷的感伤的图画——灵魂的苏醒，路加医生——或者说：假如这个教士在这国家传教很久，就有写在红纸卷轴上的贺词。地板上有一张布鲁塞尔的地毯，假如户主是美国人，就有镶大理石的太师椅，假如是英国人，就是硬扶手椅摆在壁炉的两侧。这里有一张沙发，摆设得没有人去坐它，看了那乖戾可憎的样子，也没有人要去坐它。窗子上挂着有花边的窗帘。这里那里随意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陈列着像片和摆着现代瓷器的古董架子。餐厅有一种用途广泛的样子，一张大桌子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当你坐在桌子边人家就要撵着你到那壁炉前去。但是在温格

罗夫先生的书房里，书从地板堆码到了天花板，桌子上文件狼藉，帘子都是浓艳的绿色织物，在壁炉上面挂着一面西藏的旗子。壁炉架上摆着一溜西藏佛像。

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故，我在这个地方的感觉和在大学课堂里得来的感觉一样。"

他回答说："你这样想吗？有个时候我是奥利埃尔学院的指导教师嘛。"

我想他是一个快五十岁的人了，高高的，虽然还不胖，却保养得很好，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红光满面。人家可能猜想他必定是个喜欢打哈哈的快活人，一个健谈和合式的伙伴；但是他的眼睛张皇失措地望着你：那双眼睛是阴郁而没有笑意的；它们那种样子我只好用"折磨人"来形容。我怀疑我是不是在一个使人不方便的时刻去和他打交道，这时他的神思正好致力于令人生厌的事情上面。但不知怎么我总觉得那不是偶然的神色，颇象是存心这样的，对他那样子我弄不懂。你看去他就象在某种方式下得了心病的焦虑不安的那种神态。他由这件事扯到那件事，这时他说：

"我听见我妻子进来了。我们是不是到起居室去？"

他领着我进去给我介绍一个瘦小的女人，戴着金边眼镜，态度腼腆胆怯。那很明显她同她丈

夫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传教士们大部份有各式各样的品质，却没有那种我们最好形容之为在好的教养下成长的那种类型。他们可能是圣徒，但他们不常常是绅士。但是现在冲击我的温格罗夫先生是一位绅士，因为很明显他的妻子够不上称为一个贵妇。她有一种粗俗的腔调。休憩室的陈设我从来没有在一个教士家里看见过。地上铺着中国地毯。一些中国古画挂在发黄的墙壁上。两三块明代的瓷砖，放出一种炫耀的颜色。房子中间放着一张紫檀木桌子，雕刻得极为精致，上面摆着一尊白瓷人物。我随随便便地谈到那些东西。

我的女主人轻快地回答说："我自己不大注意所有这些中国的东西，但是温格罗夫先生摆上它们，我就照我的法子把它们收拾干净。"

我笑了笑，并不是因为我觉得有趣，这时我看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里冰冷嫌恶地一闪，使我吃了一惊。但那一下就过去了。

他柔和地说："亲爱的，假如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那些好了。可以把它们拿开。"

"啊，假如能使你高兴，我不介意它们。"

我们开始谈到有关我的旅行，在这种谈话中，我偶然问起温格罗夫先生他离开英国有好久了。他说：

"十七年了。"

使我感到意外："而我以为你每隔七年有一次休假哩。"

"是的，但是我没有认真休息。"

他的妻子解释说："温格罗夫先生想那样离开一年对工作是不利的，自然，他不去我也不想去。"

我怀疑当初他是怎么到中国来的。这次拜访中许多现实的细节吸引了我，平常你总是发现人们最愿意谈论那些，虽然你靠事实形成自己的看法，而不一定靠他们说的话，更不会靠他们的言外之意。但是我觉得这位温格罗夫先生是既不能直接，也不能间接可以诱导他说出那种私人经历的人。他明显地很严肃对待他的工作。我问：

"还有别的外国人在这里吗？"

"没有。"

我说："那必定是很孤单寂寞的。"

"我想我宁愿这样。"他回答，望着墙上挂的一张画。"他们不过是一些办理实务的人，你知道——"他笑了笑，"对教会没有多大用途。同时他们并不怎么聪明，要不和他们打交道又是极大的困苦。"

"你知道，我们并不真正孤独，"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个福音传教士和两个教孩子的妇女，还有学校里的孩子。"

茶送上来了，于是我们无目的地闲聊。温格

罗夫先生似乎对谈话在尽力应付，而我越来越感到他烦恼地抑制着。他的愉快的态度，不过是力图使之表现热忱，于是我也有在努力应付的感受。我把谈话引到牛津，提到几个他可能知道的朋友，但是他没有给我什么鼓舞。他说：

"我离开家乡这么久了，我没有和任何人保持联系。一个教会又有这么多的工作，它吸引了一个人的全部精力。"

我想他有点言过其实，于是我说道："那倒是，就凭你有这么多书，我想你一定占去不少时间去读它们。"

"我很少读书。"他直接了当地回答，那种声音我知道已经不是他自己的了。

我困惑起来了。关于这个人一定有些什么古怪的地方。最后，我猜想，好象不可避免地，他谈起中国人来。温格罗太太谈到关于他们的人云亦云的事情，这些我已经听见好多教士说过了。说他们是说谎的人，不能信任的，残酷的和腌脏的，但是一线微弱的光可以在东方看见了；虽然教会努力的结果还不是很值得引人注目的，但将来是有希望的。他们已不再相信他们那些老的神明了，同时文人学士的儒家的权力破灭了。一种由乐观主义锻炼的不信任、不喜欢的观点出现了。但是温格罗夫先生缓和了他妻子的苛责。他详细

讲述了中国人的善良天性，谈到他们孝敬父母和他们的疼爱孩子。他的妻子说：

“温格罗夫先生不喜欢听一个字反对中国人，他简直就是爱他们。”

他说：“我想他们有崇高的品德，你从拥挤的街道上他们中间通过，不可能对他们没有那种印象。”

他的妻子笑了：“我不相信温格罗夫先生注意到了这种气味。”

这时有人敲门了，接着走进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她是个穿着长裙子，没有包脚的本地基督徒，同时在她的脸上立刻现出一种畏缩的绷着脸的不高兴的颜色。她向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恰好瞥了一眼温格罗夫先生的脸。当他看见她时那脸上不自觉地流露一种极其现形的厌恶的表情，好象是有某种使他恶心的气味把他的脸弄歪扭了。但这立刻消失了，他的嘴唇骤然扭变为一种愉快的笑。但是这努力太大了，于是他仅只现出一种歪曲的怪相。我惊奇地看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了声“对不起，”起身离开了房间。

“这是我们的一个教员。”温格罗夫先生用通常的准备好了的声音说，这声音以前曾使我感到困惑。“她是非常宝贵的。我对她寄予了无限信任。她有非常好的品德。”

于是，我几乎不晓得为什么，在一瞬间我看到真象了；我看见凡是他的意志上所爱的，他灵魂上都厌恶。我充满了激动，这是一个探险者经历一场盲目冒险的旅行之后，来到了一个面貌迥然一新和一切出乎意料的国土上的可能有的感觉。这些苦恼的眼睛正好说明了它们自己，用一种不自然的声调、用一种分寸得当的克制，他言不由衷地赞美他人，这神气活象一名逃犯。不管他怎么说得好，他恨中国人，这种恨比起他妻子的那种嫌恶来，后者就微不足道了。当他走在这城市的生气勃勃的街道上时，他感到一种极度的痛苦。他的教会生活使他厌恶反感。他的灵魂，好象苦力们的擦掉了皮的肩膀，扁担炙灼着出血的伤口。他没有回家乡去是因为他不能忍受重见他是那么向往的地方，他不读书是因为它们唤醒他对他一直挚爱着的那种生活的回忆与憧憬，而且或许他和这粗俗老婆结婚是为了把自己从他每一本能都渴望着的世界更坚定地割断。他用一种激越的愤慨折磨他那被拷打着的灵魂。

我试图了解这召命究竟如何来的。我想他完全快乐写意地在牛津多年，同时，他爱过他的工作和工作带来的愉快的交谊、他的书籍、他在法国和意大利的休假。他是一个满足了的人，除非是用这种方法消磨他其余的岁月，他没有什么更

好的要求了。但是我不晓得是什么模糊的感觉逐渐抓住了他，使他觉得他的生活过于懒散，过于满足。我想他一直是个虔诚的宗教信徒，而或许某种早期的信念在他的孩提时代就注入他的脑子又长时间被忘掉了。一个要求绝对忠实和崇敬的上帝恨他的创造物在尘世上快乐，在他的心灵深处糜烂。我想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未免太充分满足了，他开始想这是有罪的。一种无休止的焦虑攫住了他。无论如何他用智力、用直觉思考，由于对永恒的惩罚的恐惧而开始战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把中国这个意念放到他头脑里去的，但在最先他必定会由于猛烈的反感把它推到一边的，而或许正就是这个反感的猛烈把这个意念印入了他，因为他发现它萦绕在他的心头无时易释。我想口头上他说过不会去，但是实际上他觉得应该要去。上帝正在追逐他，而不管他把自己藏到哪里，上帝跟到哪里。用自己的理由他挣扎着，但是因为他的心被抓住了，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了，最后，他屈服了。

我知道以后我不会再见到他了，我没有时间消费在平凡的谈话上。在有理性的亲密放肆上可以允许我谈更多熟悉的事情。当我们俩单独在一起的这一刻我抓住了这机会。我说：

"告诉我，假如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你相

信上帝会判处他们以永恒的惩罚吗？”

的确我的问题是未经深思熟虑和不机智圆滑的，因为这个老人他只好闭紧他的嘴唇。然而他终于回答了。

“福音的全部教导说服人得出那样的结论。没有任何论据人们能援引教主耶稣有过明白的话说服得出相反的情况来。”

[illegible]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省里的一位达官贵人正要到京里去，或者是某方面的学者旅行去一个学术中心，再不就是某种原因使他滞留在中国糟糕客栈中的最糟糕的这一个。或许他的这个或那个轿夫藏在什么地方吸鸦片（因为在附近一带这东西便宜，于是你必须准备同你的苦力搞麻烦）找不到。或者一场滂沱大雨拘束了他做一点钟不自愿的囚犯。

房子是这样低矮，你用手能够很容易触到椽子。土墙上盖着一层腌脏的白粉，这里那里剥落了。所有紧挨四壁的粗糙的小木床上是为客栈里的常客苦力们铺设的草垫。太阳单独要使你能够忍受这沮丧的邋遢。它从格子花窗里照进来，一线金黄色的光芒，射到捶土的地面上，现出一种复杂和辉煌富丽的花样。

现在他有片刻闲暇，他拿出石砚，搁了一点水，用一条墨在那上面磨起来，抓着一枝能写漂

亮中国字的毛笔(他确实以他卓越的书法自豪,当他把一轴上面写着孔圣人的闪光简洁的格言的卷轴送给他的朋友时,那是一种珍贵的赠礼)用他的多才多艺的手在壁上画了一枝栖着一只雀子的繁花满树的梅花。他一挥而就,有一种令人钦羡的流畅感。我不知道是什么幸运的机遇,引动了这位艺术家的感触,因为那雀子有着完全的生命的颤抖,而每一朵梅花都在它们的花枝上哆嗦。柔软的春风吹过这小品进入那腌脏的房间,因为有了一次脉搏的跳动,你接触到了不朽。

女王陛下的代表

他是一个不到中等身材的人，有一头硬的刷了般的棕色的头发，一小撮牙刷似的小胡子，他的蓝色眼睛通过镜片肆无忌惮地望着你，几乎有点不太正常。他的外貌上有一种挑战式的鲁莽，使你想到这是一只公麻雀。当他请你坐下和问你有什么事情，当其时他正在整理狼藉在桌上的文件，虽然你在他有重要的事务的时候打扰了他，你还是有那种他在寻找机会把你安排在合适情况下的感觉。他已经养成了完美无缺的公事态度。你只是公家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讨厌之物而已，为你的存在仅有的辩护就是你没有争论或迟挨地去做他要你做的事。但是甚至公事也有它们的弱点，有时不知怎么地碰巧使他觉得很难把一件事情办到结尾而不向你吐露他的苦衷和不满。也有这样的人，特别是教会的，认为他是目空一切和飞扬跋扈的。而他使你确信他认为教会里有一大批好人，但也不讳言他们中间有不少是不学无术

和不可理喻的。他不喜欢他们的态度。在他的管辖区大部分都是加拿大人，就他来说他不喜欢加拿大人。至于说他装出一种优越的神气(他把夹鼻眼镜在他的鼻子上夹得更牢些)，这是夸大到荒谬地不真实的。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去交往和援助他们，但惯例是一定用他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按他们的需要去援助他们。听他板起脸说话是很难堪的，因为你觉得他说话的每个字是如何使人恼怒，对他管辖下的倒霉的人们必定也都是如此。他的态度是令人叹息的。他发展到有这样一种本领，暗中挑剔使你不愿经常见到他。一句话，他是一个爱虚荣，易激怒，自以为是，和令人厌倦的小人物。

在辛亥革命期间，当时在敌对各方战斗着的城里到处着火。他偶然来到南方总督那里联系办理侨民安全的公事，在衙门里通过时偶然遇见带出三人囚犯去执行死刑。这些人都是战争中的俘虏，他们遭到残暴杀戮。他要带领行刑队的官员停止执行，想象得到这会遇到什么样的情绪激烈的抗议。那官员听了领事的话粗鲁地告诉他，他必须执行命令。领事发火了，他不能让一个该死的中国官吏那样对他说话。一场争吵接着发生了。总长听到发生了什么事的报告，打发人请领事到他那里去，但是领事气得脸发青，不等到三个可

怜的谛力移交到他的妥善保护下拒绝走开。那官员挥手要他让开，同时命令他的行刑队瞄准目标。于是领事（我可以看到他夹好他鼻子上的眼镜，他的头发可怕地竖立起来），于是领事走到步枪和三个悲惨的人中间，咒骂着，叫兵士们开枪。这就发生了犹疑和混乱。很明显这些反抗者并不要枪毙一名英国领事。我猜想经过一场匆促的协商，三个俘虏交付给他了，于是这位小人物凯旋回他的领事馆。

他盛怒地说："先生，该死的，我几乎以为那些下流家伙会有那种该死的厚脸皮来枪毙我呢。"

英国有一些奇异的人，假如他们的态度和他们的勇敢一样好而伟大，他们应该得到这个看法。他们有自己的特性。

燕子窝

在舞台上装置了一套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布景：暗淡的灯光，房子低矮而污浊，在一个角落有盏灯在一个丑陋的像前点着，香的烟用它异样情调的气味充满着戏院。一个蓄着辫子的中国人往来徘徊着，孤零而阴郁，一会儿在可怜的草荐上躺满了那些麻木了的毒物牺牲者。不时他们中间的一个发出一阵狂乱的谵语。这里有一种高度戏剧性的场面，当某一个可怜的家伙没有钱满足他的癖好时，于是向那恶棍似的老板不断祈求，连声发誓，哀哀乞讨一袋鸦片止他极度痛苦的烟瘾。我曾在一些小说里读过这类同样描写而使我感到不寒而栗。当我被一个花言巧语的欧亚混血种人带到一间燕子窝——鸦片烟馆，上那窄狭、盘旋的楼梯时，他引导、安排我去满足地接受一次我所期望的毛骨悚然的体验。我被引进一间十分清洁，灯光明亮，隔成两个小间的楼房：增高了的地铺上铺着干净的草席，形成一种方便的铺

位。在一个铺位上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一头花白头发和一双优美文静的手，正静静地读着一张报纸，长旱烟管放在他旁边，另一个铺位上正躺着两个苦力，烟枪在中间，他们俩轮流打着烟炮抽烟。他们都是年轻人，有一种精神饱满的样子，都对我友好地笑着。其中一个请我抽了一筒烟。在第三个铺位上，四个人蹲坐围着一个棋盘，再稍远一点的铺位上，一个男人摇摆抚弄着一个婴儿（这是一种不可理解的东方人所特有的对孩子的激情），一会这婴儿的母亲，我看是这店主的妻子，一个肥胖的、面貌悦人的妇女，望着他，嘴唇上带着明朗的笑。这是一个愉快的地方，象家一样的，安逸而舒适。这使我想到柏林的那些小而熟悉的啤酒店，在那里疲倦了的工人晚上去度过一段安宁的时刻。虚构的小说总是比事实离奇。

最后的机会

她到中国是来找人结婚的，这事是那么哀婉动人而且明显异常，在这通商口岸没有一个单身男人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缘故几乎造成了悲剧呢？她是一个大个儿女人，有一副笨拙的形象。她粗脚大手。有一个大鼻子。确实，所有她的五官都是大的，但是她的蓝眼睛是美的。或许，她也有一点点意识到了这些。她是个白肤金发碧眼的人，有三十岁了。穿着蓝绸衫，用以增强她眼睛的颜色，这是一件什么外省裁缝照着时装图上的型样裁剪的上衣。当她企图使自己能引诱人时，她是一个极讨厌的不安详的人物。她希望的是所有未婚男人的一切。当其时他们中一个人谈到打猎，她欢喜地听着，而当另一个人说到有关茶叶的货运，她也愉快地听着。当他们讨论着可能下星期要举行的赛跑，她又少女似兴奋地拍着手板。她和一个美国青年不顾一切沉迷在跳舞里，而她又缠着要他允许带她去参加棒球比赛，但是

跳舞并不是她唯一关心的事物，一桩好事情有时会也觉得腻味的。于是，又找了一个老的，但是一家重要洋行的大班的单身汉。她简简单单地就是爱的去和他打一盘高尔夫球。她正在自愿地被一个在欧战中失去一条腿的年轻人教她打弹子球，同时她把她的生气勃勃的关切给予一个银行经理。这个人向她讲他想着的什么银本位。对中国人她没有多大兴趣，因为这是在这个她能发现她自己的圈子中间还没有形成的议题，但作为一个女人，她没有办法去反抗那种中国妇女都被那样对待的方式。她解释说：

"你知道，他们没有一句话说过谁准备结婚，那都是由媒人安排的，直到结婚时男人还没有见过那女孩子一面。那是没有风流韵事或诸如那类东西的。而当恋爱火热地进行着……"

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她是一个完全天性善良的人，她能给他们任何人，年轻的或年老的，当一个完全的好妻子。她懂得这点。

修　女

女修道院雪白而冷静地座落在小山巅的树林中间。当我站在大门前，等候引我进去时，我望着山下面在日光下闪闪发光的黄褐色的江水，和江那边嶙峋崎岖的群山。女住持，一位恬静的，面容和蔼的小姐，用柔和的声音和一种一听就使我知道是从法国南部来的声调，接待了我。她领我看了她负责管理的孤女们，她们忙着女修道士教导的编织花边，羞怯地笑着。她又带我去看医院，那里睡着一些兵士，他们分别患着痢疾，伤寒和疟疾。他们都是贫穷可怜和肮脏的。女住持告诉我她是巴斯克人。她从女修道院的窗子望着外面那些山，使她想起比利牛斯山脉。她在中国已经二十年了。她说再也不能看到海了，有时是难以忍受的，在这里的这条大江上离海已是千里之遥了。因为我熟悉她所出生的那个国家，她对我谈到一点点翻过比利牛斯山脉的良好的道路——啊，在中国，这里见不到那葡萄园，那农民的村

子和流过村子的滚滚溪流半隐半现在那小山脚下。但是，中国人是善良的人民，孤女们手脚快而勤奋。中国人找她们做妻子，因为她们在女修道院学了有用的手艺，甚至她们结婚后仍能用她们的针赚得小部分收入。这些兵士们也一样，他们并不像人们说的那样坏。终究这些可怜的小人物，他们并不想当兵，他们只想立即回到家里去种田。在病中姐妹们护理了他们，他们不是没有感激的。有时当他们坐着轿子一道而来赶上两个修女（她们在镇上买了一些东西，左一包右一包地扛着），他们会提出要她们把包包放在轿子上面。骨子里，他们不是坏心眼的。

我问："他们总不至于到这样的程度，即下轿让修女们坐他的轿子吧？"

"一个修女在他们眼里仅仅是一个妇女，"她宽容地笑了笑，"你应当不要求人们比他们能够给予的更多。"

"多正确！可是细想起来够多冷酷！"

汉德生

望着他而不忍俊不禁那是困难的，因为他的外表立刻把他的一切告诉你了。当你在俱乐部看见他读《伦敦信使报》或者吊儿郎当地在酒吧间里把杜松子酒和苦味药酒放在肘间（不会有鸡尾酒给他），他的那种与众不同的架势，将引起你的注意。但是立刻你认识他了，因为他是他那类型的一个完美的标本。他的与众不同是精美地合乎常规的。有关他的每件事，从他的方头的方便耐用的靴子到他的比较不修边幅的头发，都是合规格的。他穿一件现出粗颈项的宽松矮领、有点松垮，但裁剪得很得体的衣衫。他总是吸一只用欧石南根制成的短烟斗。在吸烟这个题目上他是很幽默的。他是一个长得相当大的家伙，体格健壮，有一双美好的眼睛和令人愉快的声音。他谈吐流利，他的语言常常是猥亵的，这並不是他的头脑不纯，而是因为他的癖好是平民化的。当你从他的神情去猜，（不是在事实上，而是在精神上）他和

切斯特顿[1]先生喝过啤酒，和H·裴洛克[2]先生在萨西克斯草原上散过步。他在牛津踢过足球，但是和威尔斯[3]先生在一起时，他看不起古老的学府。他认为萧伯纳过时了，但对G.巴克[4]仍然很有希望。他和S.韦布[6]夫妇有过多次一系列的谈话，同时他是费边社的一个成员。他的唯一观点是不论在哪里，凡是他接触到的这相同的世界都是轻浮不足道的，唯有俄国的芭蕾舞是他欣赏的。他写关于妓女、无聊汉、路灯柱子、妓女感化院、小酒店、乡村教区牧师住宅的粗俗难听的诗。他拿着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开玩笑。但另一方面（他不是愤世嫉俗者），他不能听一个字贬低泰米尔人、孟加拉人、卡菲尔人[6]、德国人或希腊人。在俱乐部里他们都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颇为粗野不驯的家伙。他们说：

“你知道，一个社会主义者。”

但他是一家著名的和受尊重的洋行的小伙计，在中国有一个特殊事物，就是你的地位原谅了你的特癖。或许你打老婆弄了名，但是假如你

---

①切斯特顿：英国作家。

②H·裴洛克：出生在法国的英国评论家、诗人。

③威尔斯：英国小说家。

④巴克：英国戏剧家。

⑥S韦布：英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

⑥卡菲尔人：南非说班图语的居民。

是一家信用卓著的银行的经理，那世人都会对你客气，请你吃饭。所以当汉德生宣布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时，他们只不过是笑笑而已；当他第一次来到上海时，他拒绝乘用黄包车。那违反了他的观念，那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同属人类的车夫，要拉他从这里到那里到处转，这有损对他的人身尊重。所以他走路。他发誓那是一种好的锻炼，对他合适。除此以外，走路给他带来口渴，他所赚不过二十元大洋，而他喝啤酒却成了嗜好。但是上海非常热，有时他又很忙碌，所以他不时被迫要使用这退化堕落的交通工具。这使他觉得不舒服，但那东西的确方便。现在他变得经常乘坐起来了。但是他常常想这两根车杆中的这个伙计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

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上海三年了。我们一起在这中国城市度过一个上午，从一家商店到另一家商店，我们的黄包车夫热得汗流浃背，每一两分钟他们用破烂的汗巾在额头上揩着。当汉德生想起他非得要现在就去俱乐部买刚到上海的柏特拉德·罗素先生的一本新出的书怕赶不到时，他要车夫停下来，打回转。我说：

“你想是不是午饭以后再去？那两个家伙汗得象猪一样了。”

他回答说：“这是他们的好运道，你不必对中

国人有任何关心。你明白，我们之所以在这里就是因为他们惧怕我们。我们是统治的民族。”

我没说一句话，我甚至也不想笑。

“中国人总是须要有他们的主人，而他们也总愿意如此。”

一张过路的汽车把我们分开了一会，当他再一次和我并排而行时，他把这件事放开了。他评论说：

“你们住在英国的人不知出版了新书在这里对我们是怎么一回事，我读每一本柏特拉德·罗素的著作。你看了他最近的书吗？”

“《自由之路》吗？读过；我离开英国前读了那本书。”

“我已经读过几遍了。我想他是抓住了某些有趣的观念。”

我想汉德生正准备评述那些观念了，但是那个黄包车夫拉过了应该转弯的地方。

“在街角上拐弯，你这该死的蠢家伙！”汉德生叫喊着，同时为了加强他的意思，他在那车夫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

黎　明

这不是晚上，客店里的院子到处被黑暗深沉地笼罩着。灯笼投出闪动不定的光照在为旅行忙于准备担子的苦力们的身上。他们吆喝笑闹，带气地互相争论，喊喊叫叫地喧吵。我来到街上，由一个孩子打着灯笼在前面引路沿街走着。居民家里的鸡鸣之声此起彼伏。但是不少铺店的板子都已经卸下来了，不辞劳苦的人们已经开始了他们漫长的又一天。这里有一个学徒正在地板上哭泣，那里有一个汉子在洗着手脸。一碟油灯里一根燃着的灯芯是他唯一的光亮。我经过一家小饭馆，有五六个人坐在那里吃早饭。卡子门关着，但是看门的人领我从侧门出来，于是我沿着一道墙，一条懒洋洋地流着的小溪走着，溪水上面闪灼着星光。我来到了巨大的城门前面，这时城门已经半开。我走出城去，这里等着我的，满是阴阴古怪的黎明。这才开始的一天，这漫长的旅途，和开阔的乡村展现在我前面。

灯笼熄灭了。我背后的黑暗转淡成了紫色的雾霭，于是我知道它马上就会燃成玫瑰色的红晕。我对这条大路熟悉得一清二楚，同时稻田里的水已经反射出苍白的斑斑点点的光。夜晚没多久了，但这还不是白天。这是有着极为不可思议的美的时刻，这时那许许多多的小山，峡谷，树林和水都有着非人世间所有的神秘感，因为当待会儿一旦太阳升起来，一时间世界都会显得异常惨淡，灰暗的光线就象画室的冷色调，大地上将顿时失去婆娑荫影的生动多姿。我沿着一座长满树木的小山的崖边行走，眺望着山下的稻田。但是称它们为田未免太夸大了：它们构造在这山的斜坡上绝大部分象一块月弯形的补钉，这块在那块下面，为的便于灌溉。生长在山谷里的松树和竹子，宛如被一个灵巧的园丁出于一种整齐美的观念，形式上模仿大自然的随意摆布而安置在那里的。在这迷人的时刻你不要只看见那卑微辛苦的景象，而要看成是一个皇帝行乐的御花园。在这里，他把对国事的关心丢在一边，可能穿着黄色的龙袍进来，手腕上带着嵌着珠玉的镯子，带着一个妃子进来游乐。妃子是那样漂亮，若干朝代以后使人觉得假如因为她的缘故而倾城倾国，那是极自然的。

现在白昼已逐渐来临，一抹雾霭从稻田升起

爬上明净的小山之腰。眼前景象你或许看过一百幅画图了，因为这是中国古代名家最爱画的。这小小的丘陵，树木一直长上山顶，沿着山脊的一排松树成了一条清晰的轮廓与天相接。重峦叠嶂，直插天际，云腾雾涌变幻莫测，形成一种完美的图案，容许想象有着丰富的意境。竹子一直长到路边，它们的纤纤薄叶在微风下婆娑弄影，显得高贵优雅，所以看去宛若一群大明时代的宫女娇柔无力地在路边休憩。她们或许到某座庙宇进香去来，丝绸的服装上绣满了富丽精美的花朵，头发上簪满珍贵的花钿翠玉。她们站在这里休憩，极有风度地闲聊，但是她们并不知道教养最好的用处，是以卓越的风范谈论无谓的琐事。过了一会儿，悄悄地走进轿子，她们要走了。路拐弯了，我的上帝，这些竹子，这些中国的竹子，被某种魔力无边的雾气所变幻，看去就象肯特郡田野里的蛇麻子草。你还记得那种喷香好闻的蛇麻草田和那又肥又绿的草地吗？铁路线沿着海岸铺展，长而闪光的海滩和荒无人烟的英吉利海峡的灰色吗？海鸥在冬天的寒冷里飞翔，忧郁地叫着，令人凄然。

名誉关头

妨碍不同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没有象彼此不切实际的看法更害事的了。每个国家对各自的特性怀有感情，然而没有一个国家象法国那样从它的邻国遭受那么多的误解。它们曾经被认为是一个轻浮的民族，不可能有深刻的思想，轻率无礼，道德败坏和不可信赖。即令有些美德已被承认，诸如他们的才华出众，他们的快乐欢愉，也是以一种恩赐的方式予以承认的。至少就英国来讲就是如此，为的他们的美德不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贮藏丰富。之所以产生这些误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了解法国的品质本质上有一种深厚的庄重，这种庄重突出地为一般法国人所关心，其实也就是关心他本人的尊严，那是没有一点含糊的，因为法国作家及道德家拉劳士福德——一个人性的一般方面和他的同胞的特殊方面的敏锐的裁判，已经把名誉作为他思想体系的中心。我们的邻居把要求自己矜矜细行，也常常用来款待我们不列

颠人，不列颠人则习惯以幽默看待自己，正如这语词所表明，这是一种充满生气的力量。法国人也有这种力量，但除非你脑子里经常装着他对名誉观念的敏感性，你就莫想能够了解他。

不论什么时候当我看见维康姆特·德·斯蒂乌尔德驰驱着他豪华的小汽车，或坐在他自己的桌子前面，就使我联想到上面那些见解。他代表着某些法国在中国的重要利益，据说他在法国外交部比外交部长更有势力。自从他的太太，他的侨民之一，不无反常地怨恨背着他与中国人从外交上打交道以来，他们夫妇之间就再也没有亲密的感情了。德·斯蒂乌尔德先生在家里维持的尊敬，由钉在他礼服大衣衣衿上的红色小圆徽章就充分地证明了。

维康姆脑袋硕大，有点秃，但不是有失体面的（正如法国小说家描写的那样微微秃一点儿，因而就消除了这残酷事实的刺痛的一半），有一只伟大的威灵顿公爵①式的鼻子，厚眼皮下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和一张遮掩在一丛非常漂亮的小胡子里面的小嘴。他总是用雪白的，戴着珍贵宝石戒指的手指拈着须尖儿。他的尊贵神气由三重夹下巴而更加增高了。他有一个巨大的躯干和一种堂

①威灵顿：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的英国名将。

堂一表的肥胖，所以当他坐在桌子前面的时候，总是略微离得远一点，好象他在控制之下吃东西，而且只吃一小点。但是造物主对他玩了一点卑鄙的伎俩，虽然是不常见的，但耍了花招，就是他的双腿对他的上身来说太短了些。所以，虽说坐着他完全有一个高大的人的外表，但你会吃惊地发现，当他站起来时还不及一个普通人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坐在桌子前以便造成最好的效果，或者当他在城里通过时要驰驱着小汽车的缘故。比如说，这时他要出席的事被宣告了，当他对你挥手，或者用一个明显的手势取下他的帽子，你觉得这是他对人的难以置信地和蔼可亲的随意招呼。他有路易菲力普[1]时期那些政治家的全部完整的体面，穿着朴素的黑衣，蓄着长发，脸颊刮得光净，用一种来自安格尔[2]油画像上的那种自命不凡，一本正经地对面望着你。

一个人常常听得说有人说话象一本书。德·斯蒂乌尔德先生说起话来就象一本杂志，不，自然，一般的一本杂志提供轻松愉快的文学作品和使人消遣一段闲暇的时间，但我说的是一本有正确的知识和有影响的论文的杂志：德·斯蒂乌尔德先生

①法国国王（在位时间1830—1848）。

②法国画家。

说话就象《两个世界评论》①。虽说听他说起来有一点疲劳，但那是一种款待。他能够流利地说一件已经说过三番五次的事，从不为某一个字犹豫。他神志清醒地处理每一件事情，措辞令人钦佩。在他有如此权威的嘴里显然能说出一个警句的全部火花。他决不是没有机智的人。在有损他邻人的情况下他是个很能逗人笑的人。而当说了某些恶毒的事情时，他转过来用一种观察的注意对着你，说你"老是心不在焉"，运用一句原装警句的新鲜应景来掩饰过去。他是个热情的天主教徒，但是，他吹捧自己绝不反动。是一个有名望，有财产，有原则的人。

一个可怜的人，但是野心勃勃（名望，崇高思想的最糟糕的弱点）为着食糖经纪商的女儿，有巨大的嫁妆，他和她结了婚。她现在是一位浓妆艳抹，有着棕色头发，穿着华丽衣服的小巧的太太了。当他给予她以他的荣誉的姓氏，他却无法也一同赋予她以个人的自豪感，而这恰好是他所有行动中挖空心思想达到的。这一失败一定对他是一种痛苦的考验。因为，象许多大人物一样，德·斯蒂乌尔德先生也是和一个对他极不忠实的妻子结了婚。但这是个不幸，他用勇气和绝对

①法国出版的一种杂志。

独特的高贵忍受着。他的行为是这样完美无缺，他的不幸事件确确实实是朋友的眼睛亲自看见提供他的。他是所有人的同情的目标。他可能是一个戴绿帽子的，但是保持了一个人的品质。真的、不管什么时候德·斯蒂乌尔德太太得到一个新情人，他就坚决要求她父母给他一笔足够数目的钱，以为凌辱他的姓氏和名誉的补偿。通常传说估计二十五万法郎，但是目前这样看涨的银价，我相信一个事务人一定会坚持要用银币支付的。德·斯蒂乌尔德先生已经是一个自私和刻薄的人，但是在他妻子达到教规的年龄之前，他将毫无疑义成了一个富翁。

不堪的重负

当你第一次看见苦力挑着担子在路上走，触到你的眼帘是逗人爱的目的物。他穿着蓝布破衣服，所有的颜色都是蓝的，从靛蓝到青绿，直到淡蓝色的天，他与这风景是非常配合的。当他沿着窄狭的两边都是稻田的大路艰难跋涉，或在绿色的小山上攀登，似乎确切是至当不移的。他的衣服就只是一件短褂和一条裤子。假如在开始的时候算是一套完整的衣服，他也不会想当这套衣服补得不能再穿了去选段衣料时，调换一个不同的颜色。手边有什么他用什么，不管天晴落雨，他头上都戴着一顶样子象消防员那样的不过边檐宽得多的草帽。

你看那一个跟着一个一溜上路的苦力，每人肩上一条扁担，两头各挂着一大捆东西，他们造成一种令人惬意的图景。看着在稻田水里面反射的他们匆匆忙忙的倒影，是非常有趣的。当他们走你面前过身的时候，你只去注意那些脸，每一

张都是天性善良和坦率无邪的。你会要说这是不是有了东方景象是谜一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当你看见他们的担子歇在榕树底下的土地庙旁边，吸着旱烟，愉快地闲谈，假如你去试试举了举他们一天要挑三十英里或更多路程的担子，对他们的能吃苦耐劳和他们的精神似乎会自然而然地觉得钦佩。但是你也会想到假如你用钦佩的口气提及到中国古老的居住者总有几分荒谬，人家会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对你耸耸肩膀然后告诉你：那些苦力两千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一些牲畜，他们从父亲到儿子都挑惯了那种担子，那就无怪他们能愉快地做那种事情了。但是，你真正能够看见他们劳动开始得很早，因为你遇见很小的孩子就在背在肩头上的草料筐的重量下摇摇晃晃。

时间消逝，天渐渐热起来。苦力们脱去了上衣，打着赤膊走着。当一个人要休息一会儿，他们把担子放在地上，扁担仍留在肩膀上，这样他就要颤巍巍地弯腰躬着；你于是看见那可怜疲倦的心脏在他的肋骨下面跳动，就象你清清白白在医院门诊病室里看见心脏病人的心脏跳动一样。这是不常看见的，看去使人痛苦的苦力的背：长年的扁担的压榨，日复一日，留下红硬的瘢疤，有时甚至还有裂开的疮口，巨大的疮伤，没有绷带或敷裹，木扁担就在那上面摩擦。而一切奇怪

事情中最奇怪的就是，有时好象是人体的本能为了适应要在上面放东西的这种残酷的用途，似乎已经出现了古怪的畸形，那就是产生了象骆驼峰那样的小隆肉，于是扁担就放在那上面。但是跳动的心脏或麻辣火烧的发炎的疼痛，不管苦雨烈日，从黎明到薄暮，年复一年，从童稚一直到垂暮之年，他们永久地继续下去。你看见老人们骨瘦如柴，皮包着骨头，形容枯槁，他们瘦削的脸上猴子似的满是皱纹，头发稀薄斑白，蹒跚在他们的负担之下，一直走到坟墓，他们最后休息的边缘。这时苦力们仍在赶路，不是明显地在跑，但也不是在走，而是急促地跨着大步。他们的眼睛望着地而选择每一点可以踩脚的地方，他们的脸上是一种绷紧的焦急的表情。当他们奔赶路程的时候，你眼前再也不能形成什么惬意图景了。他们的艰苦努力使你感到沉重的压抑。你是空有着一肚子无用的怜悯与同情。

在中国，人就有着这种人所不堪的负重。

“由于为颠连困苦的人生所烦扰，同时人生如白驹过隙，一个人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是可怜的事实？无休无止的劳动，然后没有日子去享受果实。精疲力竭，突然饮恨而殁，一切茫然不知所措，这不恰好就是悲哀的所在吗？”

如是写了中国的神秘。

麦卡里斯特医生

他是一个仪表优美的人，快六十岁了，我想，当我认识他时，矍铄而有活动力。他生得结实，但是他高大肥胖的身材不能使他的举止雍容庄重。他有一张坚强甚至是漂亮的脸，配着一只钩鼻子，浓密的白色眉毛和一个坚定的下巴。他的穿着是黑的，一件低领衬衫，打着一个白色蝴蝶领结。他有一个老一代的英国牧师的样子。他的声音洪亮、热忱，笑起来乐呵呵地。

他的经历有点异乎寻常。他是三十年前作为一个医疗传教士来到中国的，但是现在，虽然和教会有着良好的关系，已不再是它的成员了。事情是这样决定的，开初医生提出一个主意，在某一个合乎条件的地点建造一所学校。在一个人口稠密的中国城市里是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建校地皮的，当教会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最后终于买成了一块，就发现这地的所有人并不是中国人，与之进行谈判的就医生他自己。他知道那学校必须建

立，看起来又没有另外一块更合用的地方，他就从一家中国银行借了钱，自己先把那块地买下来。这笔交易是不诚实的，而且或许还有点不道德，而教会的其他人员并不把这看成是麦卡里斯特医生开的好玩笑。麦卡里斯特医生虽然和这些人维持有友好的关系，对他们的目的和利益充满着同情心，虽然他们甚至说出某种刻毒言语，其结果还是他辞去职务。他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灵巧医生，于是不久他就在外国人和中国人中间进行他的大实验了。他开设了一家旅馆，客人们在一间相当高级的旅馆，能够以高的代价有伙食和住宿。他的客人有点懑怨就是不允许他们喝酒，但是那比一家中国旅馆舒服多了，同时有些许可范围还是根据医生的原则制订的。他是个灵机应变的人。他在河对面小山上买了一大片土地，在那上面盖了一些有游廊的平房，一幢一幢卖给传教士作为避暑胜地，同时他拥有一家大百货商店，那里面什么都卖，从美术明信和稀奇古怪的东西，到辣酱油和毛线织的连衫裤的童装，这些都是一个外国人可能要买的。他那店里办出了一些好事情，他有一种商业的癖好。

他邀请我吃的午餐确实是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盛会。他住在他百货店楼上的俯瞰那条江的一间大房间里。参加这次宴会的有麦卡里斯特医

生和他的第三个妻子，一位戴着金框眼镜，穿着黑缎子衣服的四十五岁的太太，一个到内地去的和医生一起呆几天的传教士，和两个不大作声的年轻小姐，她们刚参加教会，正忙着学习中文。在餐厅的四壁挂了不少祝贺的条幅，这些都是中国朋友送给我的主人作为他的五十大寿和脱离教会的礼物。办了不少在中国常见的菜，麦卡里斯特医生大吃了一顿。在宴会的开头和末尾都做了一次长的感恩祷告，他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宗教热忱用低沉的声音念着祷词。

当我们重新回到起坐间的时候，麦卡里斯特医生站在令人亲切的火炉的前面，那时在中国还很冷，从壁炉架上取下一帧照片给我看。他问：

“你知道这是谁？”

这是一个很瘦的年轻传教士的相片，穿着矮领衣，打着白蝴蝶领结，有一双忧郁的大眼，和一脸深切的严肃。

“漂亮的小伙子，呃？”医生爽朗地说。

“很漂亮，”我回答。

青年人可能有点自命不凡，但是自命不凡在青年人是一种可以原谅的缺点。在这里，它有一种祈求似的沉思的表情，无疑精神是平衡的。这是一张端正、敏感甚至是美丽的脸，而这双郁郁不乐的眼睛还生疏地在动哩。这里有宗教狂热，

或许这就是有殉道的勇气。这里有一种迷人的理想主义，而它的年轻、它的单纯，温暖了一个人的心。

我回到这张相片上说："一张非常有吸引力的脸。"

麦卡里斯特抿着嘴微微笑着，说：

"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我就是这么个样子。"

那是他自己的一张照片。

麦卡里斯特太太笑了笑："没有人能认出它了。"

麦卡里斯特说："这就是我当日的形象。"

他把黑大衣的后襟撩开，挨坐在火炉前。他说：

"当我想起对中国的最初的印象时，常常觉得好笑，我出来是期望经受苦难和贫困的。我的第一次冲击就是轮船一餐十道菜和一等舱里的招待设备。在那里我没有看到什么苦难，于是我对自己说，等到了中国再说吧。好，在上海我会了几个朋友，就这样我住进了华丽的房子里，由美好的仆人伺候着吃着美好的饮食。我说，上海，这是东方的罪恶渊薮。在内地一定完全不会相同，最后我到了这里。我和教区的头头住在一起，一直到我已满二十五岁。他住在一个围墙围起来的大院子里。他有一幢非常美好的房子，里

面陈设着美国家具，我睡着一张我从来没有睡过的床。他非常喜爱他的花园，里面种着各式各样的植物。我们有就象在美国有的那样的生菜和各种水果；他喂了一头奶牛，于是我们有鲜牛奶和白脱油。我想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这么多和这么好的东西。我无所事事。假如你要一杯水，你喊听差于是给你倒杯水来。我到那里的时候是初夏，他们就都收拾上山避暑去了。他们在那里买得有附着游廊的平房，但是他们却惯常在一座庙里歇暑。我开始想我根本不要忍受什么贫困好了。我曾经盼望有一顶殉道者的桂冠。你知道我做了什么？"

麦卡里斯特医生想起漫长的过去，不禁暗自好笑起来。

"我来到这里的第一晚，当我一个人在房子里的时候，我倒在床上，于是象一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

麦卡里斯特医生继续说下去，但是我不能更多地注意他讲了些什么。我惊讶从什么时候起他变成了今天我在这里认识的这个人。这是我很想写出来的故事。

路

这不算一条什么车马大道，只不过是行人大路。中间用约一英尺宽的石块铺砌而成，整个路面约四英尺宽，所以恰好能使两乘大轿小心对面通过。就绝大部分来说路是修补得好的，但是也有这里那里石块残缺了，或者被两边稻田里泛滥的水冲跑了，于是行走就有些困难。最初在一千年以前这是沿着连接这个城市与那个城市之间的通道，或者早至有城市之前它就在这里弯弯曲曲地蜿蜒着了。它蜿蜒在稻田中间，在谨慎的漠不关心之下随着这地区的人世沧桑而变迁；或许你会说这是在过去模糊的年代农民走出来的，他们寻求的不是通衢直达，不过是取简便易行罢了。上路一开始你就想什么时候不走这主要的道路而抄近路通过这地区，结果你还是不得不časť路经过某些离开了主要交通线路的市镇。假如你在这些稻田的中间，路就窄得没有地方容一个苦力挑着一个担子走过，他就得让到岔开去的种着豆子的小田埂上

等你过去。现在铺的石头没有了，你沿着踹紧的泥地上行进，窄得你的轿夫小心翼翼地提着步子。

在旅途上，关于所有土匪企图打劫你和护卫你的衣衫褴褛的兵士的传说，没有多少惊奇冒险，却也充满着插曲。首先，就有永远变化多样的黎明。诗人们用热情去描写它，但是他们都是睡懒觉的，他们宁愿靠幻想获得灵感，而不去用他们睡眼惺忪的眼睛。好象月夜梦里认识的一位女人，她有醒着的白天的美人所不可企及的漂亮，他们所要赋予她的美德没有别的，仅仅就是想象罢了。说什么最微妙的黎明没有落日那样的光辉，只不过是因为它有一种人们比较不习惯的景象，所以看去似乎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黎明都和另一个有一小点变化，你可以想象，世界每天重新创造了完全不相雷同的另一天。

现在这些景象都是路边常见的，一个农民腿子深深浸在水里犁田，那犁从原始时代到他们的祖先用了四千年了。水牛溅着泥浆凶狠地犁着田泥，它的愤世嫉俗的眼睛，似乎在问这种无休无止的苦工要到何时才能做完。一个老妇人来了，穿着蓝色的罩褂和一条短短的蓝裤，一双缠足，她为支持不稳定的步伐打了一个趔趄。两个肥胖的中国人坐着轿子从你对面而来，通过时用一种

好奇的但是无精打采的眼光瞅着你。每一件事你看着都是一个插曲，不管它怎样微不足道，都足以立刻引起你的想象。这时你的眼睛愉快地停留在一个有着象牙黄色皮肤光滑的年青母亲身上，她用兜带背着一个孩子轻快地走着，看那孩子的皱纹，是一张不可理解的老人的脸，或者看那好身骨，通过脸上的肉显而易见将来是属于一个身高匀称的苦力的。除了这一切，这里又来了经常的喜悦，你吃力地爬上一座小山后，看见这个区域铺展在你的前面。虽说天天它都是相同的老样子，但每个时候你去看它都有小小相同的发现的激动。这相同的环绕着小山丘，象一群羊似的围绕着你，它们一个接连一个直到你的目力所能及之处。在许多山上，一株单独的树，好象是故意栽在那里为了增添画意，以天为背景钩出构图优雅的轮廓。这些相同的婀娜地倾斜的竹丛几乎围绕着相同的农舍，它们丛集的屋顶，舒适地紧偎在相同荫蔽的山凹。竹子以它值得敬慕的优雅斜荫在大路之上。它们有贵妇人的屈尊恩赐的态度，宁愿奉承而不伤害。它们放弃花朵，以出身名贵的任性，过分认定自己的优良种性，永远也不会有沾上放荡堕落的危险。对节妇或对幸运学者的纪念牌坊的出现，预先通知你正临近乡村或市镇了，当你从那里经过，通过参差不齐的一线肮脏

的小茅屋或一条忙碌的市街，给居民们提供了片刻的轰动。街道用大篾摺从这边屋檐搭到那边屋檐遮蔽太阳，街上光线暗淡，蜂拥的人群有一种不自然的神气。你想这一定是看见了阿拉伯旅行家所知道的那些城里有魔术师的人民了，同时在那里到了晚上，一个可怕的变化会降临到你头上，你得经受变一只独眼驴子或一只黄绿色的鹦鹉那样的生活。要一直等到你得到了那魔法的秘诀，才能解救。商人们在他们敞开着的铺面里卖的似乎不是平常的商品，而在饭菜馆里准备的那些给人吃的菜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你的眼睛只注意到中国城市千篇一律方面，对于一双生疏的眼睛，每一件事的相互之间太多相似了，从记下不同细节之中获得满足吧，于是这样你才观察到每件事情的主要环节。每一个城市都需要满足它居民的需要，但是也有它的特性，于是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棉布，在那里找到线带，而在另一个地方买到绸缎。现在橘树挂着金色的果实，虽结得不多，从它的外表看却是甜的。黑缎瓜皮帽让位给了缠头巾，而红色油纸伞代替了蓝色的布伞。

但是这些都是一天的普通插曲，它们好象是使生活不致单调的意料到的偶然事件。工作的日子和休假的日子，和朋友们的会晤，春天和它的欣欣向荣来了，而冬天又带来它茫茫的长夜，它的

安逸的亲昵行径和它的暧昧黄昏。有时，爱情进来了，使得其余一切不过是为它的神彩焕发作了布景，把白天的寻常事务，哪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都提升到一个不可思议的重要水平。时而，日常的生活圈圈被打断了，而你被面对着一个钩魂摄魄的美人，一切都没有准备地面临着袭击。因为，通过雾霭中隐隐呈现，你可能看见一幢庙宇的奇怪的屋顶，高高耸出在一座庞大石堡上面。围绕着它的是一条天然的壕沟，里面流着一泓静静的绿水。当日光照射在那上面，你似乎看见了那中国宫殿之梦，一座如同阿拉伯说书者纠缠不清的幻想里的那样富庶和壮丽的宫殿；或者，清晨过渡，你可能看见就在前面衬着日出，一个艄公架着满船的赶路人过渡；突然你认为那是克伦[①]，于是你知道他的过路人都是令人感伤的死者。

---

①克伦——希腊神话：在斯蒂克斯河上渡亡灵往冥府的神。

上帝的真理

伯奇是英美烟公司的代理人，他在内地一个小县城里设了个推销处。这城里的街道每当下雨后有一尺深的泥泞。你必须坐在你的大车的紧里，以免从头到脚溅坏一身。路面由于无休止的车来人往而支离破碎，上面满是窟窿，如你叫车缓步行进你也会被颠簸得直要跌气。这里有两三条有铺店的街，但是店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买他心里有数。这里有数不清的弯弯曲曲的胡同，那里面呈现出大堵单调的墙，仅仅由于邋遢的关着门的门框才在墙上才开个洞眼。这些都是中国的房子，一个人对它们的色彩正和环绕着它的生活一样都是不可测度的。他害着相当重的思乡病。有三个月没有和一个白种人讲过话了。

一天的工作完了。这以后除开去散步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做了。他走出城门，沿着洼凸泥泞的路溜跶，来到乡下。山谷被荒凉贫瘠的山形成间界，好象关闭着不让他进去。他觉得远离文

明世界有十万八千里。他知道他无法摆脱包围着他的这种完全的孤独感，但是要经常闭着僵硬的嘴唇是需要更大的努力的。他差不多已经到缠绕他的绳子的尽头了。突然，他看见一个白人骑着一匹矮种马向他走来，后面缓缓地跟着一辆中国大车，推测那里面是装着那个人的行李。伯奇立刻猜想这是一个传教士，远远从他乡村传教的地方来到一个通商口岸去，于是他的心欣喜得扑腾起来。他终于有了人可以谈话了。他连忙走上去。疲乏也没有了。登时活跃起来。他几乎跑到那骑马的人跟前。说：

"喂，你是从哪里蹦出来的？"

骑马的停住了，讲了一个隔得远的城镇。

"我正要去搭火车。"他补充了一句。

"你今晚最好在我这里住一晚。我有三个月没有见过一个白人了。我那里有好几间房。英美烟公司，你晓得的。"

"英美烟公司，"骑马的人说。他的脸色和眼睛变了，起先是友谊地而且笑了，接着又变得硬梆梆起来，"我和你没有什么交往。"

他一蹴马又走起来，但伯奇一把抓住了他的缰绳。他不能相信他的耳朵：

"你是什么意思？"

"我和一个做烟生意的人没有什么交道可打。

松开缰绳。"

"但是我有三个月没和白人说过话了。"

"那与我没有关系。松开缰绳。"

他又踢了那矮种马一脚。他的嘴唇固执地闭着同时严峻地望着伯奇。于是伯奇发火了。他紧拖着缰绳致使马都动起来，同时开始咒骂教士。他把想得出的辱骂之词都冲他而发。他赌咒发誓，可怕地令人厌恶。教士没有回答，但是驱策他的马前进。伯奇逮着教士的小腿，猛地把他拖离了鞍镫。教士差一点跌下马来，同时他在有点有失尊严的形式下紧紧揪住矮种马的马鬃。于是他半溜半摔地跌到地下。大车现在已经来到他们身边停下了。坐在里面的两个中国人用不关痛痒的好奇心望着这两个白人。教士气得脸上发青。

"你殴打我，我会要为这件事发火的。"

"见你的鬼去吧，"伯奇说。"我三个月没有看见一个白人，你甚至话都不同我说。你是不是算一个基督教徒。"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伯奇，你这该死的。"

"我要报告你的负责人。现在站退点，让我好走路。"

伯奇握紧两个拳头。

"赶快走，不然我要捶碎你每根骨头。"

教士骑上了马，给他的矮种马狠狠抽了一鞭子，于是骑着慢慢跑了。中国大车轰隆轰隆地慢慢跟在后面。但是当伯奇单独留下的时候，他的怒气消失了，一声啜泣不由自主地从他的嘴里咽出。这些围着的山并不比人的心更硬梆。他回转身慢慢走回这个小县城。

罗 曼 司

整天我都乘船顺流而下，这就是可以上溯到张骞去寻找它源头的那条河。他在河里航行若干天，终于来到一个城市。他看见一个少女织布和一个青年牵着一头牛去下水。他问这是什么地方，于是少女把织布的梭子给他作为回答，告诉他回去的时候给星相家严君平看，严会告诉他到了什么地方。他照着她说的做了，于是严君平立刻认出这是织女的布梭，并进一步说出：当张骞接受梭子的时刻，他注意到有一颗漫游的星闯入织女星和牛郎星的中间。这样，张骞才晓得他航行到了银河的中心。①

无论如何，我没有走得那么远。那还是七天以前，我的五个船夫，整天站在船旁划着，于是我的耳朵里一直响着他们的桨磕碰着木桨架的单调的声音。时而水又变得很浅，出现一个涡流，船

①故事见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十七引《荆楚岁时记》。

颠簸起来，我们的船就搁浅在河床的石头上。于是两三个船夫把他们的蓝布裤脚卷起到臀部，跳下水去，喊叫着，把这平底船拖过浅滩。时而我们又来到一个湍滩，当然这和长江那些汹涌的险滩相比，倒没有什么更了不起，不过需要这些纤夫们把这平底船拖上水也足够湍急的了。接下来我们又走起下水来，他们一边过滩，一边呼喊，直冲水花四溅的激浪，而现在又到了一平如镜的水面。

现在已是晚上，我的全体船员都在船前熟睡了，挤成一团，偎在停泊时他们临时赶造出来的遮蔽物下。我坐在床上，篾席铺展到三条船肋空间做成的这可怜的房舱，一星期来它既做我的起居室又是我的卧室。它的一头用粗糙地拼在一起的板子，每块板都露有大缝的拼夹板关闭着。刺骨的风从那些缝里直吹进来。在优秀强壮的船员们的另一侧，现在舵手也参加在他们一起；船员们白天划船，晚上睡觉，舵手就与他们不同，在长橹旁边，掌着他的舵柄，从早晨站到天黑。他穿着一件破烂的蓝布腰褂和一件褪了色的灰布棉衣，一条长头巾缠在头上。除开我的床，这儿没有家具，因为天气冷，一个象巨大汤盆的浅盘子，里面烧着木炭，我把装着我衣服的篓子当桌子用，一盏防风灯悬挂在一个拱形舱篷上，随着水

的波动而轻轻摇摆。船舱是这样矮，我还是个儿不顶高的人（我用了培根的观察来安慰自己，高人好比高房子，顶上一层通常是空空荡荡的）恰好能够伸腰。睡觉的人中间一个开始打着大鼾，或许他吵醒了其中的两个人，因为我听见谈话的声音。但是现在谈话不作声了，鼾声也停息了，于是包括我在内又清清静静的了。

忽然间我产生了一种感觉，这里在我的面前触动着我的，几乎就是我要寻找的罗曼司。这正是那种艺术激动的特定的感觉；但是我不能向我的生活另外要求什么，就是现在已经给了我的这种正好名之曰稀有的激情的东西。

在我的生活经历中，经常有一种我熟悉的，对我似乎充满浪漫色彩的境地，但这仅仅是回想，将它们和我的什么是浪漫色彩的观念相比，我认为它们都是不合乎常例的。仅仅由于一种想象的努力，这样就使我成了一个自己扮演了一部分的观众。我掌握了事实的各个方面的珍贵特性，这在别人看来那不过是我对好看的花朵的直觉。当我和一个由于她的魅力和她的天才使她成了我们国家崇拜的偶象的女演员跳舞，或者徘徊通过某些大厦的厅堂，在那里面挤满了伦敦所能显示的名门贵族或才智卓越的人士，我也只是后来认为这里或许不过带点儿路易时代的样式，是罗曼司。

在战场上，当我自己在不太危险的情况下，我能怀着有兴趣的激动注意战事的进行，我并不不动感情去摆出一个观众的样子。我曾经在团团的月亮之下航行一夜到太平洋中的一个珊瑚岛去，那美丽和奇特的景色给我以衷心的喜悦，但是仅仅到后来由于这令人兴奋的感觉，才使我想起我用手指触到了罗曼司。有一回在纽约的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我和六七个人围坐在桌子旁边，对一个古代王朝的鼓动诗人和爱国者的达一百年之久的错误结论，拟订一个平反的计划，我听见了它振翅的声音，但是主要的感觉是一种使人感到惊奇的乐趣。通过战争中那些冒险的回想，我才发现我干了一桩与我的癖好渺不相干的事情。在某些环境下我被真正令人激动的罗曼司抓住了，别人或许会认为那根本没有什么浪漫色彩，于是我记起一天晚上我在法国布列塔尼海岸一间乡村小屋里玩牌时我第一次认识了它。在隔壁房间里一个老渔人躺在床上就要死了，这屋里的女人却说他要出去随潮水去了。如果没有狂风暴雨在那里喧嚣，似乎适合这个上了年纪的海的斗士的最后一刻，莫如让那猛扑着关着窗子的风狂呼怒啸伴他归去。波浪轰隆隆地冲击着岩石。我忽然之间觉得狂喜起来，因为我晓得在这里的就是罗曼司。

而现在这同样的狂喜抓住了我，又一次罗曼

司，象肉身的存在，就在我眼前。但是我被它来得这么出乎意料引起了好奇。我说不出或者它是从灯投到篾席上的阴影中爬出来的呢，还是通过打开的船舱我看见它飘然而来到江上。说也奇怪，是什么缘故此刻产生这么莫可名状的欣喜呢？于是我出来走上船舱。和我们并排停泊的有十几艘帆船，它们的桅杆矗立在江上，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水手们都熟睡多时了。夜并不黑，因为虽说多云，月亮却是圆圆的，但是江面在这朦胧的光线下是阴森的。迷惘的雾把远处岸边的树弄得模糊不清。这是使人心醉的景象，但是在这里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平常的，而我要寻求的那种东西却不在这里。我回转身走了。但当我回到我的竹篷拱罩之下的住处时，那个给与魔法的如此非凡的角色已经消逝了。哎呀，我是连一只蝴蝶都要撕得粉碎去发现它的美在哪里的那种人啊。然而，当摩西从西奈山下来脸上带着喜悦，从他和犹太人的上帝谈的话我悟到：我的小舱房，我的木炭盆子，我的防风灯，连我的行军床，它们曾经有一阵激动我现在仍然有某些令人激动的地方。我不能再把它们看得有任何不关紧要，因为我曾经有一阵子看见它们是有魔力的。

崇高的风格

他是一个很老的人。他是五十七年前作为一名船上医生来到中国的，后来就在南方一个口岸当一名医疗官员，就他的健康情况看他是必须回国的。当他来时还不到二十五岁，而现在已经是八十有余了。他是一个高个头，很瘦，他的皮肤挂在他的骨头上好象对他是一套太宽大的衣服：他的下巴吊出一大块，象一只老火鸡下巴上的垂肉；但是他的蓝眼睛大而明亮，仍然保持了它的颜色，同时他的声音洪亮深沉。在这五十七年里他在沿海一带买进或卖出三、四个开业所，现在他又重新回到离港市仅几里他第一次住过的地方开业了，这是一条河出海口的一个抛锚地。轮船不能把它们的货物拖拉进城去，就在这里卸货和装船，这里仅有七个白人的住宅，一个小医院，少数中国人，所以当时就不值得一个医生在这里定居。但是他又是个副领事，在他大把年纪时这种安逸的生活恰恰适合。那里有足够的工作防止

使他觉得闲散，而又不致使他很累。他的精神仍然矍铄。他说：

“我正想退休，这是我给年轻人以机会的时候了。”

他以未来的计划自娱：他终生一直想访问西印度群岛，他发誓就是现在要去。确实，先生，他不能再推迟了。英国？呃，他从各方面听得讲，现今英国对一个有教养的人是没有什么余地的。他还是三十年前在那里的，还有，他也不是英格兰人，他出生在爱尔兰。是的，先生，他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取得学位。但是一方面由于那些教士，另一方面由于那些新芬党[①]，他不相信对还是儿童时期知道爱尔兰的他有什么更多值得留恋的。他说，要寻求住到一个美好的国家去，他大张着的蓝眼睛里闪出一线光芒。

尽管许多祝福是装作出于好心，因而忽略了某些有教养行为的愉快，他比一般医疗职业者有更好的态度。我不知道是否与病人的交往关系给了医生倒霉的优越性的感觉。例子是他的老师中有些人仍然有种不好的粗鲁的传统，过去某些杰出的开业者把这传统当作职业的财产培养了他们；或者由于早期在医院的贫苦病人中的训练，

---

①爱尔兰的一个党，成立于1905年，主张爱尔兰完全脱离英国而独立。

认为最恰当是莫过于把那些病人看着比自已低一等的，但是肯定是谁也不比谁低，所以总之，这就需要有文明礼貌。

他是和我们这一代人截然不相同的，但是不管这不同是在他的声音和外貌，还是在他的平易近人的态度，或者在他的古式礼貌的细致周到方面，这些都是不容易发现的。我想这不相同比起今天这帮人来，他肯定应该算是一个更有教养的人。今天这些有教养的人，说起来有人会不赞成，人家说这几个字时带着不好的意味，如果是指其品质，则会带来一串嘲笑。有些人，用不着夸大想象，可以这样描述近三十年来他们在世界上确实大大兴风作浪了一番，他们机关算尽，提出他们是什么的令人作呕的衔头，都是太名不副实的自以为。或许也可以说，他的不相同在于所受教育的区别。在他年轻的时候，被讲授了大量无用的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于是它们在他的特性里打下了今天的人少了一点什么的基础。他年轻的时候那时不知道星期周刊为何物，而那时的月刊杂志也是正经八板的沉闷的事情。读起来是太僵硬枯燥的。或许人们喝酒不是适可而止而是喝得过量了。但是他们能读贺瑞斯[①]寻求欢乐，同时他们

---

①贺瑞斯（前65—8）：罗马诗人及讽刺家。

打心眼里懂得瓦尔特·司各脱爵士的小说。当新芽杂志出版的时候他读它，记住它。我想那个时期的人纵使不比我们这时候的人有更多冒险精神，至少是在崇高态度方面有更多冒险精神的：现在一个人宁愿嘴巴上挂着几句喜剧台词开玩笑地冒着生活的危险，而他就是为了一段拉丁引语宁愿呕心沥血。

但是我现在如何能分析这老人与众不同的难以捉摸的品质呢？读了一页斯威夫特，字都是同样我们今天用的这些字，而几乎没有一个句子不是把这些字用在极简单的次序之下，然而，那里有崇高，有广阔，有芳香，这些都是我们现代文人的努力所难以达到的。简而言之，是风格。而这也就是他——医生。一种风格，那是没有多话可说的。

雨

对，并不每天都出太阳，有时一顿苦雨淋得你狼狈不堪，时而一阵西北风吹得你清冷彻骨。你的鞋子和大衣从前一天起就一直是湿的，同时你在吃早饭前还得赶三小时的路。你在那寒冷清晨阴暗的光线里跋涉，前途还有三十英里，到末尾除了肮脏不舒服的中国小旅馆，再没有别的指望。在那里你将找到光秃秃的墙壁，房子里潮腻的泥巴地面，和你将尽最大努力在一盆炭火上烤干你一身。

于是你想起你在伦敦的舒适的房间：雨号叫着敲打窗子，仅仅使房子里的温暖更加可喜。你坐在火炉旁边，嘴里衔着烟斗，将泰晤士报从一版读到最后一版，不光读社论，自然，不会去读离婚寻人等启事栏和你永远也担负不起的乡村住宅的广告——（在奇尔顿的那些山丘上，建立在一百五十英亩的奇尔顿公园内，有宽敞的花园，果园，以及其他等等，一座在完美条件下的乔治亚王

朝时代的住宅，有原装木建部分和壁炉架，六间接待室，十四间卧室和通常的下房，现代卫生设备，上面带楼房的马厩和极好的汽车房。离第一流的高尔夫球场仅三英里。）当时我认识的乃特先生、佛朗克先生和鲁特莱先生[1]都是和我最接近的作家。他们处理的那些看去象极其平凡的事件，其实都是永远也不会陈旧的好诗的素材；而他们的样式象那些最好的大师们的一样，是独特的，同时又是各有特点的。他们的风格根据汉学家所说的孔子那样，闪耀着简洁的光辉：简洁但能得到启示，它把令人钦佩的严谨和形象的广度联合在一起，这就给予想象力一种充分的自由。他们对文字的精通，就是上述那些的骨架和主轴，我猜想，我一定懂得这意义，但是若干年来它们对我仍是一个谜，说来令人惊异，而他们运用起来却轻而易举和满有把握。他们能和洛德雅德·吉卜林先生独出心裁地玩弄技巧的词语，他们能给它们注入W·B·叶芝先生的凯尔特语的魅力。他们如此完整地结合他们的个人特征，而我却轻视了最有眼力的批评家发现的分别作品的痕迹。文学史使人认识由于两个作家的合作能涌出令人兴奋

①乃特、佛朗克、鲁特莱：均为当时伦敦《泰晤士报》的撰稿人。

的想象力，那些名字就是包蒙和福莱柴尔[1]，厄克曼·却脱连[2]，贝山特和莱斯[3]，但是现在比较高级的评论文章，毁坏了我们年轻时被教过的对圣经作品的三倍的信念，我猜想乃特·佛郎克和鲁特莱是唯一不在其列的情况。

当时伊丽莎白非常心痛我从中国带回给她的松鼠，可怜的孩子，她不管天气怎样都一定要出去，进来对我说再见。等她的童车准备好的那一会，我和她玩火车。其实，我还可以做一点工作，但是天气这样不好，我不愿去做，作为代替，我拿起吉尔斯教授的关于庄子的书。因为庄子是位个人主义者，僵硬的儒家学者对他皱眉，那个时候他们把中国可悲的衰微归咎于个人主义。他的书是很好的读物，尤其下雨天最为适宜。读他的书常常不需费很大的劲，即可达到思想交流，你自己的思想也随着他遨游起来。但是当前的这些观念，它们象涨潮汹涌的波浪一样，淹没了你的意识，吸引你去排斥古代庄子所提出的那些思想。不管怎样，你还是期望悠闲，于是你在你的桌子边坐下来。仅仅浅薄的涉猎者才用桌子。你的笔是容易动的，同时你写起文章来也不会是艰难的

---

①两人均系英国剧作家。
②英国小说家。
③两人都是英国小说家。

尝试，活着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时两个有趣的人来和你共进午餐，当他们走了，你不知不觉走进卖艺术品的克利斯蒂市场，你看见那里有几个明代的雕像，但是它们都没有你自己从中国买来的好，于是你就去注意那卖掉了的画，你唯一太高兴的事就是你没有买。你看着你的表，这时最好不过是到加立克那儿去玩一盘纸牌，这讨厌的天气，使你完全有理由消磨这其余的下午。你不能停留得太晚了，因为你有第一晚上演的入场券，同时你必须回家换换衣服好出席一次早的正餐。你刚好来得及在伊丽莎白睡觉前向她讲个小故事。她穿着睡衣裤，头发向上梳着两个抓髻，看去的确非常好看。关于去参加第一晚上演必需安顿的一些事，仅仅只有吃饱了的批评家能够忽略而被更动。在那里看见你的一些朋友是高兴的；听见厅座观众对一个舞台上的喜欢的人的表演，当她在脚灯前面演得比以往更好而热烈鼓掌时是有趣的；当你从人群中认出她来了，她在就坐时向你表示友好，是一次愉快的受宠。你去看的可能是一出坏戏，但是起码有点长处是以前没有谁看见过的，于是这就常常是片刻的激动或笑一笑的机会。

一群苦力戴着大草帽正对着你走来，象那害相思病的丑角戴的帽子，不过边宽得多，他们低

头懒散地走着，在他们扛的大包棉花重量之下微向前倾。雨把他们的蓝衣服打湿粘贴在身上，瘦削而褴褛。路上铺的破了的石块都是使人滑跤的，你带着劳累挑拣着泥泞的路。

沙 利 文

他是一个爱尔兰水手，在香港离开他的船，于是异想天开地徒步穿过中国。他消耗了三年时间在这个国家漫游，不久就获得一些很好的有关中国的知识。象他那阶级中的普通人一样学习它，比去受这方面更高级些的教育收效要容易得多。他靠他的才智维持生活。他认为避开英国领事馆很重要，于是他以在路上被抢去了所有钱财物品的个人身份，跑到每个城镇的地方行政长官那里去。他的故事并不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他告诉人家他是科斯蒂冈船长这样一个大官，和一笔使人相信的损失财物的详细数目。官员们照中国的方式急于想摆脱他，也为十块或十五块银元能打发他走而高兴。假如不能取得钱，他通常能够期望住到一块好地方，吃到好的饮食，他有某种粗俗的能投中国人所好的幽默。所以他连续很成功，一直到被一个不同类型的官员给他倒霉的打击。当他述说他的经历时，那个官员对他说：

“你不过是个叫化子，一个无业游民，值得

揍一顿。”

这位官员下一个命令，于是他就立刻被带了出来，丢在地上吆喝地被打着。他没有受什么伤，但是被吓了个半死，而且出奇地受了辱。这就挫伤了他的勇气。当时当地他就放弃了流浪生活到了一个出口港，向海关特派员要求工作，当了一名船舶入港的海关检查员。这是不容易找一个白人担任这职务的。人家找他们也没有多少问题要解决，他有了工作你现在可以看看他的神气了。一个被太阳晒了，脸修得光光的四十五岁的人，红润的脸庞，有一点儿胖，穿着一身干净的蓝制服，在濒河的一个小城镇上强行登上轮船和帆船检查。在这城镇的海关代理专员，邮政局长，一个传教士和他就是仅有的几个欧洲人。他的中国知识和对他们的习惯的了解，使他成了一名非常宝贵的雇员。他有一个小个儿的中国老婆和四个孩子。对于他的过去他不感到羞愧，在好的强烈的威士忌的面前，他会告诉你他全部冒险旅行的故事。但是为什么会挨打他始终找不出原因。那不但吓唬了他，他还不能——简简单单地他还不理解。他对那下命令的官员没有仇视；相反那正显示了他的幽默感。他说：

“他是一位伟大的老运动家，老流氓，神经，呃？”

餐　厅

这是一幢大房子里的大房间。当日建筑的时候，建房费用不贵，而那时的富商又喜欢把房子起得高大。钱容易赚，于是生活过得奢侈。一个人走运并不难，几乎在他达到中年以前就可以回到英格兰，不少光彩地住在萨里[1]的一幢漂亮的房子里过他后半辈子的生活的。当地居民不满意，也可能常常发生点骚动需要他远走高飞去逃命这也是真的，但这仅仅是在他生存的舒适里增加一点作料。当十分肯定有危险的威胁了，自有那炮艇会及时开来进行弹压或保护的。外省社会爱好交际，靠婚姻关系大量联合，它的成员毫不吝惜地互相款待。他们大摆筵宴，他们集体跳舞，他们一起打牌。工作并不那么紧张，不时常消费几天在内地去打野鸭是不可能的。夏天的确非常热，过了几年一个人就聪明起来懂得随便过日子

[1]英格兰东南部的一个郡。

了，于是其余的岁月就只是暖和的了，有蓝天，有喷香的空气，生活是非常写意的。一个人确实有行动的自由权，假如他有一个小巧明亮眼睛的中国姑娘一起生活，一件事情只要没有被妇人之见所干扰，不必想到会变得更坏。当他结了婚，送一笔财物打发那姑娘走，假如有孩子，在上海提供得有欧亚混血人的学校。

但是这种惬意的生活是过去的事了。这个港口靠出口茶叶营生，从喜欢中国茶的味道改成喜欢锡兰茶，使它衰落了。这个港口垂死地躺在那里三十年了。在这以前这里的领事有两名副领事帮助他工作，但是现在他一个人就能够轻松愉快地对付了。他通常安排下午打一盘高尔夫球，他总是悠闲自在地玩一局桥牌。昔日的繁荣昌盛不复存在了，而今日的大商行，大都是空的。留给茶商们的是只要捞得到手其他生意就尽力捞，竭尽全力量入为出。但是这种努力也是苟延残喘的。每一个在这个港口的人都觉得自己老了。这里是没有青年发展的余地的。

现在我坐在这大房间里面似乎在读过去的历史，同时也是读我正等着的那人的历史。这是我乘沿海汽轮到达两天后星期天的上午，他去教堂做礼拜去了。我试图从这房间构想他的肖像。情况颇为有点哀婉动人，这里有一种过去世代的豪华，也

就是一种花谢结子的豪华，而它的整洁，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似乎突出一种可羞的贫困。地板上是铺着巨大的土耳其地毯，这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定值得一大笔钱，现在是完全绒毛磨光露出织纹了。在那张吃过那么多丰盛筵席和昂贵名酒的大桃花心木桌上，擦得那么发光透亮，你可以从那上面照出你的脸来，这使人想到港口的古老、带着茶褐色和盛极一时的情景；脸色红润，脸侧蓄着连鬓胡须的绅士们在这里谈论江湖骗子狄斯累利[①]的丑行。墙壁是暗红色的，这是为了想合乎举行体面的盛大集会和庄重好挂肖象的。相片中有主人的父亲和母亲：一个灰色胡须秃了顶的老绅士，和一个严厉的黑黑的老太太，她的头发梳成欧琴妮皇后的发式。那里还有他的戴着老式帽子的祖父和戴着袋形便帽的祖母。桃花心木的餐具柜上后面有一块镜子，上面摆着镀银餐具托盘和供茶的器皿，再还有就是在餐桌中央，立着一个巨大的盛花果等的饰架。在黑色大理石的烟囱架上面一架黑大理石钟，黑大理石花瓶侧边，和房间的四角都摆着橱柜，里面装满了各式镀金银的餐具什物。这里那里都是栽在花盆里的伸展着绷硬叶子的大棕榈树。椅子都是大型红木的，摆

①英国政治家及小说家，于1868及1874—80年任英国首相。

满了，上面都盖着褪了色的皮垫。而在壁炉两侧，一边摆一把围椅。房间虽大，似乎拥挤，但是因为每件东西颇有点破旧失修，于是给你一种令人伤感的印象。所有这些东西似乎都有它们自己的悲哀生活，但是一种屈服的生活，宛如环境的力量给它们证实得太多了的一样，它们再没有挣扎反抗命运的力量了。然而他们颤慄、亲热地攒聚在一起，仿佛它们隐约地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留它们的意义。而我则觉得过不了多久结局就要来了，在令人嫌恶的混乱之下，贴上一个小价目标签，乱七八糟地放在拍卖行的阴森、凄冷的角落里。

连绵装饰

在薄雾中，庞大、雄伟、寂静、令人敬畏地矗立着中国的长城。它孤单地，随着自己的性子，爬上山坡又滑下深谷。威胁地，在根据适当距离下，坚固四方的瞭望塔顽强不屈的站立在它们的行程之上。无情！它是花费百万生命的代价修筑起来的，每一块这些灰色的大石头都沾满了囚犯和被放逐者的血泪，在它的黑暗道路上通过崎岖山脉的海洋而稳步前进。大胆！它连续走着无止境的旅行，里格[①]接着里格，一直到亚洲最远的区域，完全与外界隔绝，就象它所守卫的伟大帝国一样不可思议。在薄雾中，庞大、雄伟、寂静、令人敬畏地矗立着中国的长城。

①长度名，一里格等于三英里。

领 事

彼特先生在极端愤慨的情况之下，他在领事馆工作了二十多年，和各式各样麻烦的人打过交道，官员们不讲道理，商人们把英国政府当作为他们收帐的代理人，传教士们对显然不公平的事情只要试图公正处理就不满意，但他永远也想不到一个案件会弄得他这样全然不知所措。他是一个态度和善的人，但是他不得不对他的抄写员大发脾气，并硬要开除欧亚混血种的书记，为的是他把有两个字拼错了的一封信摆在他面前要他签署。他是一个认真的人，不打四点钟决不离开办公室，是一到时刻他就跃然而起，叫拿他的帽子和手杖来。因为仆人没有立刻拿来他狠狠地骂了他一顿。他们说领事硬是变得有点奇怪了。商人们住在中国三十五年了，没有学会在街上问路的话，说因为他们学的是中文；那么彼特先生的显然奇怪那就不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了。他是一个单身汉，因为这个原故，他收到一系列的邮

件，说他们独身的理由，是考虑到人不适宜于结婚。他单独生活那么久，所以他的古怪自然趋向发展到一种极限的程度，于是他的脾气习性使得不熟悉的人惊奇。总是心不在焉，他不注意住室环境，那里经常乱七八糟；也不注重饮食，他的仆人给他什么就吃什么，还什么东西都敲他的竹杠。他不屈不挠地尽全力查禁鸦片买卖，但是他是全城唯一不知道他的雇员们把鸦片藏在领事馆的人，而一种忙碌的鸦片交易就在那院子的后门里公开进行。他是一个热心的收藏家，政府为他安排的住宅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他一件接连一件收集起来的东西：锡镴器皿，黄铜制品，木雕，这些都是他更为正统的收集物品；但是他也收集邮票，各种鸟蛋，旅馆标签和邮戳。他自夸他收集的邮戳在英国是无与匹敌的。由于他长时期在外离群索居，读了不少书籍，虽然他不是汉学家，但他比他绝大部分的同事对中国的历史、文学和人民，有更为丰富的知识。但是从他的广泛阅读中，所学到的不是容忍而是虚夸。他是一个有特殊外表的人。身材矮小孱弱，当他走路的时候，给你一片枯萎的叶子在风中飘荡的印象；再就在那小提洛尔人① 帽子上有一点特别奇怪的地

①奥国西部与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区域，在阿尔卑斯山中。

方，就是那上面插有一片鸡毛。帽子旧而蹩脚，他把它吊儿郎当地斜款在他的大脑袋上。你只看他那双无神地在那眼镜后面的眼睛，虽蓝而暗淡，而一丛下垂、零乱、邋遢的胡子，却掩盖不了他那张带有怒气的嘴。现在转出了领事馆的那条街，他向城墙上走去，因为在这人口众多的城市，那里才是能够舒服散步的地方。

他是一个艰苦工作的人，对任何小事都亲自操劳而累得要死，但是照例到城墙上去散步借以平定情绪和休息。城在一个平原中间，当日落时你常常可以看见被雪封顶的西藏那些山。现在他走得飞快，也不左顾右盼，他的肥壮的长毛垂耳狗在他周围蹦蹦跳跳，一点也没有察觉主人的心事。他急促地低声独自喃喃着些什么。刺激他的原因是一次拜访，那天他接待了一位自称为余太太的女人。作为一个领事的要求精确的感情，他坚持应该称呼她兰伯特女士。而这件事情本身就足以剥去他们之间的融洽的交往了。她是一个嫁给了中国人的英国女人。两年前和她丈夫从英国回来的，当时他的丈夫在敦伦大学求学，他告诉她在本国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于是她就想象她将会回到一座豪华的邸宅，同时有着重要身份。当她发现自己被带到一处里面挤满了人的寒碜的中国房子时，不禁大吃一惊；那里甚至连一张外国床都

没有，哪里还有什么餐刀和餐叉；什么东西似乎都很邋遢和有气味。她发现必须和她丈夫的父亲、母亲住在一起，他还教她一定要遵照他母吩咐她的话去做。而这使她感到震惊。然而在她对中国的全然无知情况下，她在这屋里住了不到两三天，她了解到她并不是她丈夫唯一的妻子。在他离开本乡本土到外面去学那些番人的知识之前，他还是个孩子时就结婚了。当她痛恨地责备他不该欺骗她时，他耸了耸肩膀。假如他要讨而又加点不讲忠实，那是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一个中国人讨两个老婆的，也没有一个中国妇女把那看成是件大不了的苦恼。基于上述的发现她第一次拜访了领事。他早就听到她到达本城的消息——在中国每个人都晓得另一个人的任何事情，于是他没有感到意外地接待了她，也没有对她表示过多的同情。一个外国人要嫁一个中国人本来就使他充满愤慨，她并不须要象人身侮辱一样，只要向他正常征询什么伤他的脑筋，早就使他大不悦乎了。她根本不是看去使你认为她会为做了这种蠢事而内疚的那种女人。她倒是一个稳健、结实、年轻的人，简要、朴实、实事求是。她穿一身便宜的线条简单的女式服装，戴一顶圆而扁的无边便帽子，她的牙齿不整齐，皮肤黝黑。一双大而红红的手，上面没有任何装饰。你尽可以说她并

不是没有干惯粗活的。她讲英语带一种东伦敦佬的嘀咕声。

"你怎么碰见余先生的?"领事冷冷地问。

"啊,你看,就这样,"她回答,"爹有个蛮好的差事,当他一死母亲就说:'好,看来让这些房子空着未免是有罪的浪费,我要放张招租牌牌在窗子上。'"

领事打断了她的话:

"他就在你们那里租了一间房子啰?"

她说:"对,不完全是一间。"

"那么就说是一套房间吧,嗯?"领事回答,带着淡淡的,微露轻慢的一笑。

接下来就是一般关于这类婚姻的说明。由于他认为她是非常愚蠢、粗俗的女人,他直率地解答根据英国法律,她并没有嫁给余某,而她能采取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刻返回英国。她听着就哭起来,他对她心里也软和了一些。他答应在回去的长途旅行中,可以把她交给某些教会的女士照顾,当真假如她同意,他看看这个时候她可能随便住在哪个教会里。于是当他这么一说,兰伯特女士抹干了她的眼泪。她最后说:

"回英国有什么好处呢?回去我也没有地方可去。"

"你可以回到你母亲那里去。"

"她根本就反对我和余先生结婚。假如我现在就回去，那我就有得听的啦。"

领事和她争论起来，但是他越争辩她就变得越坚定，最后他发起脾气来。

"假如你喜欢和一个不是你的丈夫的人在一起，那就随你的便，我就洗手不管你这本经。"

"好，你要干脱身了！"她说，看她脸上那神色，使他永远也不会忘记。

这是两年前的事情了，自那以后他见过她两次。看来她同婆母和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两个女人的关系都相处得很坏，于是她到领事这里来，提出根据中国法律上关于她的权利的十分荒谬的问题。他重复要她离开这里的做法，但是她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不走，于是他们的会谈总是以领事的勃然大怒而告终。他几乎对卑鄙的余某能在三个敌对的妇女中间保持和平而寄予同情。依照他英国妻子所讲他不是对她不好。他企图在两个妻子中间保持公正。兰伯特女士没有抓住机会使情况改善。领事知道她平常穿中国衣服，当她到他这里来的时候却穿欧洲服装。她变得极端的蓬首垢面起来。她的健康由于她吃的中国饮食而受到损害，看去她的情况变得更差了。当那天她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的时候确实使他大吃一惊。她没有戴帽子，她的头发乱蓬蓬的。她在一种高度的歇斯

底里的情况之下。

"他们要毒死我，"她尖叫着，同时她把一碗气味难闻的什么食物放在他面前。说："这里面放了毒。近十天来我生了病，这回仅仅是由于一种奇迹我才逃脱她们的暗算了。"

她不厌其详的，有十分可能的给他讲了一大篇，硬要他相信：毕竟，不外乎是那些中国女人要除掉一个她们厌恨的插在她们中间的人，肯定用了她们熟悉的那种方法。

"她们知道你来我这里吗？"

"她们当然知道；我告诉她们我要把她们的阴谋揭露出来。"

现在，最后到了要拿出决定行动的时刻了。领事用他的官气十足的样子望着她。

"好，你必须从此永远不回那里去了。我再也不愿容忍你的这些胡说八道了。我坚持你要离开那个人，他不是你的丈夫。"

但是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对付这女人的精神错乱的固执。他重复了他曾经用过的所有的辩论，她就是不听，于是他如同往常一样，他发脾气了。这就是他最后给予的答复，真是令人绝望的问题，关于她所捏造的那些看法，完全剥去了他的平静。他叫喊着：

"究竟在这世界上你为什么一定要和那个人

在一起？”

她犹豫了一下，同时眼睛里现出一种古怪的神情。她回答说：

“就是有些事情影响了我，他的头发生在额头上，我没法子不喜欢。”

领事从来没有听见过一件这样使人嫌恶的事情。这确实是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而现在，他在城墙上大步流星地走着，企图去掉他的愤怒，虽说他不是常常使用恶毒语言的人，他真地不能遏制自己了，他凶狠地说：

“女人都简直是该死！”

小伙子

他沿着大路用轻快、有信心的大步走着。他十七岁了，长得高而苗条，光洁黄色皮肤的脸上还没有去过剃刀。他聪明俊秀的向上斜的双眼，张得大大的，鲜红的嘴上挂着微笑。他的举止上有着青春的快乐的大胆。一顶小圆帽随意地戴在他的头上，黑色的大褂，腰上系着长巾，他的裤脚管通常用带子扎在脚踝处，现在却卷齐了膝盖。他打着赤脚，穿着草鞋，脚不大而样子端正。他从清早起沿着这条铺了石块的大路走着。路蜿蜒盘上山岗又回旋直下山谷，它的两边是数不清的稻田，经过密密埋着死者的坟场，通过忙碌的村子，在这里他大概对几个穿着黑褂子、蓝色裤子坐在门口的好看的姑娘用赞许的眼光瞄了几眼（但是我想他那扫视与其说是羡慕，不如说是责备），现在他接近达到目的地了。他到这城里来是为了寻找出息的。城市位于肥沃平原的中部，四周有砌着雉堞的城墙围绕。当他看见城了，

一心一意直往前走，昂首挺胸。他为他的力气而感到自豪。所有他的财产就是一块蓝棉布包的他扛在肩头上的那个小包。

现在狄克·威廷顿坐在外面企图获得名声和运气，旁边有一只猫做他的陪伴，但是这个中国人带给他的是一只红色栅栏的圆鸟笼，他把那笼子端在手指和大拇指中间特别看了一眼，笼子里面是一只美丽的绿色鹦鹉。

范宁夫妇

他们住在一幢漂亮的方形住宅里，四周有游廊环绕着，面临大江，座落在一个低矮的山岗上。在他们房子的下面稍微靠右一点，是另外一所漂亮的同样住宅，那是海关税务司的。因为范宁是副税务司，他每天都到那里去。城市离这里有五英里，在这江边除了一个小村镇，别的没有什么。它之所有建立在这里是为了供应帆船上水手们需要的绳索和食物。城里有几个传教士，但是范宁等很少见到他们，在这个村子的外国人除了范宁他们两家外，就是两个海关检查员。一个是能干的二等水兵，另一个是意大利人，他们俩都娶了中国妻子。每逢圣诞节和英王生日，范宁夫妇请他们吃午饭，但在其余方面他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公事性质的。轮船在这里只停靠半点钟，所以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船上仅有的白人船长和轮机员，而一年有五个月水位低落轮船不能行驶。够奇怪的了，倒是这时他们能够见到许

多外国人，因为不时总是碰上来了旅游者，商人，领事馆的官员，或者更多的是传教士，他们乘帆船溯江而上，在这里系缆过夜，于是这时海关税务司跑到江边去请他上岸吃饭，因为他们住在这里太孤单了。

范宁完全秃顶了，是一个矮而粗壮的人，有一个狮子鼻头和一嘴乌黑的胡子。他是一个厉行严格纪律，无事生非，鲁莽唐突的人，有一种恶霸作风。他没有一次对中国人说话不是提高嗓子到粗声浮气的命令声调。虽然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是当某个他底下的服务人员做了什么不如他意的事情时，他总是用英语骂得他狗血淋头。他使你产生一种难于相处的印象，你发现他的寻衅捏缝只不过是隐藏一种痛苦的胆怯的盔甲。这是他按照自己意愿方面安排的凯旋。因此他之所以粗暴几乎是一种可耻的企图，那就是去慑服那些未和他打交道而没有被他吓翻的那些人。你会觉得没有人会更怕他有他自己认为的那样严重。他那种不足挂齿的独具一格的形象，就是象孩子吹的泡泡，从而你就会产生一个意念，他倒是活脱的堕入了对爆炸的惧怕，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出他不过是一个穿了眼的尿泡。只有他的妻子经常提醒和说服别人，说他是一个铁人，当这种暴发过后她就对他说：

“你知道，每当你发那样的脾气就使我害怕，我想我最好对那服务生说点什么，由于你说的那些，他确实十分震动了。”

于是范宁把自己吹嘘一番，同时宽容的一笑。当有客人来了，她会说：

“这些中国人都怕我丈夫，但是，自然他们尊敬他。他们如果试图在他面前玩什么鬼把戏，那是没有好下场的。”

他会皱着眉头回答：“所以，我晓得应该怎样对付他们，我在这个国家二十多年了。”

范宁太太是一个矮小平易的女人，憔悴得象一个酸苹果，她有一个大鼻子和一口不整齐的牙齿。常常很不修边幅，她的头发逐渐变灰了，总是有些吊下来。在谈话中间，她不时分心地取出一两个发夹把头发夹好，也懒得去照一下镜子。随随便便把它夹成几小仔就算了。她爱好漂亮的颜色，穿得奇里古怪，这些服饰是她和缝纫阿妈一起找遍时装设计图样本子照着做的。她装扮起来，不能找出一件东西与另一件东西是能够互相配合的，看起去她好象一个沉船遇救的妇人，穿得再也找不出那样奇形怪状的了。她是一幅讽刺画，当望着她的时候，你不能不忍俊不禁。她仅有的能够吸引人的事情，就是她有一种柔软的极度音乐性的声音，她说起话来拖声咽气的，我

不晓得这种声调是出自英国的哪一部分。范宁夫妇有两个儿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完全离群索居在屋里。他们是可爱的孩子，心地善良和天真烂漫，看看这个家是那样融洽是令人愉快的。他们在一起说一个小笑话，逗得一家都大为快乐，他们彼此开一点玩笑，好象不是开一次而是十多次。虽说他们之间有这么多的情感交流，看起去真好象一刻谁不看见谁就不能忍受，当每天范宁要上班，他的孩子硬是不让他去，而每天他下班回来他们用极大的快乐迎接他。他们一点也不怕他那粗暴脾气的迸发。

现在你发现这个协调的中心就是那个矮小、风格奇怪的丑陋的女人。保持这家庭的团结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出于特别同意的安排，而是她的一种爱的激情所致。从早晨她起床的那刻起，到晚上她上床睡觉，她的思维都被这三个在她照管下的男性的人的康乐所占有。她的活动的脑筋，时刻都在为他们的快乐而忙于计划。想不出会有一丝为她自己的思想进入过她那不修边幅的脑袋。她是一个出奇地不自私的人，真是难得的人。她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她非常好客，是她教她丈夫到江边的船上去邀请那些旅客到家里来吃饭的，我认为邀那些人不是为她自己的缘故。她虽处寂寞却十分快乐，然而她是想

她的丈夫在和客人的谈话中获得愉快。她说：

"我并不是要他照老规矩硬要请什么人，我可怜的丈夫，在这里他没有弹子打，没有桥牌玩。屋里就一个妻子，没有人说说话对于一个男人是很难过日子的。"

每晚当孩子们都睡了，他们就玩两人对打的"皮克"牌。她没有玩纸牌的头脑，可怜的亲爱的，她总是弄错，但是当她的丈弄责备她的时候，她说：

"你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有你那样聪明。"

而因为她是这样明显地一解释，对她说的他心里实在发不起脾气。于是，当这位税务司打牌把他的妻子赢倦了的时候，他们就开开留声机，两个人并排坐着，静静地听着伦敦音乐喜剧里的最新的歌曲。你或许会对他们这样单调的生活嗤之以鼻。他们住在离开英国万里之外，这就是对他们爱着的祖国仅有的韧带啊！这使他们与文明生活还没有十分截然割开，同时那时候也可以谈谈当孩子长大了要为他们做些什么。飞快就到了要把他们送回国去上学校的时候了，这时，或许就有一阵疼惜的剧痛在这小女人的温柔的心里通过。她对丈夫说：

"伯蒂，孩子们一走你就孤寂了，但是或许我们会调到一个有俱乐部的什么地方去，于是每天晚上你就可以到那里去打打桥牌。"

江上之歌

沿着整个这条江你都听到它。从船夫们尽力划着那船尾高翘的民船，桅杆在岸边高耸，顺流直下迅激江流时，这种高吭、粗犷的号子，你会听到它。假如是六七个人拼命拉着走上水的乌帮船，或一两百人拉着张有长方形布帆的堂皇的大官船过湍滩时，这种喘息不已，有古风意味的单调的号子，从纤夫们那嘴里你会听到它。一个人站在帆船中部不停地击鼓引导纤夫们用力，他们就象被魔法驱使，弓腰折背，用尽全力背着。有时，在极度艰苦吃力的时候，象野兽在原野匍匐，他们就用四肢在地上爬着，对抗着江流的无情的威力，他们背呀，死死地背呀。纤夫头沿背纤的行列两头奔跑，要是看见某个人没有使出他的全部气力，他就用篾片板在那赤裸着的背上鞭打。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不然这全部努力就会落空。然而在这生死关头，他们仍然高唱激情、热切的号子。这和汹涌激流搏斗的古风号子。我不

知道如何用语言形容，也听不懂那里面唱出什么能使人艰苦努力的东西。但知道它是为表达那紧张的心，为要断裂的肌肉和同时为人类克服无情的自然力量的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服务的。虽然那纤索可能断裂，于是大帆船回环倒退，到最后，险滩还是过来了。在这劳累的一天结束的时候，预备有丰盛的饮食和或许还有那带来安逸的梦的鸦片。但是极其痛苦扎挣的歌，还是苦力们从船上扛着大包棉花上那险峻陡削的石级的那城市城墙上去的歌。他们无休止地来回上下，同时当人们费劲时也无休止地迸发出他们有节奏的，"唏，噢——啊，嗬"的呼喊。他们都打着赤脚和赤膊。脸上汗如雨下，于是他们的歌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呻吟。那是一声绝望的叹息，那是令人断肠的，那是艰苦的人生，那是不过带有音乐性的在无边苦海里的灵魂的呼喊，它的最后一个音符是人性的最伤心的啜泣。生活是太艰难了，太残酷了，这是最终的绝望的抗议。这就是江上之歌。

空中楼阁

他是一个高个头，长着一身肉，他有天蓝色的眼睛和不怕麻烦人的态度。看起去他好象比包着他的皮肤略微大了一点，要是松得一点点，他就会舒服多了。他的头发非常光滑而起着波浪形的卷曲，紧紧贴在他的头上，这就给你一种带着假发的印象，于是你就有不可抑制的愿望想去揭掉它。他不谈家常，他搜索各种谈话的题目，随着他脑子无目的地东扯葫芦西扯瓢，在弄得你走投无路时奉献你一杯威士忌加苏打。

他在英美烟公司负责，他住的那幢大房子就是公司办事处，营业和住家都在一起。会客室里是一套暗淡的有套子的家具，整齐地沿墙摆着。房中间有一张圆桌，上面挂着一盏煤油灯，射出阴郁的光亮，还有一只煤油炉供取暖。在适当的地方挂着一些石印的镜框，都是从美国杂志的圣诞号上面裁下来的。但是他不住在这间房子里，他把闲暇消磨在他的卧室里。在美国他老是住在一所宽敞的房子里，在那里卧房就是他所知道的

唯一独处的地方，于是他养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习惯。坐在起坐间里似乎不自然，他不脱外套，他觉得只有在家里才穿衬衫。他把书籍和私人文件保持在卧房里，这里他有一张桌子和一把转椅。

他在中国住了五年了，但不懂中文，也没有兴趣和那些可能的对手去进行竞争，他的最好的年月就这样度过了。他的业务通过一个译员去完成，屋里就由一个听差去管理。时而他跑几百英里到蒙古去旅行，一个荒凉的不毛地区，不是坐中国大车就乘蒙古小马。他歇在路边的客栈里，客栈里住着结帮的商人，牲口贩子、畜牧主、带武器的人、流氓和不法之徒。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动乱不安的，当这里发生骚动时，他并不是冒着小小风险。但这些都纯然是生意上的事情。他们放过了他。所以他常常高兴地回到他英美烟公司的熟悉的卧房。他是一个大读者。除了美国杂志他不读别的什么，每班邮政给他送来的杂志为数是极为惊人的，他从不丢掉它们，把它们一堆堆地砌满了那屋子。他居住的那个城市是蒙古通向中国内地的大门，那里住满了中国人，而城门经常进出的是蒙古人和他们的骆驼组成的沙漠商队。一眼望不到头的牛拉大车的行列，从遥远的亚细亚运来皮毛，隆隆嘈杂地从那些拥挤的街道通过。他厌烦了，他再也不愿过发生在他房门口

以外的冒险生活了。对于冒险他只能在印刷的书本上去认识它，于是需要一个描写得克萨斯或内华达南部海上的间不容发地死里逃生的大胆豪壮的故事去激起他的热情。

陌人生

天气热得令人发昏，到野外去是一种享受。传教士悠闲地走出顺流而下的流艇，又舒适地坐进在河边等着他的轿子。他被抬着走过了江边的村子，来到要攀登的山边。这里有一小时沿着宽石梯级登山小路的路程。在夹峙松荫之下，不时可以看见太阳照射之下的宽阔的江流，在欣欣向荣的绿色田野中间闪烁着愉快的反光。轿夫们甩开脚步地走着。汗在他背上熠熠发光。这是一座肃穆的山林，山顶上有一所佛寺。在上山的路上有憩息的屋子，在这里轿夫们放下轿子休息几分钟，一个穿着灰色袈裟的和尚将递你一杯花茶，空气清新而芳馥。在轿子里摇晃着非常舒适愉快的懒散的旅行，在城里呆了一天是最为值得的。他终于到达了他避暑的漂亮的有游廊的小平房。那天邮件来了，给他送来一些信件和报纸。有四期《星期六晚邮》和四期《文摘》。除追求舒适的生活和一般的和平（他常说的导致了解的和平），他

别无他求。每当他离开熙熙攘攘的城市来到这些绿色荫浓的树林中间，那种和平就充满了胸臆，这种思想很久以来就在他身上产生了。

但是他很烦恼，这天一件倒霉的偶然的事情发生了。事情虽小，他的脑子却怎么也放不开。为这件事使他的脸上带着烦躁的表情。那张清瘦而敏感的脸，几乎是苦行主义的，五官端正，有一双理解力强的眼睛。他长得非常高而单瘦，有一双蚱蜢脚样的细长腿子，当他坐在轿子里面，由于轿夫的走动而略为摇晃，使你感到有点奇形怪状，象一朵凋谢了的百合花。他是个温和的人，永远也不会伤害一只苍蝇。

这天他在城里的一条街上偶然遇见了桑德斯医生。桑德斯是一个小个子灰头发的人，脸庞红润和有一个狮子鼻头，这些使他有种稀奇地轻率鲁莽的神态。他有一张肉欲的大嘴，当他经常咧嘴一笑，就露出残缺、污垢的牙齿；笑的时候，他的蓝色小眼眯成一种东张西望的怪像，于是他看去简直是蓄意害人的化身。某些地方他有点象罗马神话中的半人半羊的农牧神。他的行动迅速而出人意料，走起路来步子飞快，就象常有什么急事。他是住在城中心区中国人中间的一名医生。他没有登记，但是有人把这事当作本身的事情而查明他具有正式合格的资格。他是被除名的，但

是为什么罪，或者是社会性质的，或者是纯职业性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他怎样碰巧来到东方和最后定居在中国海岸。但是这一点很明显，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医生。同时中国人对他很信任。他避免外国人和流传他那颇为不愉快的故事。他对每一个认得的人都说一声“你好”，但是没有一个人请他到自己家里去，也没有一个人到他家里去拜访。

当那天下午他们偶然碰见了，桑德斯医生大声招呼说：

“今年这个时候到底是什么风把你吹到城里来了？”

传教士回答：“我有些事情，我再不能不来了，我要来领取邮件。”

“几天前有个陌生人到这里找你，”医生说。

“找我？”传教士惊异地喊起来。

“对，也不专门找你，”医生解释说，“他问到美国教会去的路怎么走。我告诉了他，但是我说他在那时候找不到人，他似乎为这颇为吃了一惊，于是我告诉他五月你们都上山避暑去了，不到九月不得回来。”

“一个外国人？”传教士问，一直感到诧异这个陌生人可能是谁。

“啊，对，一点不错，一个外国人。”医生的

眼睛眨了一眨，他又问我还有别的教会没有，我告诉他伦敦教会有个机构在这里，但是到那里去也没用，因为这个机构的人员也和其他教士一样离开到山上去了，因为城里热得要命。陌生人说：'那我想找一间教会学校去。'我说：'哦，它们都放假了。''呀，那么我只好到医院去了。'我说：'那倒是值得去拜访，美国医院安装的都是最新的设备，他们的手术示范室好极了。''主管医生叫什么名字？''啊，他也上山去了。''那人家要看病怎么办？'我说：'在五月到九月中间没有病人，如果硬有人要看病，他们只好找本地药剂师凑合对付了。"

桑德斯医生停了停。看来传教士硬是弄得有点莫名其妙了。他说：

"真料想不到！"

"陌生人犹豫不决地望着我有一两阵子，他说：'我离开以前倒要看看这些教会是怎么搞的'。我说：'你不妨到罗马天主教会去试试，她们终年都顶在这里。'他问：'她们到假期怎么办，呃？'我说：'她们从不休假。'就这样他离开了我。我想他到西班牙女修道院去了。"

传教士落到陷阱里了，同时被弄得烦躁不安，他想要怎样率直巧妙地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他应该去看看是什么人来了。他信以为真地问：

“不管怎样，他到底是谁？”

“我问了他的姓名”医生说，“他说：‘啊，我是救世主。’”

传教士耸了耸他的肩膀，突然叫他的黄包车夫拉起走。

这件事使他完全生气了。它是这样不公平。自然他们从五月到九月离开了这里，天气这样热，进行任何有效活动都是不可能的。经验证明假如传教士们在山上过暑天保持了他们的健康和精力，对工作是更有利的。一个带病的传教士只是一个累赘。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同时已经发现假如把一年中的部分时间划出来，以便其余时间作出新的创造，对完成上帝的工作会更有效率。至于关于罗马天主教不休假大体说来是不公平的，她们都是不结婚的，所以她们没有家庭顾虑。这就是为什么，就在这个城市，十四个修女十年前来到中国，仅仅死了三个。就她们来说是极端安逸的，因为一年到头住在城市中间对她们的工作要方便得多，她们没有牵挂，她们没有谁是亲近的或亲爱的那种义务。啊，硬把罗马天主教扯进来总的说是不公正的。

但是一个想头忽然在传教士的脑子里一闪。他有什么引起那无赖的医生极为怨恨的呢？你只要看着他脸上那皱满着蓄意的揶揄，就知道他是

一个爱捉弄人的人。既然没有一句话得罪过他，那肯定得有个答案，但他不能镇静地找出来；而现在他想到了一个完全机智的回答。他充塞着高兴的满足，他几乎想象他已经向医生讲出来了。那是一个压倒性的反驳，他满意地擦着那长而瘦削的双掌。他应当说："我亲爱的先生，我们的上帝在照管世间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自称过救世主的。"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冷嘲，想到这里传教士忘记了他的不善幽默。

民主精神

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吃完了晚饭，坐在铜炭盆前烤火，听差在收拾我的床铺。大部分苦力都安顿在我隔壁房间过夜，我们之间的墙是一块薄板壁，我听见他们中间有人在说话。有一伙旅客一点钟以前就到了，这小旅店就住满了。突然，一阵喧嚣骤然而起，我走到房门口向外张望，看见三乘大轿进了院子。他们就在我的前面落轿，一个仪表堂皇的肥胖的中国人一步从轿子里走出来。他穿着黑色起花绸长袍，滚着松鼠皮的出牙镶边，头上戴着一顶方形毛皮帽子。当他看见我站在主要客房的门前似乎吃了一惊，转对店主用有权威的声气向他讲话。看来他是一名官员，发现这旅店的最好的房间已经开出去了他很生气。店主告诉他就只一间房子还将就可以用。那是一间小房子，里面是些简陋的小床，上面胡乱地铺着稻草沿墙排成一线，平常开给苦力们睡的。他放肆发起脾气来，忽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极其令

人震奋的场面。这官员，他的两个同伴和轿夫们都大喊大叫反对这种无理的强加于他的侮辱，这时店主和旅店的那些茶房都向他们来求情劝慰，请求原谅。官员就大发雷霆，威胁恫吓。以前是那么平静的院子，几分钟之内响彻了怒声的吼叫；接着，又象开始时那样地平静下来，吵闹声停息了，官员走进了空房。热水由拖着脏衣服的茶房拿来，店主跟着端来大碗热气腾腾的米饭。一切又清清静静了。

一个钟头以后，上床前，我到院子里搞五分钟两腿伸缩运动，于是有件事使我吃了一惊，我恰巧遇见了那肥胖的官员，一小时以前他是那样骄矜浮夸，妄自尊大，现在他和我的衣衫褴褛的仆人坐在旅店的桌子跟前。他们友好地交谈着，那官员安静地吸着水烟袋。他那样大闹一顿是给自己挣挣面子的，但是一旦他的目的得到满足，于是觉得需要谈话，就接受了任何苦力来参加而没有一点社会地位差别的思想了。他的态度是热忱的，同时中间没有屈尊俯就的痕迹。苦力站在平等的地位上和他谈话。这使我觉得似乎是真正的民主，在东方人中间，人的平等的观念你在欧洲找不到，在美洲也找不到。地位和财产使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优越性，这纯粹是外加的，于是他们之间就没有社会交往的纽带了。

当睡在床上我问自己，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这样更大的平等，必然的结论是必须向能够藏垢纳污方面去找说明。因为在西方我们由于气味相投而人以群分。工人是我们的主人，喜爱用铁腕统治我们，不可否认他有些发臭：没有人会对这感到奇怪，当你必须匆匆忙忙在工厂上班铃响之前去做工时还要为着清晨洗个澡，这不是什么痛快的事情，搞重体力劳动也不是蛮惬意的；假于你不能帮助一个长舌妻子做必须做的星期天洗涤，你也不会勤换内衣。我不责怪工人，因为他发臭，但发臭是他做出来的。对于一个鼻孔灵敏的人，这就造成了社会交往的困难。以一个清早的浴盆划分阶级，比用出身、财产或者教育更为有效。那些从劳动阶级兴起的小说家恰当、灵巧地把这作为阶级偏见的表征，这很值得注意。我们当代一个最杰出的作家，在他引人入胜的小说里常用他们每天早晨要洗个澡来刻划那些恶棍。目前，这些中国人把整个生活和有非常龌龊气味的人簇集在一起，他们不去注意那些气味。对于袭击欧洲人的气味他们的鼻孔都是迟钝的，所以他们能用肮脏的带子维系在一起。苦力和手艺人在平等的立场上活动，我胆敢设想，那种不避讳藏垢纳污的作法，比议会机构之对民主精神更为需要。"卫生设备"

的发明破坏了人类平等的观念。这就比聚集在少数人手中的垄断资本负有更多阶级仇恨的责任。

这是一种悲剧性的设想，当第一个人随随便便地拉下抽水马桶水箱的拉手的时候，他就拉响了民主精神的丧钟。

福音宣讲师

他是个高大的人，长着一身肉，那衣服穿在他身上绷得紧紧的，给你的印象是买了衣服后他又发了胖。他老是穿着一套蓝色的、显然是在百货公司买的现成货（衣服的翻领上装饰着一面小英国旗），一只高高的浆领和一条白领带，领带上有一朵毋忘我草的装饰物。他的短鼻子和好斗式的下颔使他的脸有一种坚定的表情；他那副在大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睛是大而蓝的；他的头发由两鬓向后梳着，紧紧地贴在头上，平直而呆板。但是在帽子顶上插了一根翘然耸立的鸡毛。

最初他溯长江而上旅行，但是他对周围的事物不感兴趣。对伸展在他前面的悠然而逝的汹涌的江流望都懒得去望一眼，也不去看每当日出或日落赋予那些景物的颜色，是带有悲剧意味的呢或者是温柔敦厚的。大木船张着长方形的大白帆，平稳地顺流而下行驶。月亮出来了，滔滔滚滚的壮丽的江水泻着银光，给岸上丛林中的寺庙增添

一种神奇的魅力。对这些他坦白地就是厌烦了。有一段日子他学了三个月中文，但是其余的时间除了纽约时报，他什么也不看。三个月以前，一九一五年七月国会举行宗教方面的辩论，这时天晓得什么原因，他恰好在船上。对于宗教他没有兴趣，而宗教信仰在这个国家繁荣兴盛起来，他是来宣讲福音的。他完全轻蔑地把他们分为魔鬼的礼拜班。我不相信他读过孔子的《论语》。他对中国的历史、艺术、文学茫然无知。

我不了解是什么把他引导到这个国家来的。他说他所参加的工作，虽然报酬低微，就象是一个人参加了文官职务（他抱怨赚得比一个手艺人还少），因而他要求调换一个好工作。他要求增加他礼拜堂的成员，他要求使他的学校自立自给。如果他对女修道院有过重要的访问，现在那里有异教徒对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把什么事情都当作一种商业计划来看待。成功的秘诀，贮藏在“组织”这个珍贵的词里面。他是个正直、诚实、有道德的人，但是他既没有爱好，也没有宗教的狂热。他似乎在中国人是很简单的民族的印象之下，因为他们不知道照他那样做事，他就认为他们是愚昧无知的。他不能自已地表现把自己看得高于他们一等。他们制定的法律不能应用于白人，同时抱怨他们希望他遵从他们的风俗习惯。但他

不是一个坏家伙，确实，他是一个好的有幽默感的人，同时只要你不试图对他的权力提出疑问，毫无问题他会尽全力为你做任何事情。

哲 学 家

真是令人惊异的发现，这么庞大一个城市我似乎觉得地点竟是这样偏僻。站在它作战的城门楼上朝着日落方向你能望见被雪覆盖的西藏那些山的巅顶。人口这样稠密，你只有在城墙上才能安然散步，就是一个步履快捷的人也要三个小时才能绕完它一圈。这里一千英里以内没有铁路，同时河道水浅，只有轻载的民船才能完全航行。坐小船需要五天才能到达长江的上游部分。在那心绪不安的时刻，你会自问：是否火车、轮船正如我们每天用它时所认为的那样，是生活行动所必不可少的？因为这里没有这些东西，成百万人也要安家立业，男婚女嫁，生儿育女，到最后衰老死亡。在这里成百万人也要忙碌地从事商业，文化和思想。

这里住着一位有名望的哲学家①，要去看他是我这次有几分艰巨旅行中的有刺激的愿望之一。他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大权威，据说能够流利地说英语和德语。他在慈禧太后的一个最大总督大臣那里当过多年师爷，但是现在过着退隐生活。可是全年中仍然在一个星期中有几天为探讨学问和传授儒家学说而开门讲学。他原有一批门徒，但是人数减少了，学生中的一大部分与其到他朴素的寓所去学习和听他的严谨的告诫，还不如到有豪华建筑的外国大学去和学那些番人的有用的科学去。据说他不过只是轻蔑地打发他们离开而已。从我听到有关他的一切，我推断他是个有个性的人。

当我宣称想会见这位著名人物时，我的居停主人立即表示要安排这次会晤。但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一点影子。我查问了一下，主人耸了耸肩膀，说：

"我送了一张便条去叫他来，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来，他是一个固执的老家伙。"

我想以这样傲慢的方式去接近一位哲学家是

---

①指辜鸿铭（1856—1928）。福建同安人。留学英、法、德等国，曾为张之洞幕僚，清末官外务部左丞。辛亥革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著有《读易堂文集》等，译有《痴汉骑马歌》。又以西文介绍儒家经籍，有《春秋大义》，并有《论语》、《中庸》等译本。毛姆是在成都访问他的。

不合适的，同时他对邀请这样不予理睬也使我不得不感到惊讶。我用能够想出的最客气的措词写了一封信去询问，不知道他是否允许我去拜访，出乎意料两小时内我接到一个回信，约定第二天上午十点见面。

我是坐轿子去的。路长得好象没完没了，我走过拥挤的市街，又走过冷僻的街道，直到最后来到一条寂静、空荡的街上，一长线白粉墙上的一张小门前，轿夫放下了轿子。一个轿夫去敲门，在等了一段时间后，门上的一个小门洞打开了。一双黑色的眼睛向外张望。经过简短的问明来意，最后我被一个青年接待了。这青年脸色苍白，精神萎靡，穿着陈旧，示意要我跟着他。我不知道他是一个仆人或者还是这位大人物的一个门生。我通过一个破旧失修的庭院，被引进一间长而低矮的家具稀少的房间，其中有一张美国的桌面可以卷缩的写字台，一对紫檀木椅子和两张中国小桌子。沿墙都摆着书架，上面是大量的书籍：它们中的大部分自然是中文书，但是有许多哲学的和科学的著作，有英文的，法文的和德文的，还有数以百计的散装的笔记和心得。在那些没被书架占满的墙壁上，就挂着各种不同风格的书法条幅，我猜想那中间有孔子的语录。地上没有地毯。这是一间清冷、荒疏、不舒适的房间。它的阴沉，

仅由于放在桌上的一个长花瓶里一束亭亭玉立的黄色菊花，才使它盎然有点生意。

我等了一些时候，青年出来，端着一壶茶并两个杯子，和一听弗吉尼亚香烟摆在我前面。他出去后哲学家就进来了。我马上表明他允许我拜访使我感到荣幸的意思。他让我坐在一张椅上，同时倒了一杯茶给我。

"承蒙不弃，惠予枉顾，"他回答说，"贵国人同苦力和买办打惯了交道，他们以为中国人必然都是一样的。"

我冒昧地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我没有抓住他的中心思想。他向椅背上一靠，用一种嘲讽的表情望着我。

"他们以为我们可以招之即来。"

于是我知道那位朋友的倒霉的便条仍然在引起怨恨。我不好如何回答。我低声含糊其辞地解释了几句。

他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高个儿，有一条细小灰色的辫子和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下面一边一个肿泡泡的泪囊。他的牙齿残缺了，颜色黄污。他非常清癯。他的手，文雅瘦小，衰弱而有点象爪子。人家告诉我他吸鸦片。他穿一件陈旧的黑长褂，一顶黑小帽，两者都旧得不好再穿戴了，深灰色的裤脚扎在踝部。他正注视着我，他还不

十分清楚究竟对我应持什么态度，他有正在那里放哨的人的那种神气。自然，哲学家在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有关的事情的人中间，占有崇高的地位，不是我们有B•狄斯累利[①]这样的权威吗，他的崇高地位必须用大量的恭维去对待。我一下抓住了戴高帽子这个做法。现在我意识到了在他的举止态度方面有某种程度的缓和了。他象那种一切准备就绪和作古正今地等待着给他照相的人，只想听到快门咔嚓一响好让他无拘无束地走开。他领我看他的书籍。

"我在柏林得哲学博士学位，你知道，"他说，"后来我在牛津大学又读了一个时期。假于你允许，我要说，英国人对于哲学没有多大颖悟。"

虽然他下了这一带有歉意的评论，这是很明显地，他不是不喜欢说一点轻微不合人意的事情的。我提示说：

"我们有一些哲学家对于世界思想也不是没有影响的。"

"休谟[②]和伯克利[③]吗？在牛津教课的哲学家们中，当日我在那里总不想去冒犯他们神学上的那些同事。他们并不顺着他们的思想达到逻辑

①英国政治家及小说家，于1868—1874—80任首相。

②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

③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

的推断，以免他们的大学社会的地位万一发生危险。”

我问：“你读过现代发展起来的美国哲学吗？”

“你是说实用主义吗？那是那些想要相信难以置信的事情者的最后避难所。我倒认为美国石油比美国哲学对我们更为有用。”

他的评价是尖刻的。我们再一次坐下，同时又喝了一杯茶。他的谈兴更浓了。他说一口有点正规的但是合乎语言习惯的英语，为了帮助表达意思，不时带出一个德国成语。就一个有固执性的人的所受的影响而论，他可能受德国影响太深。德国人的治学方法和勤奋已深深印入他的头脑，当一个勤劳的教授在学术杂志上发表其著述中的一篇文章，他们哲学上的敏锐对他也是影响深远的。他说：

“我写过二十本书，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从没使我在欧洲得到接受出版。”

但是他研究西方哲学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满足他对智慧的要求而已，而终究又发现其智慧不过都在儒家学说准则之内。他带着商榷的观点接受那些哲学。他的精神上完美无缺的需要所得到的回答，致使所有西方的学问似乎都感到落了空。我对这些发生了兴趣，因为这证明了我的一个看法。与其说哲学是一种逻辑，不如说它是一

种有个性的事情：哲学家相信的不是根据确证，而是根据他自己的气质，他的思维只不过是为制造一个他的本能认为是真的道理而服务。如果儒家学说之所以在中国人中取得如此牢固的影响，这是因为它做了其他思想体系所不能做的对他们人性的解释和表达。

我的主人点燃一根纸烟。起先他的声音细小、疲倦，但对他说的起劲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宏亮了。他慷慨激昂地说，没有一个他可资信赖的贤人。他是一个能言善辩者，也是一个战斗者。他厌恶现代那种为个人主义而叫贼。对他来说社会是个单位，而家庭是社会的基础。他赞成旧中国和旧学校，君主政体和孔子的严厉的准则。当他说到那些学生时，他的脾气变得粗暴和痛苦起来，新从外国大学回来的学生，用他们亵渎的手，拆卸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他大声说：

"就说你们，你晓得你们正在做什么？是什么理由你们认为自己比我们高出一筹？难道你们在艺术上或者学术上能胜过我们吗？难道我们思想家的造诣不如你们的深吗？难道我们的文化不及你们博大真纯、艰深缜密、精益求精吗？不对吗，当你们还在穴居野处身上披着兽皮的时候，我们已是开化的民族了。你们知道我们在尝试做一个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实验吗？我们在寻求不

用武力而用智慧治理这个大国。若干世纪来我们一直追求着。那么为什么白种人看不起黄种人？要我告诉你吗？因为他发明了机枪。那就是你们的优越性。我们是无防御的人群，而你们就能够把我们置于死地。你们已经把我们哲学家的梦砸得粉碎，说世界能够由法律和命令的力量来治理。你们已经将你们丑陋的发明强加于我们，同时现在你们又要把你们的秘密教会我们的年轻人。你们不知道我们有机械学的天才吗？你们不知道在这世界上有四万万最讲实效的最勤劳的人民吗？你们想到这需要我们有较长的时间去学习吗？当黄种人能够把枪炮做得和白种人的一样好，射得一样准，那你们的优越性又在哪里？你们诉之于机枪，你们靠机枪来裁判。"

但在这时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个小女孩斯文地走进来，紧紧偎倚在这位老先生身边。她用好奇的眼光盯着我。他告诉我这是他最小的孩子。他用双手搂着她，同时用爱抚的悄悄话对她说话，喜爱地吻她。她穿一件黑旗袍，裤脚露出齐她的踝节部，一根长辫子拖在她的背上。她出生于皇帝退位辛亥革命取得圆满成功的那天。

他说："我想她宣布了新时代的春天，她也是这伟大帝国覆灭的最后的花朵。"

他拉开桌面可以卷缩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

拿了几个铜币给她，打发她走了。

"你看我还蓄着一条辫子，"他说，把辫子拉到手上。"这是一个标志，我是旧中国的最后的代表。"

现在他对我讲话温和多了，他谈到中国古代哲学家如何带着他们的门徒周游列国，传授所有人们值得学习的学问。各国王侯召唤他们到国家议事，任命他们为城市的治理者。他给我讲了他的国家历史上的一些掌故。他的学问是渊博的，他雄辩的词组给那些掌故以一种光怪陆离的生命力。使我不得不思索他那有点令人哀惋的形象。他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管理国家，但是没有国王委他以官职；有渊博丰富的学问，梦寐以求地想传授给一大帮学生，而到这里来听讲授的只是少数，一些愚顽不幸的，面有菜色的，资质鲁钝的，村野土气的人而已。

经过一次、两次斟酌，使我想到应该提出离开了，但是他不想让我走。现在，最后不得不走了，我站起来。他抓住了我的手。

"我很愿意送你一点什么作为你拜访中国的最后一个哲学家的纪念品，但我是一个穷人，而我不知道送什么才值得你接受。"

我讲明我们这次会见的本身就是无法估价的纪念礼品。他笑了。

"在这些变化多端的日子里人们的记忆是短暂的，我很想送你某种更实质性一点的东西。我是不是送一本我的书好，但是你又不能读中文。"

他带着一种友好的困惑神情望着我。我来了一点灵感，说：

"就送我一张你书法的范本吧。"

"你喜欢这个吗？"他笑了。"在我年轻的时候练过某种字体，还不是完全拿不出手的。"

他在桌旁坐下，拿出一张宣纸，铺展在他前面。倒了一点水在砚台上，磨好墨，于是拿起他的毛笔，挥洒自如地写起来。当我以不小兴趣一边看他写字，一边就想起人家告诉我的他的某些事情。说起这位老先生当日也曾剩积了一小笔钱，通常惯有的那些流言蜚语，就说他把那钱随意花在街上的烟花场所。他的长子是这城里一个有脸面的人，为这种行为的丑闻感到丢脸、恼火，仅仅是他的强烈的孝顺义务才没有严厉地去谴责这位浪荡的父亲。我想这样的放荡会使一个儿子仓皇失措的，但是对于人性的学者却会沉着看待。哲学家都能在他们的研究中精心制作他们的理论，至于有关生活形成的结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第二手的。假如他们自己也面临降临到一般人头上的盛衰交替的时候，我经常认为似乎他们的著作应该有个较为明确的意义。我准备对有关这

位老先生在秘密地方的放荡生涯采取宽厚的态度。或许他寻求的不过是去阐明人类幻觉的极为不可理解的一面吧。

他写完了。待纸上的墨干了一下，拿起来把它交给我。

我问："你写的什么？"

我想他的眼睛里有一点轻微的恶作剧的闪光。

"冒昧地向你呈献了我自己的两首小诗。"

"我不知道你还是个诗人呢。"

"当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开化的国家时，"他挖苦地说，"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能够写几行雅致的诗词的。"

我接过纸，望着上面的中国字。它们在纸上构成一种惬意的图样。

"可不可以也请你给我翻译一下？"

"翻——什么译咧，"他回答说，"你不要期望使我原形毕露了。去问一位你的英国朋友吧。那些自命懂得中国最多的人，结果是什么也不懂，但是你至少可以找一个能够胜任的人给你搞几行粗略而又简单的复制品吧。"

我向他告别，他极其客气地要我还坐坐。我有机会把那些诗给一位我相识的汉学家看，下面就是他的译文。坦白地讲，诗无疑是高标准的，我

读它时，有点感到吃惊。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美，
你的眼波含笑，你的纤手柔荑。
然后你爱上了我：你的声音辛凄；
你的眼里满含着泪；你的双手令人痛惜。
伤心呀，伤心爱使你成为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你眼睛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所有令人痛惜的煊赫。
　　于是我要独自爱着你，
　　而最后你才会关切。

值得羡慕的年月转瞬即逝，
　　而你已经失去
你眼里的明亮，你皮肤的桃色，
和你青春的所有媚人的煊赫。
　　唉，我不爱你了，
　　即令你关切我我也不会关切。

我应该感谢我的朋友P·W·戴维逊先生的友好帮助。

女 教 士

她肯定有五十岁了，但是从来没有对有罪的生活怀疑而受过折磨，因而她的脸没有发皱。由于思想上的迟滞，也从来没有在她光滑的额头上加条纹。她的五官显得大胆端正，颇有几分男子气概，她那坚定的下颏，足以证实她眼睛所给予你的印象。眼睛是蓝色的，自负而决断。通过圆而大的眼镜向你显示了这一切。你觉得这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女人。她的上帝之博爱是足够高于一切事情的，她喋喋不休地讲述她对各项事物有明显的好心，而你不过是其中的某一事物而已。可以这样设想，她不是没有人类的虚荣心的（这是从宽厚方面对她的估计），自从她穿上一套紫罗兰色的绸衣，上面绣着大量的花朵，在那不太高雅的头上，戴着上面插了许多三色堇的无檐的帽子，几乎是有点时髦过分了。我的叔父亨利，在威茨特博当了二十七年教区牧师，关于教士妻子服装的的正常情况他有一种断然的意见，但他从

来不反对我的婶母苏菲穿紫色衣服，而在女教士的长袍方面他也没有持什么批评的看法。她谈吐流利，象扭开一个装在平稳水流上的龙头。她的谈话有一个在竞选运动终了时的政治家的令人惊羡的滔滔不绝。你觉得她懂得什么，什么就是她的意思（我们绝大部分人罕有这一成就），有什么意思她就能说出什么来。

“我常常想，”她愉快地谈到，“假如你了解一个问题的两面，那你就会比了解一面所作出的判断不同。但是事实留下在那里的是两个面，而两个面又可以变成四个面，你争辩通宵而能把它们变成五个。你说我是对还是不对？”

我连忙使她确信她是对的，虽说把这些相对论的新论理，和平行线永远平行用于这样令人惊异的方式之下，我总觉得没有一个人的心里是会过分首肯的。

“没有人能够吃掉他的饼子同时又有那个饼子，”她接着说，举了彭尼德托克鲁契① 的理论为例，这个措辞对于表达什么没有多大用处，“一个人可以用光滑获得粗糙，但是正如我常常对孩子们说的，你不能随心所欲去期望有一切东西。世上无完人，我常常想假如你总是希望从人家那里

①意大利哲学家及政治家。

得到最好的，那你就会如愿以偿。”

我承认我动摇了，但是决定尽一己之所能把道理弄清楚。这仅仅是为了礼貌。我开始热切地说：

“大部分人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发现每一片云有一块银色的里子。坚韧不拔，你就能做出一切你力所能及的事情，而终究要什么你有什么，不若有什么你要什么为好。”

当我做了这种有信心的陈述之后，我看见她的眼睛里现出一种突然的困惑之光，但是，大概这仅仅只是我的幻象，因为她气势汹汹地点了点头。

“自然，我了解你的观点，”她说，“我们能够做得比能做的更多。”

但是我的火气来了，对这打断我置之不理。我继续说：

“少数人认识到这个深奥的真理，每一英镑有二十先令，每一先令有十二便士。我确信与其糊里糊涂地撞过一座砖墙，不如最好聪明先去看看你自己的鼻子尖。如果这中间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全体大于部分。”

当时，经过一次热情的握手，坚定、独特地祝我一路平安，她说：

“好，我们有一次极有兴味的聊天。在象这

样一个地方总算做了一回好事，离开文明这么远，用各人相等的智慧交换了意见。”

我低声说：“特别是用人家的智慧。”

她反驳说：“我常常想一个人应该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那里受到教益，这表明那些了不起的死者并没有白活。”

打弹子

我坐在旅馆的门厅里，正在读一份几天前的《华南时报》，这时酒吧间的门有点莽撞地冲开了，走进来一个很高而瘦的人。他说：

“你愿意打一盘弹子吗？”

“当然可以。”

我站起来和他一起走进酒吧间。这是一家石头砌的小旅馆，外表上有点自命不凡的样子，它是由一个吸鸦片的葡萄牙欧亚混血种人开的。只有五六个人住在这里：一个葡萄牙官员和他的妻子等船到远处的殖民地去，一个兰开夏的工程师整天闷闷不乐地喝着酒，一个神秘的女士，已经不年轻了，但是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样子，她到餐厅里来吃饭，然后又立刻回到她的房间去。

我以前没有看见过这个陌生人。我猜想他是晚上坐一条中国船来的。他是一个五十过头的人，好象他的体液已被热带的太阳晒干了，有一张几乎象砖一样红的脸。我不能断定他的身份。他可

能曾经是一个小商船上的失业船长，或者是香港某外国洋行的代理人。他非常沉默，同时在打弹子中间对我碰机会得了点子，他也并不做声。他的弹子虽说不是杰出的，却打得相当好。他是一个非常令人愉快的一同玩球的伙伴。当他把我的本球撞落袋子时，他留着好打的一杆球以代替给我两次开球的机会。但是当这盘已经完了，而我赢了，要不是突然间他打破沉默要求是他的第一杆，我从来没想到要轮到他先来。在打弹子中间他没有向我提出过任何奇怪的问题。

“你相信碰运气吗？”

“你是说打弹子吗？”我回答说。他的答话里不只是感到一小点惊讶：

“不，我是说在生活里面。”

我不打算认真答复他。我说：

“我几乎不知道。”

他下杆击球，打得有点滑。他在杆子尖上擦了点粉，说：

“我相信碰运气，我相信假如有事情要找你，你躲也躲不脱。”

就是这些，他没有再作声。当我们打完了这盘，他上楼睡觉去了，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他。我将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个什么奇怪的冲动驱使他对一个陌生人提出那个突然的问题。

船长

我知道他喝酒。

他是新设立学校里的一名船长，一个整洁的小个头的人，脸刮得很干净，他曾经很容易地通过了批准当潜艇指挥员。在他的小舱房里，挂着一件漂亮的上面有金色镶边的大衣，这件制服因为它在战争中的良好服务已经允许用到商业海运上来，但是他有点害羞去穿它。当他只不过是长江上一条小船上的船长时，穿它似乎是可笑的了。他穿着一身相当洁净的棕色衣服，戴着一顶杭堡帽[1]站在他的驾驶台上，你几乎可以从他的令人羡慕的擦得发亮的皮鞋上照出你自已来。他的眼睛清澈而明亮，他的皮肤鲜红。虽说他曾在海洋上长达二十年之久，而且离四十岁也差不多远了，他看起去还不过二十八岁光景。你会认定他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他的头脑和身体一样健康，人

①男用窄边凹顶的毡帽。

家说的东方的堕落、腐败他都是远离而没有接触过的。他对通俗文学有一种可贵的鉴赏力.E·V·刘卡斯的作品装满着他的书架。在他的舱房里你看见一张他在一个足球队里的照片，和两张一个发型波浪卷得好看的年轻女人的照片，她很可能是和他订过婚的。

我知道他喝酒，但是我没想到他喝得很多，直到他突然问我：

"什么是民主主义？"

我报以一个规避的，或者无礼的答复，在这场合之下有几分钟淡话转到比较少数不合常规的题目。于是，他打破沉寂说：

"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说的就认为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我问什么是民主主义？"

我回答："我一点也不认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一定会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

"我向你用名誉保证我不是的，"他断然说，"假如我随心所欲，我要他们对墙站直，然后开枪打死他们。"

我问："什么是社会主义？"

"啊，你晓得我的意思，亨德森和R·麦克唐纳以及所有那类东西，"他回答说，"我对于工人这两个字听厌烦了。"

"但是据我看，你自己也是一个工人呀。"

他沉默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想他的脑子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兜圈子。但是我错了。他认为我刚才说的完全迷失了方向，因为最后他说：

"请注意，"他指着身上的一个徽章，"我不是一个工人。真该死，我是哈罗公学[①]毕业的。"

---

①在英国伦敦市附近，一所培养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的男子公学。

城 市 风 光

我不是一个勤奋的观光者，当职业的或友谊的向导极力主张我去拜访一座名山，我有一种顽固的撵走他们的爱好。太多的眼睛在我的眼睛之前怀着敬畏之情观看过白朗峰[1]；太多的心在我的心之前怀着深深的感情去瞻仰过西斯汀马唐娜那幅画[2]。这些景物都是象太慷慨的同情心的女人一样：你觉得有那么多人在她们的同情中找到安慰，当她们向你祝福时你感到窘迫，于是想用什么老练可行的办法在她谨慎的耳朵里悄悄地告诉她你忧伤的全部故事。想得到你会弄巧反拙，终于闯下滔天大祸！于是你只得说，不，女士，我决定承担我的悔憾，（假如不能独自负担，那最好）分给某个不十分那么肯定自信能用对我说大道理来安慰我的人一些吧。当我在一个外国城市，

①法国东南部，为阿尔卑斯山最高峰。

②意大利皮亚逊查的圣西斯多教堂中拉飞尔画的圣母象，现存特雷斯丹的皇家艺术馆。

我宁可随便闲逛。或许，我失掉着迷一个哥德式大教堂的机会，说不定我会碰上一个小的罗马式的小拜礼堂，或者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门廊，在这里我将可以自鸣得意再没有谁来找麻烦了。

但是自然一个真正很特殊的风景，失掉它是可惜的。我偶然遇见它纯粹是碰机会。我沿着一条城墙外面尘土飞扬的大路闲逛，在大路的一边我看见一系列的纪念牌坊。它们都是不大和简朴的，不是横跨在路上，而是一个紧挨一个树立在路旁，有时也有一个立在另一个前面，仿佛它们之所以建立在那里不过是铭记对去世者的尊敬，或者是为了表彰贞节的一种形式上的敬意，正如国王的生日授予骑士以外省城市的杰出公民荣誉身份一样。在这行牌坊后面地形轮廓分明地升起。在这国家的这部分，中国人埋葬他们的死者，喜欢选择葬在山坡之阳，以致那里坟墓累累。一条踩出的路通向一座小塔，我朝着这塔前进。这是一座象桩墩一样的小塔，十英尺高，或许，由粗糙的石块砌成。它是一个锥形物体，塔顶象法国哑剧中丑角戴的帽子。我站在荒冢之间的小丘上，衬着蓝天觉得富有奇趣和颇为风景如画。在塔脚下是一些粗糙的篮子，乱七八糟地丢在那里。我围着塔转了一圈，在一边我看见一个长方形的孔，十八英寸高八英寸宽，大概，从这里悬挂了一根

粗的绳子。从这孔里放出一种非常奇怪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突然之间，我懂得这古怪的小建筑物是什么了。这是一座婴儿塔。那些篮子是装着婴儿来的，有两三个还是新带来的，放在这里还不到几个钟头。那么绳子是做什么的呢？唉，假如人们把婴儿带来，父母或祖母，接生婆或乐于助人的朋友，出于一种人道的措施，可以不必担心让这新生的孩子跌到底部（因为在塔的下面是一个深坑），可以用绳子把它轻轻放下。气味是腐烂作用所产生的气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一个活泼的孩子向我走来，使我懂得那天早晨有四个婴儿被送到塔里来了。

有些哲学家他们用确信的自鸣得意看待罪恶，如果没有罪恶他们就认为没有善良的可能性。没有贫困那么慈善机关就找不到机会周济穷人，没有痛苦就不会有同情心，没有危险就不会有英勇，没有不痛快就不会有辞职。一个他们观点的恰当的图解就是他们找到了中国人杀害婴儿的现实，要不是为了婴儿塔，在这城里就不会有个育婴所；于是旅游者将要失去一个有趣的古怪景物，一些贫苦的妇女就没有机会去抚育婴儿实习一种美丽的和动人心弦的美德。孤儿院是破旧失修，泥水脏污的，它位于这城市的贫苦拥挤的部分。因为由这里仅有的五个西班牙人主持经营，想这

地方更方便她们居住，对她们更有用处。此外，她们没有钱在有益健康的地段建筑宽敞方便的房屋，这机构是靠她们教给女孩子们作花边和精美的刺绣产品，和信徒们的救济维持的。

两个女修士，女修道院院长和另外一个，带我去看这里的一些可看的。很奇怪，当你走过那些粉刷白了的低矮、清冷和光秃秃的房间，几间工作室，几间游戏室，集体寝室和食堂时，你以为是在西班牙，当你经过一个窗子，你有一半希望看到基拉尔达峰。看女修士用爱抚去利用孩子们是迷人的。她们约有两百人，自然都是孤儿，意思就是说她们的父母遗弃了她们。那里的一间房子里有一些孩子在玩耍，都是四岁左右的，也一样高大。她们有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看起去都是那么相象，致使她们好象是一个住在鞋子里的中国老太婆教养的孩子[①]。她们拥挤围绕着两个女修士，同时开始同女修士们一起蹦来跳去。女修道院长有我曾经听见过的最柔和的声音，但是当她和最小的小家伙开玩笑时，声音变得更温柔一些，她们偎依环绕着她。她看去就象一张圣母之爱的图画。孩子们有的是畸形的，有些是

---

①英国流行的一个民间故事：有个老太婆住在一只极大的鞋子里养着许多孩子。

有病的，有的瘦小和丑陋，还有双目失明的，这使我有点儿颤慄；当我看见爱充满她仁慈的双眼和充满深情的她的甜蜜的笑，我惊骇了。

于是我被带到一间会客室，她请我吃小的甜味的西班牙糕，同时给我饮了一杯曼查尼拉酒。当我告诉她们我曾在塞维利亚①住过，第三个女修士被叫来了，因此她能够和一个曾经看见过她诞生的城市的人交谈几分钟。带着自豪她们带我看了可怜的小教堂和圣母玛利亚的俗气的雕像、纸花和华丽而俗气的赝品装饰物。这些深爱地忠实的心啊，哎，都被单调、可厌的趣味占有了！我不去关心这一切：对我来说这儿有某些事情肯定接触了那可怕的鄙俗，然而当我离别之际，女修道院长问我是否有意关心去看看今天送来的几个婴儿，意在说服人们去领她们。人们领一个给两角钱，两角钱！

“你看，”她解释说，“她们常常要走好远的路程才能到这里来，除非我们给她们一点东西吃，她们才不会找麻烦。”

她带领我走进靠近修道院进门的地方的一间小接待室，在这里放在一张桌子上，用一张床单盖着的，是四个新生的婴儿。她们刚刚洗干净，

---

①西班牙西南部一个城市。

裹在一件大褂子里面。床单揭走了，她们一个挨一个向天摆着，四个极小的，蠕动着的小家伙，脸上非常红，颇象十字形，或许，这是因为她们已经洗过了而且很饥饿吧。她们的眼睛似乎异常大。她们都是这样小，这样无所救援；当你望着她们的时候，你勉强地笑着，而在同时你觉得有一块东西梗在你喉咙里。

黄　昏

或许向晚了，走得很疲乏，你坐在轿子里在山脊上走过一座石砌的门。你不能说明为什么在这远离村落的荒废的地点会有一座石门，但是一段宽厚大墙的片断，提示了这是辽远的朝代为了防御敌人，在这里构筑的城墙的遗迹。当过了门你看见下面稻田里的水闪闪发亮，象棋盘的菱形花样，有点象在中国的《爱丽思漫游奇境记》里，然后是树木覆盖的环绕着的群山。使你的沿着石级而下走上的大路，是条从城市到城市的高出地面的公路，在夜色四合之中你通过矮树从林，寒冷的夜间树林的气味从那里向你吹送。当你不再听见轿夫踩踏的脚步声，你的耳朵会突然之间为他们换肩的尖锐喊声所惊震，同时也为他们无休止的谈话或者他用以使单调的途程富有生气即兴而来的片段歌声所震聋。至于林地的气息好象是从肥沃的英国肯特郡的泥土那里偷来的，正和当你通过布莱恩树林所闻到的气味一个样。而怀乡

病也就抓住了你。你的思绪万端，从此地和现在通过时间和空间远远地翱翔，同时你记起你消逝的青春并它的远大希望，它的热烈的爱情和它的抱负。于是，假于你如人们所说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因此也是一个感伤主义者，眼泪将不期涌上你的眼眶。而当你能恢复自制能力时，夜幕已经落下了。

正常的人

有一次我不得不要学习解剖学，这是一种很闷人的事情，因为那有一些不诗不文，不伦不类的事物的大量数字要我记忆。但是我的教师在帮我解剖一只大腿时说的一句话，倒是经常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徒劳无功地在搜寻某一条神经，而这需要他那高明得多的技术才在我没有寻找过的地方发现了它。我感到委曲，因为课本上的记载把我引入了歧途。他笑着说：

“要知道，正常的东西是世界上最稀有的东西。”

虽说他说的是解剖学，可能等于说出了人的真理。偶然的观察倒使它自已印入了我的脑子，而许多更深切一些的注意反而没有留下印象。自那以来许多年已经过去了，由于这些年所带来的人性知识的不断增加，更发增强了我对它是真理的信念。我曾遇到过成百的人，他们似乎是完全正常的，但发现这仅只是他们目前的一种特性，几

乎不过是在他们自己的那帮人中所加给他们的标记。发现在各方面表现出极为平常人的隐蔽的古怪脾性，对我是不小的款待。我曾常常惊愕地偶然发现人们有丑恶的腐败堕落行为，你可以起誓这是一些完全普通的人。最后我发现寻找正常的人如同寻找艺术珍品一样困难。使我觉得如果了解了他，这将给我以特别的满足，那仅仅只能用象审美这样的词来形容。

我总以为在罗伯特韦布身上发现了他。他是一个较小口岸的领事，我写过一封信给他。我设法通过在中国方面的关系听到许多有关他的事情，可尽是好的。每当碰巧我提到要去他驻在的港口，别人一定会告诉你：

"你会喜欢波布·韦布的。他是个好得惊人的小伙子。"

说他是作为民众的一员官吏，不如说他是作为私人的个人。他设法取悦商人们，因为他为他们的利益积极活动，他不怕得罪中国人，中国人嘉许他的坚定，或者对教士也一样，传教士就称道他的私人生活。当中国革命期间，靠着他的老练、圆滑、果断和勇敢，他当时在这城里不仅从大危险中保全了在城里的外国人口，也同样保全了不少中国人。他前往交战的派别之间作为调停人，靠着他的足智多谋而竟能够达成满意的解

决。他被记下以备提升。我确凿地发现他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虽说他不怎么漂亮，他的外表是逗人喜欢的：他长得高高的，或许有一点点超过平均高度，由于掩盖得法，不象是发了胖，肤色鲜润，现在微向前倾(因为他年近五十了)，有一点儿象今天早晨发了胖。这並不奇怪，因为在中国这些外国人都大吃大喝两者兼而有之的，而罗伯特韦布对这些生活中的好东西有一种健全的爱好。他家有好厨，待客周到。他喜欢高朋满座，几乎很少不是有一两个人和他一起共进午餐或正餐的。他的眼睛是蓝色和友善的。他有给予愉快的社交天赋；他钢琴弹得很好，他喜欢的音乐是别人喜欢的，同时假如别人要跳舞，他随时准备弹奏一曲一步舞或者华尔兹。他有妻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在英国要赡养，不能负担喂养赛跑的马，但是他对赛马有强烈的兴趣；他是一个网球高手，同时他的桥牌打得比一般人好。对不喜欢的一些僚属，他不让自己利用职权去倾覆他们，同时晚上在俱乐部里他和蔼可亲，而不装腔作势。但是他不忘记他是大英帝国国王陛下的领事，我羡慕他不自大，而能维持他认为对自己地位必要的尊贵的技巧。一句话，他有很好的生活方式。他令人愉快地交谈着，虽然他的兴趣有点普通，但是是变化多样的。他有一种友好的幽默，

他能够开个玩笑和说一个好故事。他的结婚很幸福。他的儿子在查特豪斯公立学校学习，他给我看一张一个高个儿美貌少年的照片，这少年穿着法兰绒衣服、有一张坦白而令人喜爱的脸。他也把他女儿的相片给我看了。一个人必须从他家庭分开一个长的时期，这在中国是生活中的一个悲剧，由于战争的原因罗伯特韦布没有看见他的家庭有八年了。他的妻子当男孩八岁女孩十一岁的时候带他们回英国的家里去了。当日他们的意思是等他调到一个新地方他们好一起到那里去，但是他被固定在一个对孩子们和他都不适合的地方了，于是他的妻子同意最好她带着孩子们先走。他的别离预期届满三年，于是他能够和他们一起度假十二个月。但当到期的时候这里又爆发了战争，领事馆的职员人手缺乏，同时这里又不可能让他离开他的岗位。他的妻子不想同年幼的孩子离开，旅途困难而又危险，没有一个人以为战争会持续到这样长久，于是年复一年，几年就这样过去了。

"当我最后看见我的女儿时她还是个孩子，"当他把相片给我看时对我说，"现在她是一个结了婚的妇人了。"

我问她："你打算什么时候离任？"

"啊，我妻子现在正打算来了。"

“但是你不想看你的女儿吗？”我问。

他再一次看看照片，于是望着别处。他脸上有一种奇怪的表情，我想有点象带有怒气的样子，他回答说：

“现在我离家太久了，我将永远也回去不了了。”

我靠到椅背上，点燃我的烟斗。相片使我看见一个十九岁的女孩，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剪短的头发；那是一张秀丽的脸，开朗和友善，但是最值得注意的是表情特别具有魅力。波布·罗伯特的女儿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年轻人。我喜欢那种有吸引力的大胆。

“当他寄来这张照片时，我颇为吃了一惊，”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经常想着老把她作为一个孩子，假如我在街上碰见她，我会不认识。”

他微微一笑，並不十分自然。

“这是不公平的……，当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是受惯宠爱的。”

他的眼睛盯在相片上面。我似乎看见那里面有一种非常出乎意外的激动。

“我几乎不能认清她是我的女儿。我想她会和她妈妈一起回来，而她写信来说她订了婚。”

这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我想这里面在关键地方一定有件丧气的令人难过的事情。

“我觉得可怕地痛苦，我想一个人只有自宽自解，但是她结婚的那天，我为这里所有的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我们都在瞎搞一气。”

他露出一个歉意的笑。

“我曾经……，你知道，”他尴尬地说，“我有这样一个可怕包袱。”

我问“那个年轻人怎样？”

“她和他可怕地恋爱着。当她写那封信给我时，没有谈其他什么。”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古怪的颤抖。“把一个孩子带到世界上来是太不容易了，教育她，喜爱她，所有那类事情恰恰都只是为了某个你甚至都没有看见过的男人做的。我从某个地方得到他的照片，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我不那么想我对他很关心。”

他自己倒了另一杯威士忌，他疲倦了。看去他显得又老又肿胀。一个长时间他没有作声，于是突然间他又重新振作起来。

“好，谢谢上帝，她的妈马上就出来了。”

终究我认为他也不是一个十分正常的人。

老　手

他有七十六岁了。他到中国来时还小，和一个孩子差不多，在一条航海的船上当二副，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国。自那以来他做过许多方面的事情。多年来他指挥一条上海开宜昌的中国船，他熟悉那伟大、可怕的长江的每一寸航道。他做过香港一条拖船的船长，参加常胜军① 打过仗。在义和团运动中他搞到一批钱和财物，辛亥革命期间他在汉口，直到革命军攻克这个城市。他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娶了一个日本女人，随后是一个中国女人，最后，当他接近五十岁时，娶了一个英国妇女。现在她们都死了，就是那日本人缠绵在他的记忆里。他会告诉你她如何把花陈设在上海的屋子里，一个瓶子就只插一枝菊花或一小枝樱桃，他常常记得她如何用纤美的两只手捧着一个茶杯。他有一批儿女，他对他们都不感兴趣，

①1862年（同治元年）清政勾结英美侵略者组成的反动武装。

他们分别定居在中国的不同港口，在银行和航运公司工作，他很少见到他们。他对他英国妻子的女儿很感骄傲，是他仅有的一个女儿，但她结婚后情况很好，回英国去了。他将永远看不到她了。他唯一爱的是那和他在一起达四十五年之久的儿子。他是一个小而干瘦的中国佬，头上秃了顶，行动迟缓而严肃。他五十好几了。他们争吵不休。老手就要告诉儿子他过去的工作经验，这样儿子就必须要摆脱他，儿子说他伺候一个发疯的外国魔鬼厌烦了。但互相都知道对方说的每句话都毫无意义。他们是老朋友，两个都是老年人了，他们将在一起直到死把他们分开。

这还是他娶了英国妻子的时候，他从水上退休和把他的储蓄投资于一家旅馆。但是那並不成功。那是中国有汽车之前，离上海不多远，一个夏天的避暑胜地。他是一个好交际的人，一天在酒吧消耗过多的时间。他慷慨大方，他请人家喝酒有多少人就付多少账。他也有在沐浴时吐痰的特别习惯，如果来客反对就更容易发脾气。当他最末一个妻子死后，他发现是她保持了他免于破产，于是顷刻之间他再也忍受不了他的困境。他把所有的储蓄都花在买地皮上，现在大量抵押了，一年一年用来弥补亏空。他被迫把地皮向一个日本人出售，还了他六十八年的债，才发现自己一

文不名。但是，老天爷作证，先生，他是一个水手。长江上游的一家轮船公司给他一个轮船长的职务（他没有船长职照）；于是他重新回到他熟悉的江上。在这江上工作有八年了。

现在他站在他整洁小船的驾驶台上，这船还不如泰晤士河上一条小汽船那么大，他站在那里堂皇一表，笔直地、苗条地就象他少年时候那个样，穿着一身干净蓝色制服，这家公司的制帽逍遥自在地戴在那白发苍苍的头上，和他的漂亮整齐的翘翘的胡子。七十六岁，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抬着头，望远镜拿在手上，中国舵手站在他旁边，他注视着辽阔、浩瀚、弯曲的长江。一队高船尾的民船，张着它们的方形风帆，在迅速的激流上顺流而下，船夫们一边划着吱吱嘎嘎的桨，一边唱着单调号子。落日照耀下的黄色江水有一种可爱的、淡淡的柔和的色彩，其平如镜；沿着平坦的两岸，树林和泥浆水湿的乡村里的小屋，在白天的暑热下烟雾迷蒙地，现在背着灰白色的天，轮廓分明地剪着影，象皮影戏的影象。他抬起他的头来好象在听大雁叫，望着他们高高地在他头上排成一个大“人”字形，向他不知道的辽远的地方飞去。在远处背着日光单独矗立着一座上面冠有庙宇的小山。因为他太常见这些景物了，他冷淡地看待它们。不知道为什么，即将逝去的白

天使他想到遥远的过去和他的耄耋年纪。他并无懊悔。他低声说道：

“确实，我的生活过得不错。”

原　野

自然，这个小事件是完全不足道的，同时也容易解释清楚，但是我惊骇的是精神上的眼睛能够使我完全盲目，而感官上的眼睛又竟然能够洞察。我吃了一惊地全部发现，如何一个人能够任凭一些联想的法则去摆布。日复一日地我在山地中间行进，今天我知道必须来到这伟大的平原，这里座落有一个古老的城市，这是我决心要去的，但当我从早晨出发动身起一直没有临近它的迹象。确实一些山没有那么陡峭了，当我到达一个山顶的时候，想看看底下的山谷，但是我看见的前面仍然是一座更陡更高的山。坚持不懈地爬山，回头在那边我能看见我走过了那么长的一段白色的路，它绕过的一座崎岖的、黄褐色的、岩石的悬崖的边缘在阳光下发光。天是蓝色的，在西边这里那里挂着一些小云就象渔舟，静止地等到向晚离开达琴纳斯。我沿山跋涉，不停地攀登，企盼着有什么指望在前面等着我，不在这个拐弯

处，那么就在下一个，最后，倒是我正在想别的事情时，突然之间它向我袭来了。但是那是我没有看见过的中国风景，那里有稻田，有纪念的牌坊，有奇形怪状的庙宇，有隐在竹丛深处的农家房舍和开在大路旁边的伙铺。这里，在榕树下面，可怜的苦力放下他们令人劳累的担子在那里休息。还是在莱茵河流域，宽阔的平原在夕阳西下时一片金黄，莱茵河流域和莱茵河，一条银色的带子从那中间流过，还有远处伏姆斯[①]的宝塔，就是这伟大的原野，使我年轻的眼睛感到舒适。当时，我是海德堡的一个学生，在这古老城市上头的冷杉覆盖的山中走了漫长一段路之后，我来到林中的空旷地上。在这里我第一次有意识地感到美；在这里我第一次热烈追求知识（每一本我的书是一次非凡的冒险）；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谈话的愉快（啊，这些奇妙的普通事物，每一个青年发现它们时就象前人都没有发现过）；在阳光充足的安拉吉地方的晨间散步，燕麦饼和咖啡，振作了我有节制的青春，最后来一次紧张的行走。闲暇的黄昏在城堡的阳台上，在我眼下的古城的坍圮了的屋顶上，袅袅着似烟的蓝色雾霭；哥德和海涅，贝多芬和华格纳，和（为什么没有？）

①德国西部一城市。

斯特劳斯和他的圆舞曲和屋外花园酒店，乐队演奏着，女孩子们结着黄色的辫子安静地走着。所有这些事物（回忆具有完全求助于感官的力量），对我来说原野这个字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莱茵河流域而不包括任何其他地方；但是快乐的仅有的标志，我知道是日落之时所有金黄色的广阔的展望，有闪光的银色河流流经那里的好象生命之路；或者象理想引导你穿过那里一样，远处的一座灰色的宝塔引导你通向那古代的城市。

失败

一个小人物，粗壮地，戴着一顶象林居人的奇形怪状有大宽边的帽子，一件水手穿的蓝色厚呢短大衣，看去这就象里奇画的海员图一样。他还穿着一条裁剪得人晓得多少年前流行的宽大格子的图案裤，当他取掉帽子，你就可以看见一个蓄着长卷发漂亮的脑袋。虽说他接近六十岁了，头发还只刚转灰色。他的五官端正，穿一件领子大得几码的衬衫，所以整个颈部现得粗壮和塑象差不多。他看起去象一个六十年代悲剧作品中的罗马皇帝，而这种神情由一个旧派演员的深沉的、隆隆的嗓子而被增强了。他的柱墩般的骨架使他现得稍微有点荒唐可笑。你能够想象他用一种加强的语势朗诵雪利顿·诺尔斯① 的没有韵的诗句，去激起楼下正厅的观众以至狂乱，当他用一个过分大的手势向你致意，当他在他的孩子的

①英国剧作家。

死上面纽绞你的心(在1860年时的表演)，你猜得到那洪亮的嗓音将如何颤抖。稍后听他向那中国仆人要"咱的靴子，听差，咱的靴子。"以一个王国调换咱的靴子。"那是辉煌的。他坦白他曾做过演员。

"是或不是，那就是个问题，但咱的家庭，咱的家庭，亲爱的听差，他们会丢脸而死，这样就会使我面对吊索和残酷的命运之箭。"

简而言之，他出门是作为一个职业品茶者来到中国的。但是他来的时候锡兰茶已经取代了中国茶，这样商人不再有可能在几年之内富裕起来。过去挥金如土而来的豪华体面的生活，一但报酬菲薄那一切就不复存在了。然而奋斗变得更为艰难了。终于来了中日之战，同时台湾失守，一切毁灭了。职业试茶者得另外寻找生活途径。他成了一个酒商，一个承包商，一个房地产掮客，一个股票公债经纪人，一个拍卖商。他试尽他炽热的想象所能提供的赚钱方法，但由于港口的繁荣逐渐衰退，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生活面对他是太宽了点儿。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破了产的人的可怜神气；甚至只要有一点什么触及到这方面，他就象一个不服已经人老珠黄的美人，而又要乞求对她自己也不能确信的称赏与崇敬。然而，尽管如此，他有一种安慰：他仍然有宏大的

自信，他知道他是一个失败者，但是这並没有真正影响他，因为他是命运的受害者：他从来没有想起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怀疑的阴影。

戏剧学者

他送进来一张形式和大小都正规的漂亮的名片，繁复地围着黑边，名片上他的姓名底下印着“现代比较文学教授”。他原来是一位年轻人，个儿矮小，有一双小巧、文雅的手，一只比你看见过的一般中国人大的鼻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虽然这天天气暖和，他还穿着一套厚粗花呢西装。他似乎有一点点拘谨。虽说他的嗓子並没有倒，他说话用一种高亢的假声，由于这些尖声的音调，使我不能凭声音弄清和他的谈话里有些什么不真实的感情。他曾在日内瓦和巴黎，柏林和维也纳学习过，他流利地用英语、法语和德语表达自己的意思。

临得他演讲起戏剧来了，近来他用法文写了一篇论中国戏剧文学的作品。他在外国留学，曾将他惊人的热心用在司克利卜[①] 方面，这就是为

①法国剧作家。

更新中国戏剧他所提出的模式。听了他要求戏剧须要使人激动是颇为奇特的。他要剧本优良，布景完美，分幕恰当，情节突兀，戏剧性强烈。中国戏剧，具有它的精心设计的象征手法，是我们经常大声疾呼寻求的戏剧理想，但明显地它也有令人烦厌的单调与呆板。点子不必每一个都出在一个女人被两个情人争夺的滥调上，它们须要新鲜使其开胃，当它们都陈腐了，就会发出如同臭鱼烂虾那样的恶臭。

但另一方面，想起名片上的头衔，我问这位朋友，为了熟悉关于今日文学的倾向，他推荐了什么英文的和法文的书给他的学生们阅读。他踌躇了一下。最后说：

"我真的不知道，你明白，那不是我的专业，我是专门搞戏的；但是如果你感兴趣，我将要我们学校讲授欧洲小说的同事来拜访你。"

我说："对不起。"

他问："你读过《吝啬鬼》吗？我想那在欧洲是自从克利卜以来出现的最好的戏。"

我有礼貌地说："你读过吗？"

"我读过，你知道我们的学生都对社会问题大有兴趣。"

这是我的不幸，我不那么有兴趣。于是我尽我的灵巧把谈话引到中国哲学上去，在这方面我

随意谈了一些东西。我提了庄子。教授哑吧了。

他茫然不知所措地说："他生活在很早时期以前。"

我低声愉快地说："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

他说："我从来不读哲学。但是自然，我们大学有个中国哲学教授，如果你在这方面感兴趣，我一定要他来拜访你。"

同一个卖弄学问的教师争辩是无益的，正如海洋的圣灵（我脑子里有点自命不凡）同江河的圣灵议论一样，我自愿放弃讨论戏剧。我的教授对它的技巧大感兴趣，确实，在这个题目上他似乎自以为准备了一篇复杂和深奥两者俱备的演讲。他问我什么是技巧的秘密，借以讨好我。

我回答说："我只晓得两件事，一个是要有常识，另一个是扣紧要点。"

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沮丧的影子问："那就是说除了写一个剧本别无要求了啰？"

我同意他的说法说："你要有某种诀窍，就象打弹子一样。"

他说："在所有重要的美国大学里，他们都讲授戏剧技巧。"

我回答说："美国人是极其讲究实际的人民，我相信哈佛大学正在设立一个指导祖母吸吮鸡蛋的讲座。"

"我想我没有十分了解你的意思。"

"假如你不能写一个剧本，没有谁能够教会你写；假如你能够写那就象从山上滚落一筒圆木那么容易。"

说到这里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困惑，但是我想他只是因为拿不定主意这种操作方法是应该包括在物理学教授的部门内或应用机械学教授的部门内。

"假如写剧本是这样容易，那么为什么剧作家写个剧本须要花那么长久的时间？"

"你知道，他们不是洛卜·德·韦伽[①]或莎士比亚和上百个其他作家那样著作丰富而又容易。有些现代剧本制作者已是完全缺乏驾御文字能力的人，他们发现把两个句子组合在一起几乎是一种不能克服的困难。一个著名的英国戏剧家有一回给我看他的一份手稿，我看见他写个这样的问题："你的茶里面要放糖吗？"写了五次他才把它写成上面这个样子。一个小说家如果不能没有任何缠夹完整地说出他要说的，他就会要饿死。

"你不能说易卜生是一个缺乏驾驭文字能力的人，他花两年时间写个剧本是大家都知道的。"

这是明显的，易卜生发现了构思情节方面的

---

①西班牙诗人和戏剧家，他一生写了一千八百多部戏剧作品。

巨大困难，他一月复一月猛烈地折磨他的头脑。最后在绝望的情况下用了他从前用过的同一情节。”

“你这是什么意思？”教授喊起来，他的声音提高到一种尖声叫喊的程度。“你说的我一点也不懂。”

“难道你没有注意到易卜生三番五次使用同一情节？好几个人住在关得紧紧的令人窒息的屋子里，于是某一个人(从山里或者从海上)来了，把窗子大大冲开来；使每个人的头脑得到一些凉意，于是幕落。”

我想这样一说正好可以使教授阴沉的脸上会亮出一丝笑意来，但是他皱起眉头凝望着天空有两分钟。于是他站起来，说：

“我脑子里一定要带着那观点再一次仔细阅读易卜生的那些作品。”

他离开之前我没忘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一个认真的戏剧家当他们遇到一个疑难时，要常常打算提出另外一个。我问他，即他怎么考虑看待戏剧文学的将来。我的想法是他会说，碰鬼！他经过考虑后，我又相信他的惊叹必定会是，啊，天啦！但他叹气了，他摇头，他举起了文雅的双手；他成了个泄气的化身。我发现所有有思想的人们考虑到中国戏剧的情况，其焦虑不下于英国所有有思想的人们对这方面的考虑，这确实是一种安慰。

大　班

没有人比他更知道他是一个重要人物。在中国最重要的英国洋行的一个不算最小的重要支行的第一号人物。他逐步通过稳健可靠的能力，把自己树立起来，他用微笑的回顾对着三十年前来中国的羽毛未丰的办事员。当他记起他所来自的朴素的家，那个在巴恩斯郊区一长溜小红房子中的一幢小红房子，那些房子里的人，绝望地力争想以上流社会为目标，但仅仅达到一种无法解脱的忧郁。将那个情境与目前宏伟的石砌大厦，大厦里的游廊和宽敞的房间、一度是洋行的办公处现在是他的住所相比，他情不自禁地暗暗笑了。自那时以来他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当他从学校（他在圣保罗学校读书）回到家里，和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姊妹一起坐下来就餐，各人自己动手，一片冷肉，大量的面包和黄油，茶里放着丰富的牛奶。他想到那杯高级茶，于是他再想到目前自己用晚餐的情况。他总是穿着晚礼服进餐，有时他

一个人有时还有别的人，他预先知道餐桌旁边会有三个听差伺候。他的第一号听差完全知道他爱好什么，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家务管理琐事操过心，但是他经常有汤、鱼、中间小菜、烤肉、甜品和开胃点心的一套正餐，所以假如他要邀请任何人吃饭，即使临到最后一刻都可以不愁菜素的。他喜欢他的伙食，他不懂为什么，当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总比他有个客人的正餐菜肴要差一些。

他确实出了远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他并不关怀回国。他有十年没回英国了，他在日本或温哥华休假，在那里他一定能够碰到从中国海岸去的老朋友。家里的人他一个也不知道。他的姊妹都和她们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人结了婚，她们的丈夫是办事员，他们的儿子也是办事员，他和他们之中没有什么交往，他们厌烦他。他满足于由每个圣诞节送给他们一段好绸料，几块精美的刺绣，或一合子茶叶的亲戚称呼关系。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终他母亲之世，他一直维持她的供应。但是当将来届临他退休的时候，他也不打算回英国，他看见许多人那样做了，他经常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失败。他意想在上海跑马场附近置备一所房子：打桥牌、骑马和打高尔夫球什么的，他期望非常舒适地度过他的晚年生活。但是到他需

要考虑退休之前还富有年华。再过五六年希金斯就要回国了，到那时他就要接替上海总行的职务。当其时他在那里就会非常快乐，现在他可以积钱，到了上海你就做不到了，并且须要有大量时间投入买卖。目前这个地方另有超过上海的优越之处：他是这儿社会上最突出的人物，什么都是他说了算。甚至领事都要注意站在他那正确的一边。有一次一个领事和他争吵，最后被排挤了的倒不是他。大班想起这些枝节小事，他翘起了那爱吵嘴的下巴。

但是他笑了，因为他觉得在一种极好的幽默感之中。他从汇丰银行吃了一顿极好的午餐后走回他的办事处。那里他们招待他很好。菜肴是头等的，有丰富的好酒。起先他喝了两杯鸡尾酒，跟着又喝了几杯顶好的法国白葡萄酒，随后又饮干两玻璃杯葡萄牙的红葡萄酒和几杯上好的陈香白兰地。他觉得舒畅。当他出来时做了对他来说是一件稀罕的事：他步行回来了。他的轿夫和轿子在他背后几码远跟着，倘若他觉得有点东倒西歪就可以钻进轿里来，但是他要舒展他双腿的乐趣。近些时间来他没有得到足够的锻炼。现在他太笨重不适宜骑马了，做那样的锻炼太困难了。但是假如他对骑马感到太笨重，他仍然能够饲养一些马匹，当他在这有香气的空气中溜达，他想

到了春天的赛马会。他有一对新来的白人，他对他们寄予希望，他想把办事处的这两个小伙子中之一训练成为一个优良的骑师（他必须注意不要让他们偷偷摸摸把他搞走了，老希金斯可能在上海那边用一笔钱收买他），他应该赢得两场或三场赛马。他自诩在本城有最好的赛马饲养训练人员。他撅起他宽阔的胸膛象一只鸽子。这是美丽的一天，活着是美好的。

当他走到万国公墓时停止了。它座落在这里清洁而有秩序，这是社团繁盛的一个明显标志。要不是有一点骄傲得发热他从不经过这公墓。他高兴是一个英国人。因为公墓座落的这地点当日选择时是不值钱的，由于城市的富裕而扩大，现在值一大笔钱了。它已被建议把这些坟迁移到另一地点，把这块地卖掉去搞建筑，但是公众的感情反对这样做。这就给大班一种满足的意识，想他们的死者安息在这安全地区的最有价值的地基上。这就显示对有些事情他们看得比钱更为关切。遭雷打的钱！这就涉及到“有一些事情是要紧的”（这是大班最喜爱用的一个警句），好，人应该记住钱并不是一切。

现在他想要信步穿过公墓。他望着那些坟。它们被整洁地保持着，中间的通路上没有野草。这里有一种兴盛的景象。他一路闲逛一边读着墓

碑上的名字。这里是三个一排，三桅船马丽巴克士德号上的船长、大副、二副，1908年在台风中一起遇难。这事情他记得很清楚。那里是两个传教士的一小群，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都是义和拳动乱中被屠杀的。那是一桩骇人听闻的事情！并不是他很重视教会；但，岂有此理，一个人不能让这些该死的中国人屠杀他们呀。于是他来到一个那上面的名字他知道的十字架，爱德华·马洛克，好小伙子，但是他不能负担他的酒账，成天烂醉如泥，可怜的魔鬼，还只二十五岁；大班还知道他们许多人都是那个样。这里有几个更整洁的十字架，上面有名字和年龄，二十五岁，二十六岁或二十七岁，这通常是一些相同的故事：他们出门到中国，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都是好伙子，休息时需要喝酒。他们负担不起酒账，于是就那样他们都在这墓地里了。在中国海岸你必需有一个坚强的头脑和健全的体魄去喝酒，为喝酒而喝酒。自然，那是很令人悲哀的，但是当想起有这么多年轻的伙子们他得在地下喝酒，大班情不自禁地笑了。这里曾经是一个有用的死者，他自己洋行里的伙计，年纪比他大，同时也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假如这家伙还活着，他现在可能就不会当大班了。确实，命运的道路是不能预测的。啊，这里是小特纳女士，紫罗兰特

纳，她是一个标致的小东西，他曾经跟她很有一段暧昧关系，当她一死，他着了魔似的意气消沉。他查看石碑上刻的她的年龄。要是现在她活着，她不是个没有经验的小丫头了。当他想着所有这些死者，一种满足的意识充满他全身。他超越了他们。他们都死了，而他活着，的确，他都占了他们的上风。他把眼睛集中在所有这些稠密的坟墓这一景象上，同时他藐视的笑了。他非常亲密地搓着两只手。

他默默地说："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一个笨汉。"

他有一种温厚的感情，看不起对死者叽哩呱啦。他一路走来，忽然间碰见两个苦力在掘一家坟。他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有听见社团里有任何人死了。

他大声地说："究竟是谁在搞什么？"

两个苦力甚至没有看他一眼，站在墓穴深深的底下继续在搞他们的工作，他们铲起大块的泥土。虽说他在中国这么久，他并不懂得中国人，在他的有生之年，从没想到须要学习这种该死的语言，他用英语问两个苦力他们在掘谁的坟。他们不懂他的话，他们用中国语回答他，而他骂他们为无知的蠢家伙。他知道布隆太太的孩子病了，可能死了，但是他应该听见讲，即算，这也不是

一个孩子的坟，这是一个成人的坟，而且还是个大汉。这是不可思议的。他悔不该走到这公墓里来；他急急忙忙走出去，坐进了他的轿子。他的良好幽默感一点也没有了，而有一种心神不安的不满在他的脸上。这时他已回到办事处，他对他的副手说：

“我说，彼得，你知道有谁死了吗？”

但是彼得根本不知道。大班弄迷惑了。他叫来一个本地办事员，打发他到公墓去问那两个苦力。他开始签署他的文件。办事员回来说，苦力已经走了，那里没有人可问。大班开始觉得有点模模糊糊的烦恼：他不喜欢碰到那件事情他没弄清楚。他自己的听差可能知道，听差常常知道每一件事，于是他打发人去叫他，但是这个听差也没有听见社团里死了谁。

大班烦躁地说："我知道没有谁死，但是坟为谁挖的呀？"

他叫听差到公墓守护人那里去，同时找出来是什么鬼没有人死的时候他要掘个坟。

“等我喝杯威士忌加苏打你再走。”他补充说，于是听差离开了房间。

他不知道为什么坟墓的景象使他不舒服。但是试图不去想他。当他喝了一杯威士忌他觉得好过一些，于是他结束了他的工作。他走上楼去翻

阅《笨拙》[1] 杂志。几分钟之内他要到俱乐部去吃中饭并在饭前玩一两局桥牌。但是要松弛他的脑筋去听听差回来说什么，同时他等他回转。过不久听差带了公墓守护人回来了。

他直截了当地问公墓守护人，“没有死人，为什么你要掘一个坟？”

“我不掘坟，”守护人用洋泾浜英语说。

“那你是搞的什么鬼把戏？今天下午那里有两个苦力掘一个坟。”

这两个中国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于是听差说他们两个曾一起到公墓里看过。那里没有新坟。”

大班仅只能控制自己不作声。

“该死，我亲眼看见呀。”这句话他差一点说出了嘴。

但是他没说他们什么。他一副脸通红，好象他要生吞下他们。两个中国人望着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有一阵子，他呼吸不出气来。

“好，出去。”他喘吁吁地说。

但是当他们刚一走，他又大喊要那听差，而当他来了，又疯疯癫癫地麻木不仁，他叫他拿点威士忌来。他用手帕擦干淌汗的脸。当他举杯到

[1] 伦敦出版的著名幽默杂志。

唇边的时候手直打哆嗦。随怎么样说，但是他看见那坟。哎呀，他仍然能够听见当两个苦力铲起一满铲土抛在他们头上地面的那笨重的嗵的一声。这是什么道理呢？他能够感到自己心脏在扑腾。他觉得异常的不自在。但是他控制住自己。这都是在胡闹。假如那里没有坟，那必定是一种幻觉。他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到俱乐部去，同时如果偶然碰见大夫，将请他给他察看察看。

每一个在俱乐部的人看去就和平常一个样。他不懂为什么他很希望能看去和平常不同。那就是一种安慰，这些人，若干年来互相在一起，有条有理过着规则生活，有的已经养成一些小的特性；他们中的一个，当玩桥牌时，不停地发出哼哼的声音，另外一个，一定要通过一根麦管喝啤酒，而这些习惯常常那样使得大班烦躁，现在却给他一种安全的感觉。他需要它，因为他不能从他曾经看见那奇怪景象的头脑自拔；他桥牌打得很坏；他的搭挡吹毛求疵，他就发脾气。他想那个人会古怪地望着他。他惊奇别人会看着他怎么不象往常一样。

忽然间他觉得他不能忍受停留在俱乐部里了。当他走出来时，他看见大夫正在阅览室里读《泰晤士报》，但是他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启齿。他要亲自去看看那坟是否确实在那里，于是，坐上

他的轿子，他吩咐轿夫抬他到公墓去。你不可能有第二次幻觉，能有吗？此外，他将带着守护人一起，如果坟不在那里他会看不见，但是如果它在那里，他将给守护人以他从来没有发作过的一顿痛打。但是守护人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带着钥匙出去了。当大班发现他不能进入公墓，他忽然间觉得筋疲力尽了。他回到轿子里面，吩咐轿夫抬他回家。吃饭前他得躺半点钟。他十分疲倦了。当他的听差进来给他摆出衣服去吃饭，那仅仅是由于一种意志的努力他才起来了。那天傍晚他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不愿穿礼服，但是他反抗它；他形成了一种规则每个黄昏必穿晚礼服进餐已经有二十年了，他这规矩永远也不能打破。但是他在正餐上照例命令用一瓶香槟觉得使他更感舒适。后来，他叫听差给他拿一瓶最好的白兰地来。当他喝了两玻璃杯这种酒，他觉得精神恢复了。让幻觉见鬼去吧！他走进弹子房练习几杆很难的打法。当他的眼睛是这样确定，那对他就不算一回事了。当他上床立即沉入酣甜的睡乡。

但是忽然间他醒了。他梦见了那敞开的坟，两个苦力从容不迫地掘着。他确定他曾看见他们。当他用他自己的眼睛看见他们还说是一种幻觉，那是荒谬的。于是他听见更夫巡逻敲梆的笃笃声。声音撕破夜的沉寂是这么刺耳，那吓得他

毛发直竖。然后恐惧攫住了他。他觉得有一种对弯曲磐旋之物的恐惧，人口众多的中国城市的街道，那里有些鬼东西，于是恐怖那些庙宇的弯曲的屋顶和它们那里面的魔鬼的怪相和折磨拷打。他憎恶那些袭进他鼻孔的气味。憎恶这里的人民。那些无数的穿着蓝衣的苦力和商人们、地方官吏的圆滑的笑和不可思议的穿着他们的黑长袍。他们似乎都用恐吓压迫着他。他恨中国这个国家，当初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他现在是惊慌失措了。他一定要出去。他不能在这里再停留一年了，再停留一个月了。上海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啊，我的上帝，"他喊着，"我只要能安全回到英国就好了。"

他要回国。假如他要死也要死在英国。他不能忍受埋在所有这些有着斜眼睛，和露齿而笑的脸的黄色人中间。他要埋葬在本国，不葬在那天他看见过的那些坟中间。他不能安息在这里，永远不能。管他什么人民的思想有什么关系？让他们想他们喜欢的什么去。唯一有关系的事情是一有机会就走。

他走下床来，于是写信给洋行的头头说，他发现自己病情危险，他必须调动地方。纵使工作绝对必需他也不能再停留下去。他必要马上回国。

早上他们发现这封信紧紧抓在大班的手里。他已经滑落在桌子和椅子中间的地上。他完全断气了。

报 应

虽说他远谈不上穿得阔气，却是体面的。他头戴青缎瓜皮小帽，脚穿黑缎鞋，身着嘉定出产的灰绿起花缎袍，外罩黑马褂。他是一个中年人，蓄着一把长的中国式的连鬓白胡须。他的团团大脸上，从眉心起攒聚着不少皱纹，他的大的角质眼镜不能掩蔽他眼睛里的友善的光芒。他有一种古画上面那种隐士高人的形象，独坐幽篁里，脚底下一座巨大岩石山，沉思默想着永恒之路。但是现在他的脸上现出无穷烦恼的表情，慈眉善目也蹙起来了，他正忙于一种异常的工作（象他这样外表的人物）牵着一只黑色的小猪沿着两边都是灌满水的稻田的人行道上行走．小猪突然猛地一窜，用出乎意料的闪躲，四面八方到处乱窜，就是不到老先生要它走的路上来。他死死扪着吊猪的绳子，但是猪发出长声尖叫，不听指挥。他对猪讲好话和咒骂，这时小猪两只前脚支撑，用后腿坐下来，同时用怨恨的眼睛望着他。通过这情

景，于是我想起在唐朝有一位曾经是术士的老先生。他按照术士的意愿，硬叫真实合乎他叫做法术的狂想变幻戏法。在他懂得了许多现实存在之后，由于他曾经踩蹦践踏过真实，现在正轮到他以受苦来赎抵他的罪孽。

残 片

当我在中国旅行，中国人的装饰热情确实使你惊奇。你不但惊讶在纪念牌坊或者庙宇上能找到装饰（这种地方找到它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十分自然地在家具上也能找到它。发现它在普通家用 物 件 上 面，固然使你欣喜，但不使你感到意外。锡镴壶用优雅的设计而增美；苦力的饭碗虽有它粗糙的一面，但也雅致地装饰着。你可能设想中国的手艺人不刻线施色把一个物件表面的简单打破不认为他的工作是完全的。在一张用作包装的纸上，也要印上阿拉伯式的图案。但是当你看见一个铺店木制门面上的精美装饰，杰出的雕花，贴金或浮雕漆金的漆作，精致的柜台，精雕细镂的招牌，更是出乎意料。这种壮丽豪华或许有广告的用途，但是这样做也是要使过路人或进店来的顾客得到讲究的欢悦，同时铺店的商人也同样得到愉快。当他坐在店门口，吸着水烟，通过他大的角质眼镜读着一张报纸，眼睛有时也会

用善良的幽默感停留在这种奇装异饰上面。如在柜台上摆一个长颈花瓶，里面插一株单独的麝香石竹。

在穷乡僻壤的村子里在装饰华美方面你也找到同样的欣喜，在那里一张门的呆笨由一块可爱的雕刻缓和了，同时窗子的格状结构，形成一种繁复的优美花式。你难得过一次桥，不管在怎样行人稀少的地区，在那上面无不看见一个艺术家的匠心。桥基的石头砌得象错综变幻的花饰，同时似乎这些非凡的人民曾经用审慎的眼光评定过，是用一座平铺直搭的桥或者还是用一座弯曲拱形的桥才会与周围的景物更相配合。栏杆上被饰以狮子或盘龙。我记得有座桥它之架在那里与其说是有任何适用的目的，毋宁说它纯粹是为了美丽的愉快而设，它的宽度足够过一辆四轮马车，同时两辆也能在桥上对过，它仅仅是为连接从一个破烂的村子到另一个同类型村子之间的一条狭窄小路而服务的。这儿离开最近的城市都有三十英里，宽阔的河流，在这个地点狭窄起来，流经两座绿色的小山中间，胡桃树林生长在岸上。桥没有栏杆，它是由一些巨块的花岗石平板构造的。花岗石分别安放在五个桥墩上面，中间那个桥墩由一条奇形异状的大龙组成，有一边拖着一条多鳞的尾巴。在两侧靠外边搭的平板条石上，

整个都凿着很浅的意想不到的玲珑剔透和精致优美的浮雕花饰。

但是虽说中国人用了如此关切的辛苦去避免疲劳你的眼睛，用地道的趣味制成持久的精心制作的装饰用以去和朴实的外表对比，到最后厌倦征服了你。他们的丰富把你弄迷糊了。你不能否认对这种匠心独运的欣佩，他们费尽变化多端的意匠，好象要给你以无穷幻想的印象，但是事实是明显的，他们的主意也是有限的。可以说中国的艺术家好象一个胡琴师，就凭单一的曲调能奏出无穷的变化来。

现在，我遇上一名法国医生，他已经在这城里开业若干年了，在这里我也发现了自己。他是一个瓷器、青铜器和刺绣的收藏家。他让我看他的收藏品。它们都是美丽的，但是却是一些琐碎单调的东西。忽然我发现一个半身雕塑的残片。

我带着惊奇说："这是希腊的。"

"你这样想吗？我高兴听见你这句话。"

头和两臂都没有了。塑像是恰好从腰部以上破损的，但是还有一块胸铠，那中间有一个太阳，是柏修斯[1]杀龙的雕塑。这是一块没有大的重要性的残片，但它是希腊的。或许因为我被过度的

[1]希腊神话，柏修斯是杀死蛇发女怪美杜莎的英雄。

中国的美异常地影响了自己吧，对这我开口就有熟悉的语言，这使我心里安贴。我用喜悦把手在它的年岁腐蚀了的表面摸抚，使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象一个在回归线海上漂泊的水手，已经熟悉了珊瑚岛的懒散的明媚和东方城市的辉煌壮丽，但是发现自己又一次在一个英吉利海峡港口的破烂的小巷里。那里是寒冷、阴暗和肮脏的，但那里是英国。

医生是一个矮小而秃顶的人，有一双闪亮的眼睛和容易激动的态度，他擦着双手。

“你知道那是在离这里三十英里以内的、西藏的边界那边发现的吗？”

“发现！”我喊起来。“在哪里发现？”

“我的上帝，在地底下。它已经被埋了两千年了。他们除发现了这个，另外还有好几个残片和一两个完整的塑像。我相信仅仅这个保存下来了，其他的都被弄破碎了。”

这是很难相信的，希腊塑像会在这遥远偏僻的地点发现。我问：

“但是你如何解释？”

他说：“确实，我想这是亚历山大[1]的雕像。”

于是一阵激动。可能这是不是马其顿的一个

①马其顿王。

指挥官远征进入印度后，在西藏的山脉的阴影下找到一条进入中国这个神秘角的路？医生还把满族的衣服给我看，但是我对它们不大关心。医生向东方穿透这么远去寻找一个王国是如何大胆的冒险活动啊？在这里他已经为阿芙罗狄蒂[①]建了一个庙，也为狄俄尼索斯[②]建了一个庙，同时剧院的演员们歌唱安提戈涅[③]，而在他的那些收藏厅室里古代的唱游唱诗人背诵《奥德赛》。同时他和他的人听着几乎觉得他们就是老水手同类的人和他的追随者。那变脏了的大理石的残片的召唤多么宏伟，附丽着怎样的寓言故事般的冒险活动啊！这王国持续了多么久，怎样的悲剧标志着它的陷落啊？啊，幸好我没能察看那些西藏旗帜或者青瓷杯子，因为我看见巴台农神庙[④]，严肃而可爱，此外，还有晴明的爱琴海。

---

①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相当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
②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③希腊神话奥狄浦斯的女儿，曾不顾敌人禁令为战死的哥哥营葬。
④祭雅典娜的神庙，于希腊雅典。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

盖世无双

我永远不能记住他的名字，但是每当这港市说起他时总被描述为盖世无双。他或许是五十岁的了，瘦而颇高，一身干净利索，衣冠楚楚，有一个小而清秀的脑袋和机灵的面貌。他的蓝色的眼睛在他夹鼻眼镜后面现出来的是天性善良和诙谐快活。他是属于愉快气质的人，加上他爱开玩笑的习性，这不是不起作用的。他能够制造有关社团的任何成员、包括那些偶然没有在场的人的某种笑料，使得站在俱乐部酒吧间的人发出由衷的欢笑，他可能是想令人愉快地蓄意制造的，但是不怀恶意。他的幽默是和音乐喜剧里面的喜剧演员同一性质的。当他们说到他时总是说：

"你知道，我奇怪为什么他从来不上舞台。盖世无双。他一定会造成轰动。"

他随时准备和你一起喝酒，不一会你的玻璃杯空了，于是他飞快地用一个中国成语：

"劝君更进一杯酒。"

但是他从不过量多喝。他们说：

“啊，盖世无双真地弄得那个人的头在肩膀上打转转了。”

当为了某几个慈善的目的募捐凑钱，常常能够指望他和任何其他人出得一样多，但不会多出。同时他经常准备和你去进行一场高尔夫球竞争或打一盘弹子比赛。他是一个单身汉。他说：

“住在中国结婚对人没有用处，每个夏天他必须送他妻子走，然后当对小崽子开始发生兴趣的时候，他们又必须回国了。那要花费你极大一笔钱，你从那中间却得不到什么。”

但是他常常愿意为社团的任何妇女效劳。他是怡和公司的领袖，经常有权使自己发挥作用。他在中国已经三十年了，为自己不会说一句中国话而自豪。他从不到中国的城里去。他的买办是中国人，几个办事员也是的，自然还有他的听差和抬轿子的苦力。这是他与之打交道的仅有的中国人，而这已十分够了。他说：

“我恨这国家，我恨这人民，当我积足了钱就打算远走高飞。”

他笑了。

“你知道吗，上次我回国后，我发现每个人吹中国平底帆船、图画、瓷器和呢绒。我对他们说，只莫对我讲中国。我这一辈子永远也不要看见

任何中国的东西。”

他转对我说：

“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在我的屋子里没有弄一样中国东西。”

但是假如你要他对你讲关于伦敦，他就准备按点钟告诉你。他知道所有的演过二十年之久和在九千英里距离之外的音乐喜剧，他能够仿效丽丽埃尔西女士和埃尔西珍妮斯女士的做功。他会弹钢琴，他有一条令人喜欢的嗓子；需要一点点说服力去诱导他坐下来给你唱他上次在国内听过的流行小调。对这个灰头发的深不可测的轻浮的人，我是坚持异议的，甚至还觉得他有点怪模怪样。但是当他唱完了的时候，人们热烈地为他鼓掌。他们说：

“他是无价之宝，不是吗？啊，盖世无双。”

老 水 手

船长大都是些很呆板的人，三句话不离运输和货物。他们对所到过港口的所见所闻，不外乎经纪人的办事处，和他们那类人常去的酒吧间和妓院而已。他们欠缺由于未出过海的人对海的想象投于他们身上的那种罗曼司的魅力。海对他们不过是去谋生的手段，他们之熟悉海正如火车司机从枯燥的实际操作中明瞭他的机车一样。他们都是男子汉，眼界狭狭的工人，绝大部分只受过微不足道的教育和略具文化知识。他们全都一个样，既不明敏，也缺乏想象力。直来直往，有胆量、诚实可靠，和明显地在墨守成规方面斷四方眼。同时他们都有局限性：他们之被置于其周围事物之中，象目的物之在立体照片上一样，所以你似乎可以看见他们周围的一切。他们用沉默的品质把自己呈现给你。

但是没有谁比布芝船长更远离胶柱鼓瑟这一类型了。他是长江上游一艘中国小轮船上的船

主，因为我是他唯一的乘客，在相互陪伴之间我们在一起消费了不少时间。虽然他言语流利，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并且我象影子一样盯着他，而他还是不清楚地留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这是因为他的躲躲闪闪用去了我的想象力。但在他的表面上肯定没有什么难以捉摸的东西。他是个个头高大的人，六英尺二寸高，魁梧其伟，五官粗大，有一张红而友善的脸。当他笑的时候，露出一排漂亮的金牙。他头很秃，脸刮得干干净净，但是他有一对我从未见过的极为浓密、宽大、爱寻衅的眉毛和它们下面的温和的蓝色眼睛。他是荷兰人，虽然他八岁就离开了荷兰，他说话仍然用一种重音。他不能发“th”音，常常把它们弄成了“d”音。他的父亲是一个渔人，驶着自己的纵帆船在南方的海上捕鱼，听见纽芬兰那儿的捕鱼情况好，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儿子横渡辽阔的大西洋。几年之后就这样到了哈得逊湾，所有这些几乎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他们过合恩角[①]到了倍林海峡。他们猎取海豹，直到法律干涉要拯救这种濒临灭绝的兽类为止。布芝这时已成为一个汉子，而且是勇敢的一个，天晓得，先是三副，后来又作二副，在帆船上到处航行。他几乎

①在南美洲最南端。

整个一生都张帆航海，而现在在一艘轮船上，不能使自己回国。

他说："还是在一艘帆船上才安逸，在轮船上你根本就不舒服。"

跟着在寻找硝酸盐热后面他曾沿着南美洲海岸兜了一圈，然后到了非洲西部海岸，再以后，离开缅因海岸去捕鳕鱼，到了非洲。而在这以后随鹹鱼货船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一个在马尼拉小旅馆的熟人建议他不妨到中国海关去试试。他到了香港，在那里当了一名海关巡检员。不久被任命为一艘汽艇的指挥。他花了三年时间，追逐鸦片走私船，然后，存了一点钱，自己建造了一艘四十五吨的纵帆船，他驾驶了这艘船决定到倍林海峡去再次试试猎捕海豹的运气。他说：

"但是我猜想我船上的人受了惊恐，当我到了上海他们开小差了，我又找不到另外的人，所以我只得卖掉这艘船，然后我乘上一艘到温哥华去的船。"

他这才第一次离开了海，他遇见一个推销专利草叉的人，就这样同意围着这个州推销。对于一个水手来说这是一个古怪的职业，也不是一个成功的职业。因为在盐湖城的雇用他的公司破了产，他发现自己束手无策了，由于莫明其妙地或因为其他原因他回到了温哥华。他本来是打主意

在岸上找生活的，他最后找了和一个房地产经纪人一起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带购买土地的人到他们的小块地皮上去看，假如他们不满意，说服他们不要翻悔交易。

"我们卖给一个家伙一座在山坡上的农场，"他说着，他的眼睛在回忆中眨着，"山坡是那么陡峭，致使农场养的鸡一只腿子比另一只长一些。"

五年之后，他有了最好还是回中国的想法。他没有困难就找了一个职业，作为一艘向西航行的船上的船员，很快他又重操旧业了。从那以来他在中国大部分航线上搞过，从海参崴到上海，从厦门到马尼拉，还在这个国家所有那些大江上工作过。现在在轮船上，从二副升为大副，最后，在属于中国自己所有的船上当船长。他自愿地谈到他将来的计划。他呆在中国够长的了，他渴望以后在大拉则河[①]上的农庄中工作。他将自己造一只小船，搞一点捕鱼，鲑鱼和比目鱼。他说：

"我曾出海五十三年，这就是我定居的时候了，我有点惊奇为什么我还要搞一点造船，我不是钉住一件事唠唠叨叨讲个不歇的人。"

他是对的，他这种无休止的调动本身就变成

①位于加拿大西南境。

了一种性格上好奇的优柔寡断，由于他身上有某种流动的东西，所以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去掌握他。他留给你一张日本版画上的雾和雨那样的景象，那上面的构思，虽然已明显地暗示了，但还没有被你发觉。他有一种特别的温文有礼，有某些东西是在粗鲁的、老练的老水手那里期望不到的。

他说："我不想冒犯任何人，待人家客气一点，这就是我要做的。假如人家不按照你的要求做，对他们好好讲，说服他们。用不着发脾气。对什么都要用好言相劝。"

这是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不常发现被用在中国人身上。我想不到这次答案倒很好，那是因为发生某种困难之后，他挥着手对船舱里走，说：

"我对他们没办法，他们不讲道理。"

然后他的温和看去倒很象软弱，但是他并不愚蠢。他有一种幽默感。在一般场合下我们的船吃水超过七英尺，而这河流来到它最浅的地带，河床裸露，航道危险，以至要船货部分卸载驳滩，否则港务长不把证件退还给我们。这是这条船的最后旅程，它运的是几天路程以外的下游军需站的付款。这儿的军事司令官拒绝让这艘船起航，除非把现银卸下。

布芝船长对港务长说："我打算照你告诉我的

做。”

港务长回答:“不到我看见船上吃水标尺露出水面到五英尺，你休想拿到你的证件。”

“我将告诉买办把那银子拿出一些来。”

他带了港务长上岸到海关的俱乐部，在这里的事办理完善之前，他和他站在那里喝酒。他和他喝了四个钟头，当他回船上来时，他走得和去时一样稳定，但是港务长喝醉了。

船长说:“啊，我看见他们把船弄掉了两英尺吃水，这可行了。”

港务长望着船头旁边的数字，确确实实五英尺的标记在水面界线上。他说:

“可以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船长说:“我的确要走了。”

没有一磅货物被移动了。只是一个精明的中国人整齐地重新漆过了标尺上的数字。

但是过了些时候，叛乱的兵士集团企图打我们所运银圆的主意，寻找办法防止我们从这江边城市开走。他表现出值得称道的坚定，他的相当稳定的脾气被考验了，他说:

“没有哪个能够要我停在我不需要停泊的地方。我是这船的船主，我是下这一命令的人。我要走了。”

吓得发抖的买办说，假如我们试图开船军队

就会开枪。一个官员发出了一声命令，于是兵士们跪下一条腿，把他们的步枪向船瞄准。布芝船长望着他们。

他说："拉下防弹掩蔽物，我对你们说我要走了。中国军队可以滚他们的蛋了。"

他下令启锚，在这同时军官就下命令开枪。船长布芝站在他的船桥上，象一尊有几分怪诞的塑像，因为他穿着针织紧身上衣，加上他那张红色的脸和粗壮的身躯，看上去就象那些你看见倚在格利斯比[1]船坞的古式渔夫的形象，他摇了铃子。我们在步枪子弹雨般射来之下把船慢慢开走。

[1]英格兰东部之一渔港。

疑　问

他们把我带到庙里去。庙座落在一个小山坡上，后面围绕半圈黄褐色的山，展现着它本身外形上的宏伟壮观。他们向我指出，这是用了如何优美艺术的系列建筑爬满山坡直到引你达到最后的大建筑物的。一块白色宝贵大理石被树团团围绕，因为中国的设计师追求他们的创造成为对自然的一种装饰，于是用了风景中的意外事物来完成他的装饰计划。他们向我指出这些树栽得如何巧妙，以与门口的大理石形成对比，在这里它给人以惬意的荫影，而对那边又起着背景的作用。他们使我注意到那些巨大屋顶的令人赞美的比例，一个在另一个的那边耸立，上面有着丰富多采优雅的花饰。他们指给我看那些各样色泽的黄瓦，这样人的感觉就不会被普遍同一颜色所滞闷，而能收到色调精巧变化的娱人和痛快的效果。他们指给我看门口精心制作的雕镂如何和一块没有装装饰的表面相对比，所以这样眼睛才不

至于疲劳。当我们走过讲究的庭院，所有他们指给我看的是奇迹般优美的飞桥，庙宇里各处薰黑了的各种姿态的神奇的菩萨，但是当我问他们，构成建造所有这些建筑群的精神状态是什么，他们不能回答。

汉 学 家

他是一个高个子，颇为肥胖，大概没有足够的锻炼而肌肉松弛，有一张红润的胡子刮得干净的宽阔的脸和灰色头发。他讲话非常快，处于神经质状态，声音不十分够大得和他的身躯相称。他住在城门外面庙里的一间待客房间里。三个和尚，带着一个小徒弟照管庙宇并执行宗教仪式。房间里有少数中国家具和大量书籍，但是不舒适。房子清冷，不用说在这里学习研究，我们坐在里面都嫌由煤油炉子发出的热量不够暖和。

他比任何在中国的外国人懂得更多的中文。他已经在一本字典上用功十年，接替一个著名学者花了四分之一世纪时间搞的他本人并不喜欢的事业。这就使他获得汉学研究的好处，和私怀不怿的满足。他完全有一个西班牙贵族的那种风度，你觉得结局他将是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最后确实他也会如愿以偿。他比大多数汉学家有较宽广的修养和可能懂得中国人，对这一点你必须

寄予信任。但是他，可悲地明显也是什么都不懂，他的关于中国思想和文学的谈话，有一种丰富和变化的论断，这些是你在语言学者中间找不到的。因为他把自己浸沉在他特别追求的东西上，一点也不关心竞赛和射猎，欧洲人认为他怪诞，他们用怀疑和惧怕的眼光看待他，人总是注意那些不和自己意趣相投的人的。他们提出他心智不完全健全，有的指责他抽鸦片。这常常是被用来反对为了寻求使自己通晓某种文化，花去了他大半辈子生涯的白种人的指控。你仅仅在那房间里消费了小小一点时间，就赤裸裸地以极其普通的奢求去理解过着这样全部精神生活的人是不够的。

但这是一种专门化的生活。艺术和美似乎没有触及他，当我听了他那富有同情心地谈到中国的诗人们时，我不免自问要是最好的东西没有从他手指缝中间溜掉就好。这里就是这样一个人，仅仅通过印刷的纸面上去接触现实。荷花的悲剧的光辉感动了他，仅仅是当它的可爱被沉吟在李白的诗中：娴静的中国少女的笑激动了他的血液，只不过是由有感于一首精雕细琢的尽善尽美的绝句而已。

副 领 事

轿夫把他的轿子放落在衙门里，为了防止他淋到倾盆大雨没有解开轿帘。他把头伸出来，象一只鸟从它窝里向外张望一样，然后就伸出他长而瘦的身子，最后是他的瘦而长的双腿。他站了一会，好象他还没有十分拿定主意去做什么。他是个很年轻的人，他的瘦长的四肢和它们的笨拙难看，不知怎么地增加了他乳臭未干的神气。他的圆脸（他的头对他身体的长度来说看去太小了），加上它新鲜的肤色显得十分孩子气，他的令人愉快的棕色眼睛是机灵和公正的。他所作的官位职重要的意识（他不久前还不过是一个译员学生），与他还带有乡土气的羞怯奋斗着。他把名片给了法官的秘书，就由他带到了一个里面的法庭请他坐下。天气寒冷而这里又有穿堂风，副领事高兴他穿了厚雨衣。一个穿着破旧衣服的侍者拿来了茶和香烟。秘书是一个瘦弱的青年，穿着一件很旧的黑长袍，曾经是哈佛大学的学生，高兴

卖弄他流利的英语。

法官走进来了，副领事站起来。法官是一位肥胖的先生，穿着一身厚棉衣，有一张大而带笑的脸，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他们坐下来呷茶，抽美国香烟。他们和蔼可亲地闲聊着。法官不能说英语，但是副领事的中国话在他的脑子里也是新鲜的，他不得不想到能不能可信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现在一个侍者出现了，对法官说了几句什么，于是法官非常礼貌地问副领事，今天请他来的这件事他是否准备好了。外面法庭的门敞开着，法官走进去，坐在桌子后面的一张大椅子上，桌子就摆在有梯级的台子上面。现在他不笑了。他已本能地伪装成庄重以使他的职责合乎体统，尽管他过度肥胖，他走路时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尊贵。副领事服从一个有礼貌的手势，坐在法官旁边的位子上。秘书站在桌子的档头。这时外面的门大大敞开来（这对副领事来说，打开一张门没有比这更具戏剧性的了），飞快地，用一种令人奇怪的慌忙，犯人被带进来了。他走到庭院的中间，面对法官沉静地站下来。他的两边各走着一个穿卡其布衣服的兵士。他是一个年轻人，副领事想他不会比自己更大。他仅仅穿一条棉裤和一件棉背褡。它们褪了色，但还干净。他敞着头，赤着脚，看起去，与你每天经过城里拥

挤的街道上看见的，穿着单调蓝色衣服的千千万万的苦力中的任何一个没有区别。法官和犯人沉默地彼此脸对着脸。副领事望着罪人的脸，于是他马上低头望着底下；他不想看那种是这样明摆着的事实。他忽然觉得很窘。而望着底下他注意到这人的脚好小，形状美好而纤弱；他的双手绑在背后。他长得苗条，中等高度，一个柔弱的动物，这就使人联想到对不驯服的野兽会怎样。他站在这样一双漂亮的脚上，在他的站立姿态上有一种特有的优美感。这时副领事的眼睛不情愿地回到望着那椭圆形的，光滑没有皱纹的脸上。脸是被打伤的青黑色的。副领事经常读过那些脸恐吓得发青的文字，他曾想那不过是一种空想的措词，而在这里他看见了它。它使他大吃一惊。它使他觉得羞愧。同时在眼睛上也是一样的，中国人的眼睛并不是常常被错误地想象的那样，他的眼睛不是斜的，而是平直的，那双眼似乎不自然地大和明亮，盯着法官的一举一动，看去是一种令人害怕的恐惧。法官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审问和判决都搞过了，那天上午他被带到那里的目的仅仅是为了验明正身），他勇敢地用一种响亮清楚的声音回答。不管怎样他的躯体可能出卖了他，他仍然是他意志的主人。法官宣布了一个简短的命令，于是，在立于两侧兵士的挟持下，那个人

走出去了。法官和副领事站起来走到门口，那里有他们的轿子等着。这儿站着犯人和看守他的警卫。尽管他绑着双手，他却抽一根纸烟。一小队小兵已经掩蔽在伸出的屋檐下面，法官一出现主管的军官就让他们排列整齐。法官和领事坐上他们的轿子。军官一声令下，方形队伍正步开出，在他后面两码远走着这个犯人。跟着就是坐在轿子里的法官，最后是副领事。

他们很快走过忙碌的街道，守店铺的给这行列以没有好奇心的望着。风吹得很冷，雨连绵地下着。犯人穿的棉背褡必定湿透了。他用一种坚定的步伐走着，头高高抬起，几乎是洋洋得意的。从法官的衙门到城墙有一段距离，出城去他们要走将近半点钟。他们来到城门，出了城。四个穿破旧蓝衣服的（他们看去象农民）靠着城墙站着，旁边放着一口蹩脚的棺材，粗糙地砍斫而成，没有漆漆。当犯人过身的时候他看了它一眼。法官和副领事从轿子里出来，军官喊兵士立定。稻田在城墙外开始伸展。犯人被带到两条小路中间的一小块地面上，叫他跪下。但是那军官认为这地点不适宜，他又叫他站起来走了一两码远重新跪下。一个兵士从队里走出来，在囚犯背后拣好离他三英尺远的位置他举起了枪。军官发出一声命令，他开枪了。犯人向前倒下，痉挛地

略微抽动了一下。军官走上前去，看他还没有十分死，又向那躯体补了两粒左轮子弹。他再一次把兵士的队形整好。法官对副领事一笑，这一笑痛苦地弄歪了那肥胖的性情好的脸。

他们坐进了各自的轿子。但是在城门门前他们的路要分开了，法官躬身向领事告别。领事通过街道被抬回领事馆，街上行人稠密，弯弯曲曲的，在那里生活恰如平常一样正在进行。当时他飞快地向前走着，因为领事馆的轿夫都是好伙计，由于他们不断地喊着让路，使他的脑子有一点点分心，他想着意地使一条生命终结是如何可怕：这好象是一种负有巨大责任的摧毁，其结果是毁灭了数不清的世代。人类的种族已经存在这样长久，这里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作为超自然事件的无穷连续的结果。但在这同时，他困惑了，他有一种生命微不足道的感觉。多一个或少一个是这样无关宏旨。但是恰好当他到达领事馆时，他看了一下表，他一点也不觉得有这样晚了，他吩咐轿夫抬他到俱乐部去。这是到了喝一杯鸡尾酒的时候，老天爷在上，他要能和一个人喝才好。当他进酒吧间时，有十一二个人站在那里。他们知道那天上午他干了什么差使。

他们说："呃，你看见那家伙枪毙了喽？"

"可以打赌我看见。"他用响亮的漫不经心的

声音回答。

“一切进行顺利？”

“他不过蠕动了一下。”他转对酒吧间侍者：“约翰，照往常一样。”

山　城

他们说在这里“蜀犬吠日”。这是一座灰色、阴暗的城市，笼罩在雾霭中间，因为它座落在崖石上面。这里有两条江汇合，所以它每边都被水冲洗，但是有一边是被混浊的急流冲刷。崖石象古代单层甲板大帆船的船头，这船似乎有如为一个奇怪的非自然的生命所拥有，竭尽全力地颤抖；它好象永远在一点上向喧腾的江流中稳步前进。崎岖的山脉把这城市团团围住。

在城墙外面，泥脏水湿的房屋成堆的建在一起。在这里，当江水比较浅，一些碰运气的居民就住在这里靠船家的需要营生。因为在崖石脚下有上千艘帆船停泊，它们挤进档来，这艘挨那艘紧紧联结在一起，于是住在这里人们也有着所有江上的骚动生活。一条险峻的弯曲的梯级引导到一张巨大的门，门旁有一座庙宇守护。整天与水有关的苦力挑着湿淋淋的水桶上上下下，由于他们的溅泼，这石级和从门那里开始的街道象大

雨过后一样潮湿。这里很难走上几分钟的平地，就会遇上有意大利里维埃拉[①]山城那样众多的梯级。因为地方是这样小，那些街道都挤在一堆，窄狭而又黑暗，它们连续不断地盘旋，所以你要找你的路好象在迷宫里摸索它一样。壅塞的人群，就象伦敦剧院散戏后人行道上壅塞的人群那么密集。你须得在那中间挤出你通行的路来，梯级的旁边时刻有轿子过身，有苦力们挑着无穷无尽的担子。巡游的叫卖者，售卖几乎任何人要买的任何东西，当你过身的时候，拥挤推撞着你。

铺店都没有门窗，门面对街大大敞开，它们也都是拥挤的。它们象一个各种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的展览会，你可能看见一条街看去如何象中世纪英国的街，当时每个城市都必须生产它所需要的各种东西。不同的行业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所以你要通过一条屠夫的街，在那里动物的躯体和内脏血淋淋地挂在两边，一些苍蝇嗡嗡叫地围着它们，癞皮狗在那底下饥饿地四处觅食；你要经过那里每个屋子里有手推织布机的街，他们都忙于织棉布和绸缎。这里有数不清的吃食店子，从那里面飘出各种浓厚的气味，在这条街上整天人们

①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旅游胜地。

都在吃着。通常在一个转角，你会看见几家茶馆，在这里从早到晚桌子旁围满了人喝着各种茶和抽着烟。剃头匠们在众目睽睽下兜揽他的生意，你会看见人们忍耐地靠在他们的扶手椅上，直到把头剃完。别的一些则在洗他们的耳朵，还有些人，令人厌恶地公开展示他们在刮着的眼睑的里部。

这是一个有上千种嘈杂声音的城市。这里有沿街叫卖的小贩用木铃宣布他们的到场；盲人音乐家或者按摩女的拍板；一个人的尖声的假嗓子在小酒菜馆里唱着；从一个屋里传来的槌着铜锣的大声音响，那里有一起婚礼或一场丧事正在举行。这里有苦力和轿夫们的吵哑的叫喊；乞丐的胁迫的哀诉，他们瘦弱裸露的四肢，覆盖着污秽的破布和生着令人厌恶的疾病，都是人性的讽刺漫画；号手爆裂出的忧郁号角声，他无休止地练习一支号曲，也永远不能掌握；然后，象所有这些野蛮旋律的低音伴奏，是永不休歇的谈话声、人们的欢笑声、开玩笑声、叫喊声、发脾气声、闲聊絮叨声。这是一种不停的喧闹。它起先是觉得非常特殊的，继而是混乱不堪的，令人气恼的，而最后是使人发狂的。你渴望有片刻的完全的寂静。那对你将是一种了不起的愉快。

然后，联合这些使人厌倦的人群和疲惫了你

双耳的喧闹的，是一种恶臭，时间和经验使你能够区别成为一千种分别不同的恶臭。你的鼻孔变得熟练起来。难闻的气味鞭挞你被折磨的神经，象一些笨拙粗野的乐器演奏一支可怕的交响曲的声音。

你不能说出汹涌在你周围的千万个生命到底是什么。基于你对自己的人民的同情心和知识给了你掌握，你能够进入他们的生活，至少想象能够进入，而在某种程度上真正地拥有它们。由于你幻想的努力，你可以马马虎虎把他们作为你自己的人民看待。但是你对他们的陌生，正如他们之对你陌生一个样。对于他们不可思议的事物你找不到暗示。因为他们和你自己的人民这样相象，使你无从分辨；不如强调他们的差异反倒合适。这时，某个苍白戴着一副大的角质眼镜、胁下挟着一本书的青年吸引了你的注意，他的勤学的样子是令人愉快的。或者一个老人，戴着一顶风兜帽子，蓄着灰色稀疏的胡子和有着疲倦的眼睛；他看去象一个中国艺术家在一张岩石风景上画的，或者康熙朝代用瓷造型的高人雅士。但是你也有可能正如望着一阻砖墙，你对着它一无所获，你不知道关于他们起码的事情，于是你的想象受到阻碍。

但是，当达到山顶时，你再一次来到围绕着

城的砌有锯齿形的城墙，走出令人皱眉的城门，你来到坟场。它们一直伸展到乡下，一里路，两里路，三、四、五里路，没完没了的绿色的坟堆，山上山下到处都是，坠着灰色石碑。人们一年一次到这里来扫扫祭奠，同时告诉死者它们留下的活着的生活过得怎样。它们死者也正如住在城里的活着的一样挤得密密麻麻的，它们似乎压迫着活的，也仿佛活的要强逼它们到那混浊的打着旋涡的江里去一个样。关于这些挤密的行列也有着某种威胁，那就是好象它们正在对这城市采取包围，用一种愠怒的冷酷无情，宣告它们包围的时间。好象在末尾，这不可抵抗的侵犯有如命中注定，它们将这些沸腾的人群驱赶在它们前面，直到这些屋子、街道都由它们铺盖掉，这些绿色的坟堆一直铺盖到水门下来。于是最后寂静了，寂静将不受干扰地长住在这里。

这些绿色的坟是怪模怪样的，它们使人恐怖，它们似乎在等着。

敬　神

一个老妇人，她的脸凋萎了，深深地起着皱纹。头发由三枝长银钗挽成一个奇怪的发髻。服装是由褪了色的蓝的穿旧了和打了补钉的长背心，和一条长度仅到小腿下面一点的裤子组成。她赤着脚，但是在一个踝骨上戴着一个银脚镯。这是明白的，她非常贫苦。她并不肥胖，但身板宽阔，在青春时期她必定毫不费力地做着那些笨重工作，她的生命就从那中间消费了。她用一种老年妇女的安静步伐悠闲地走着，臂弯挎着一个篮子，她一直走下到港口，那里挤满着油漆了的帆船。她的眼睛好奇地在一个站在窄狭竹排上用鸬鹚捉鱼的人身上停留了片刻，然后着手她的事情。她把篮子放在埠头水边的石头上，从那中间取出一枝红蜡烛。这时她点燃蜡烛把它插在石头缝里，又拿出几根香，把每一根香拿出在烛焰上点一会，然后把它们插在烛的周围。她拿出三个小杯子，把带来的壶里的酒筛满它们，同时把它

们整齐地摆成一线。她从篮子里拿出卷好的钱纸和纸折的“锭子”，撕开钱纸，以使它们易于燃烧。她烧成了一堆小小的篝火，当它燃烧得很旺的时候，她把三个杯子的酒奠一点在那燃着的香前。她敛衽三次，默默禀祷。她拨动燃着的钱纸，所以它的火焰烧得明亮起来。她把三个杯子向石头上酹空，又敛衽三次。没有人对她给以极小的注意。她从篮子里又拿出一小叠钱纸丢到火里，再没有什么费力的了。她提着篮子，同样悠闲、颇为沉重一些的步子走去了。神会适时地给她以抚慰的，她颇象一个法国的老农妇，满意地做完了她日常的家务事，去做她自身的事情去了。